

炎黄春秋

■ 董必武的民主政治思想

■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评析

■ 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留下些什么

■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目 录

春 秋 笔

- 1 董必武的民主政治思想……………李维民
5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陆 德

陨 星 篇

- 10 陈毅元帅的诗人风范……………袁 鹰
12 陈独秀在监狱的研究生涯……………祝 彦

沉 思 录

- 16 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宋文茂
——附：彭洁清：“炼狱”四日
24 温济泽与温良恭俭让……………曾彦修
26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陈大斌

亲 历 记

- 33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陈铁健
40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吉伟青

一 家 言

- 43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评析（上）……………吴 江
49 “城中好高髻”的联想……………杨天石

人 物 志

- 50 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刘路生

遗 闻 录

- 56 抗日烽火中开发的玉门油矿……………李学通
60 成吉思汗陵西迁记……………薛衔天

资 料 库

- 65 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江仁宝

文 荟 园

- 71 人民币总设计师谈人民币……………朱鸿召

九 州 景

- 75 长江三峡反腐古诗联……………啸 海

编 读 窗

- 78 读者来信（摘编）……………王 珏等

文 配 图

- 80 “精神保姆”——精神现象零拾之二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铎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 事 单 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68522852 68534879 68532048

传 真：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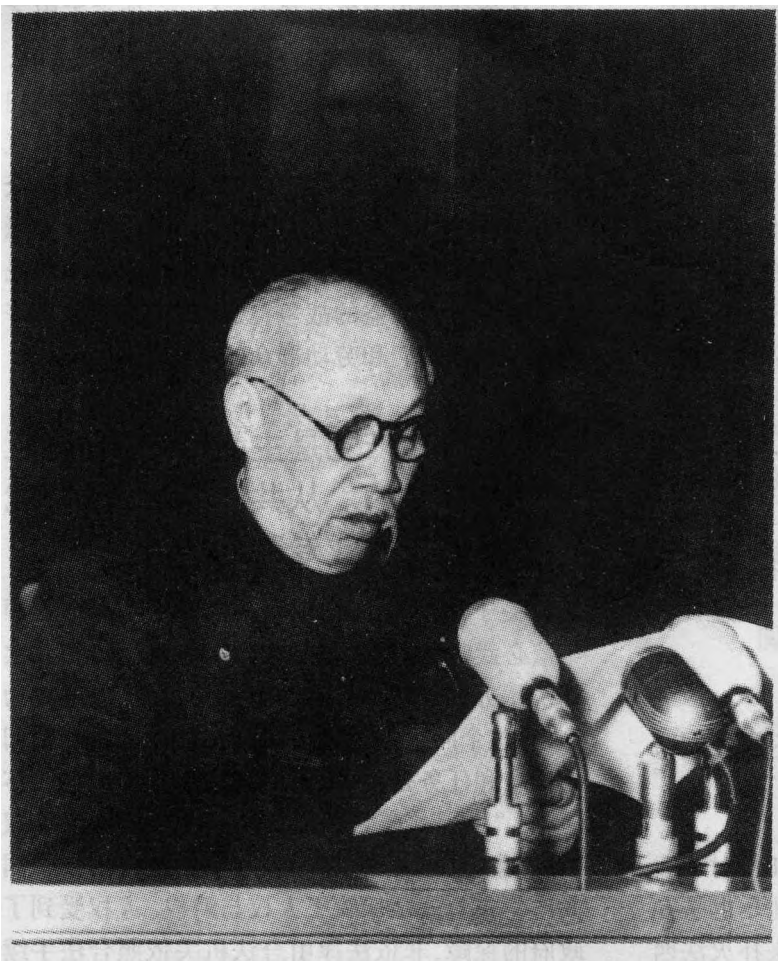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80元

董必武的民主政治思想

● 李维民



1956年1月董必武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

诞生于1886年的董必武,1903年(17岁)中过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思想,都有过较深入的研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他还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和列宁学院留过学。在我们党内,他是阅历最深、具有

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伟大革命家。同时,他又是我们党内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早在1914年和1917年,他曾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回国后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从事律师职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担任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参加过联合国的制宪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年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1954年以后,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对民主与法制问题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本文仅就他的民主政治思想做一粗浅的介绍。文中引用董必武的论述,均出自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选集》。

纪念辛亥革命,应当高呼政治真正民主化

董必武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30年后,他写了《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文,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做了透彻的分析。他说:“辛亥革命伟大的成绩,是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年的清朝政府,而且埋葬了中国几千年来统治形式——帝制,而建立起中华民国。”他概述了辛亥革命后30年间,中国在经济、文

化、政治、军事方面的进步。他认为：“这些进步的基因，不能不溯源于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某些进步更为迟缓，也许某些进步成为不可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但辛亥革命胜利并未彻底，且经多次失败，而历史任务至今犹未完成，……辛亥革命方建立起民主制度，便遭摧残，使国内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没有民主制为之保障，于是这些进步都成为自流的、间歇的、不平衡的、不协调的、非系统的。这样的进步，自然不能满足国人的愿望和适合时代的要求。”他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教训：（一）人民要求民主的情绪是日益扩张的，这种情绪因自由思想的传播和民权主义的宣传，从此愈益普遍而深入。（二）革命客观发展的程度，超过主观领导的力量很远，因此，辛亥革命以胜利始而以失败终，这是很可惋惜的。”他引述孙中山先生1921年时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今日的民国，只有官治，没有民治，……哪里还算民国呢？”董必武说：“中山先生是无数次慨叹中华民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今日读来，犹值得我们警惕。”董必武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年，应当高呼：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坚持团结抗战！政治真正民主化！联合民主国反对法西斯！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

法西斯主义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

董必武在大力提倡民主政治的同时，对于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是在1941年，他发表过一篇题为《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教育人们要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实质。他说：“有人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后恭维纳粹，说纳粹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基本相同。这对于中山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都是极大的侮辱。……国内有少数人不明法西斯的意义，看见希特勒、墨索里尼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像煞有介事，就想模仿法西斯的做法。不知道照法西斯的做法，多做一分，即离开民主道路愈远一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和发展，作了很透彻的批判：“法西斯纳粹夺到了政权以后，它们就推翻民主政治的标帜——民选的议会，以法西斯党的议会代替国会。纳粹更干脆地说‘国社党就是国家’。这样赤裸裸地建立法西斯纳粹的独裁，剥夺国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解散人民的一切组织，特别是工会的组织，规定要按照法西斯的意图进行改组，摧残压迫异党，特别是共产党，使它完全变成地下党去活动。……希特勒说：‘我们应该以最残酷的方法进攻敌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毫不犹豫地他们将他们收入集中营中。’……他真正用了最残酷的方法，不管是科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家，凡怀抱自由思想、鄙视法西斯主义的人，都受到无情的迫害。”董必武的结论是：“法西斯主义就是黑暗野蛮的统治阶级向民主自由和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法西斯主义就是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的强盗的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

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实行民主政治，1945年董必武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在一次华侨举办的演讲大会上，他以中国的解放区为例，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明确的说明。他说：“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实行民主政治。”接着，他具体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

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一党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董必武还说明:“在战后,在把日寇打到无条件投降以后,我们现在在抗战中所执行的基本政策,还可以继续施行。我们要在战时,也在战后,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必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为建立新中国的民主政权,做了不懈的努力。1948年8月,董必武在石家庄主持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1948年10月,他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话,提出一切权力都要归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的权力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人民代表须向选民报告工作等论断。1949年9月,董必武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托,负责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又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他努力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5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他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根据宪法还将要产生若干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就是说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的法规,才能叫做法律,它的意义是庄严的,通过它的手续是慎重的,它的公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之一。……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他批评了对国家法律、法令的严肃性认识不足的种种现象。例如1949年全国总工会关于处理劳资关系和解决劳动争议自行立法。董必武说:“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在我们国家内是最有权威的社会团体,但社会团体只能构成我们国家的基石,不能代替国家。显然工会是无权发布法令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必武提出:“统一战线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特别在今天的形势下,就更明显地成为决定我党成败的问题了。”他认为:“人民政协不但是政治上的大成功,也是组织上的大成功。参加政协的成员,甚至包括了昨天还拿枪反对我们的敌人,这点正是我们的成功,说明我们统一战线的广泛。”他强调:“我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永存的,是不变的。这是因为我们党不能脱离群众而存在。……共产党除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其自身单独的利益。它不是谋个人或几个人私利的小团体,它经常在群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

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

关于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关系,董必武有很系统的论述。他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党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论述是1940年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系会议上讲的,发表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它成为政权机关的领导党。……但这决不是说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

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我党中央从来没有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下过命令。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命令都是党的创意,许多重要的文告都是先由党拟定初稿(不经过党的准备、考虑,是没有的),然后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它的常委会讨论(注:1954年以前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再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务院讨论通过。在讨论过程中,各方面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补充或修改我党拟定的初稿,使其更加完备。……我们应很好地把这样的方法运用到各地去。”

共产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董必武一贯强调共产党员应当成为遵守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员犯法必须从严惩处。在《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等一系列文章中,他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律和秩序是我们公共活动所必须,而且法令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他批评:“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是不对的。”他告诫我们党的同志:“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拿来作为鉴戒的。”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严肃地批评了“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列举了诸如:不依照法律规定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限制人大代表向大会反映群众的呼声,不按法律手续撤

换代表;党政不分,直接发号施令,代替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违法乱纪,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强迫命令,招致群众不满;没有按照法律手续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和上诉的权利,违反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虐待犯人等等。董必武要求“对于这些恶劣的现象,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不懈的斗争。”他还认为,党员和国家干部违法,“问题就更加严重”。“犯罪的如果是党员,除按党纪处分外,同样应按国法处理。”他批评“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的特权思想。他提出:“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他号召:“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还应当提到,董必武一贯重视倾听群众意见,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1948年他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有一段很精彩的发言。他说:“大家不要怕讲错话。我想告诉同志们,共产党员不是神,是各种元素组成的一个实体。每个人都有讲错话的可能,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讲错了不要紧,记录下来也不要紧。不要人讲错话,就是阻止同志的发言。……你有讲错话之权,别人有批评错话之权。某个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别人会批评这个错话。如果只许你讲错话,不许别人批评你的错话,那就不对,那你讲的话就成天经地义了。要大胆地讲,讲错了以后要受得住批评。不要紧的,我们不是天生圣人,讲一句话就一字不错,任何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圣人。……我们只有把各个方面的观点综合起来,才能得到事物的全面认识。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怕讲错话。”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今天重温董必武同志关于民主政治的教导,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 吴明)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 陆德

与父亲陆定一多年接触,对他提出“双百”方针中的一些思想,有一些理解。

父亲是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长篇专题发言中提出“双百”这一思想的。在当时较“左”的大政治环境下,父亲提出,要允许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自由讨论,要与政治思想的问题分别开来,提倡它们蓬勃发展。这一主张,被毛主席在第二天的总结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由陈伯达提议的。

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对外宣布此为党的“双百方针”。5月26日,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全国科技、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党的这一方针。

46年的历史风云过去了,逝者如斯夫。但重读父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然觉得颇具新意,处处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父亲在建国初期,即提出这样杰出的主张,从历史、政治和思想环境的角度分析,确属不易,值得很好借鉴和研究,特别是对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主导思路 and 理念的研究。

父亲提出“双百”,有他的多种论点和想法,多数已经在他的讲话及学者们的分析研究文章中写出。但父亲对“双百”的解释,还有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和对“第一性”、“第二性”及对“有为”、“无为”等观点的阐述。

回顾父亲晚年与我的多次交谈,现把他的这一观点汇总整理出来,呈献给社会,以示对父亲的怀念。

父亲讲:就像列宁在“企管二重性”中所指出,科学技术和 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在它生成、发展和消亡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父亲讲: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聚变、裂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凯恩斯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泰罗的企业 管理理论,梅奥、马斯洛等人的行为科学管理,摩尔根、孟德尔的遗传基因学,西方的计算机技术,医学中的西医及中医等等,这些,都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但其中有许多符合社会实践和科学进步的东西,我们是“废弃”还是“扬弃”?牛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别人问宇宙是

怎么动起来的,他讲是上帝踢了一脚。是否因为他是个唯心论者,“牛顿力学三定律”我们就应废弃呢?牛顿是唯心论者,但是在“三定律”的研究上,牛顿是唯物的,因“三定律”反映了力学中自然属性的规律。我们应用它,首先是看它是否符合科学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即使是对资产阶级,也不能说人家就不懂科学,好像一戴上“资”的帽子,就什么都“臭”了。)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单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之所以提倡要把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区别开来,就是不要把学术、技术上的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意见,简单地用政治思想标准去武断、去压制。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父亲说:在建国初期,我提出这一主张,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我有责任提出来。

春秋战国,虽属战乱,但却是我国文化艺术

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百家争鸣”的局面;秦王朝虽一统天下,但却是“焚书坑儒”,文化艺术出现衰退。为什么?因为,对任何学术性的观点动不动就要被扣上“扰乱朝纲”的罪名,形成了“文字狱”。16世纪,西方的布鲁诺宣扬“日心说”,被罗马教皇干预,活活将他烧死,使哥白尼的正确观点,延误了70多年才被逐渐认识。纵观历史,凡是把政治干预强加于学术研究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出现过同样问题。

解放后,我们也有类似教训,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凡在政治上被定为“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或“走资派”的,认为他的一切言论、观点和著作就都是反动的了,哪怕是符合科学规律、符合自然属性的观点言论,也一概反动。

所以,对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坚持用“二元论”的观点来分析、对待。要允许自由讨论,只能用科学的实践,来证明它们的真伪,而不是去扣政治帽子。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优于其它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的一种社会,它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应该优于其它社会制度才对,否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

父亲讲:我提的建议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什么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然,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在学术的研究过程中,会存在真科学、伪科学及唯心论、唯物论之争,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辩论、争鸣的学术环境,而不是政治斗争的环境。这两种“环境”是不同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能有几人?不能说暴露出些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论,就要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手段,特别是对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压是压不住的,“士可杀,不可辱”,这是知识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作的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分子的特点。要他们服,只能用事实说话,用实践和实验去说话,这是鉴别它是否符合“自然属性”的唯一方法。所以,对待学术界的不同争论和不同观点,不能用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这是其一。其二,真伪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就像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经济手段和若干理论,它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会被“优胜劣汰”、“自然淘汰”一样,真伪科学应当在学术研究、竞争、争论的环境中,以及在社会的实践和应用中,被优胜劣汰,被自然选择。就是说,科学和学术的生成、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性。这是远比用政治干预来“揠苗助长”作用大得多,而副作用小得多的自身规律。我们应重视研究的,是这种自身规律,而不是只重视政治干预。除非它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可动用专政和法律手段。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进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进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父亲解释说:在科学和学术上,为追求其自然属性而进行的争论,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同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彼消我长的斗争,显示出它的排异性。而学术观点的不同争论,都是从不同角度为探索、追求同一自然属性这一共性目标,其结果往往是“殊途同归”,不同观点最终达到统一认识,兼容并取、优势互补,或出现新的边缘科学。这种争论,促进了科技和学术的发展,显示出它的共融性。一个是排异性,一个是共融性,这两者的性质和特点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特点,就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西医可以治病,中医也可以治病,最好的处方是“综合治疗”,而不是“排斥它方”。对于科学和学术间的争论(争鸣),采用“百家争鸣”是促其发展的,而采用政治斗争的态度和手段,显然是欠妥的。



60年代初陆定一(左二)与全家合影,右为本文作者

父亲讲:当时,他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他。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

父亲讲:就政治领域而言,我们尚且提倡“政治民主”,提倡“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不提倡“一言堂”,何况在学术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就更应该提倡学术民主。没有“双百”方针怎么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健全党内肌体的好方法,执政党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和清除自身的缺点,但是,必须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前提,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言者无罪”,谁还敢提不同意见?庐山会议,彭老总不就成了“反党分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同于政治领域,但同样需要出一个好的政策,解决一些紧箍和阻力,去鼓励它们发展。

父亲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他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学术领域，能创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父亲讲：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讲，在诸生产要素中，人是最根本的要素，是活的劳动力。西方管理学中，把对人的界定，从单纯的“经济人”提升到“社会人”，直至最新的管理学，提倡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下，管理模式要由官僚的“宝塔式”（层级式）向“扁平式”变革，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给基层和底层更大的自由度和自决权。这些，都表明了“有为”和“无为”的变化趋势和辩证关系。我们是一个执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你都有为了，事事都代替了，别人就不为了，也无法为。

父亲讲：学术的、科学技术的东西，从总体上来说，说到底，是涉及到社会和生产发展中的“方法、手段和工具”类的东西。小平同志讲，连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用了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处。西方培养的高级经济学家，都是要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其目的是为缓解劳资矛盾，巩固资本主义体制。所以，这些“方法、手段和工具”，是人类在社会和生产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是社会的财富，每个社会都要借鉴、利用的，只是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效果不同而已。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

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所以，首先是要鼓励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蓬勃发展，然后是怎样能让它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为怕几株“毒草”出现，就一概限制其发展。毒草终究会有的，但它是局部问题。冬天倒是不长毒草，但永远也迎不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有了毒草再铲除嘛！我们不是有“六项标准”（注：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辨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吗？可以说，“六项标准”就是鉴别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社会属性”标准。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父亲讲：你看列宁是怎样分析泰罗制的，列宁讲：泰罗制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最巧妙的残酷剥削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列宁的二元论分析方法，一是“社会属性”，说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一种手段；一是“自然属性”，说它是一系列的科学成就构成的管理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东西，首先要研究它的科学性，这就要给它创造出一个可供研究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和环境，让它尽量多出成果。伪科学不是科学，要揭穿它，也须通过科学论证。泰罗的企业管理方法，被无产阶级掌握，就会成为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效率（而不是剥削）的手段。同样一种工具或手段，被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利用，目的和效果是不同的，这就是它的“社会属性”。但是，首先要让它出成果。你拥有和掌握了这些工具和手段，才能为你服务。西方是把科技和学术成果都看作“有价”资产的，许多成果，你拿钱都不会卖给你。我们的一些同志难道就不懂“取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道理吗？还要去自己压制自己的发展。“双百”方针，就是为了给科学技术和学术界创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环境。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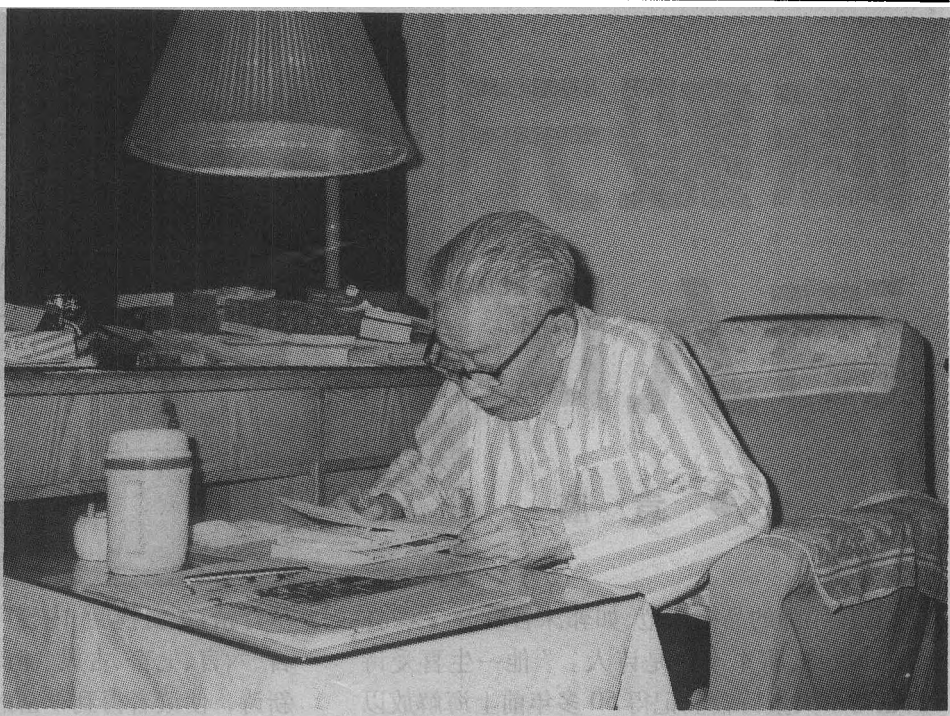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

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科学、认识,无止境,我们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上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都“拖”不起呀!不提倡“双百”、没有马列的“二元论”分析观点,对人类文明,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父亲讲:当时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涵盖了“二元论”的思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教育的根本性质,是它的“社会属性”;“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它的价值取向,除此不会有真正的知识,是它的“自然属性”。

父亲又讲:他提出允许文化艺术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主张,是严格界定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学术、技术、艺术领域的,不要乱套。如套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等等,有些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不能混淆。

父亲出身于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知识分子,



陆定一晚年在医院中读书

他遵照老祖宗“二元论”的思想方法,提出的关于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百”方针,这种以“二元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分析而提出的发展方针,我以为,今后不管是在有阶级社会或无阶级社会,都是适宜的。

我还认为,毛主席所理解的“双百方针”,与陆定一所提的初衷,在认识上是有区别的。“反右”斗争中,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又将学术性、技术性问题的争论,看作是阶级的争斗,回到了“单元论”。更甚者“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以政治和专政的手段来虐待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许多专家学者被迫害、关押、蒙冤受辱,众多科学成果和文化遗产被焚烧、捣毁,贻误了两代人。孰是孰非,只有请历史和理论学家来判断评说了。

最后,我以父亲在“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时,所写纪念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

陆定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陈毅元帅的 诗人风范

● 袁 鹰



陈毅元帅的品格风范,如郭沫若赞誉:“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他一生喜爱诗词,也写了大量诗篇。记得 50 多年前上海解放以前,就秘密传抄过他的《梅岭三章》,“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些慷慨悲歌的诗句,曾经鼓舞我们这些身处地下斗争环境的青年人的斗志。上海解放后刚几天,他在交通大学礼堂同上海青年学生见面。身经百战、指挥大军解放上海的将军,那天穿一身白衬衫黄军裤便服,一进会场,就向起立欢呼的青年学生们鞠躬致礼。他在讲台上谈笑风生,说:青年朋友喜欢诗,唐诗里有两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上海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就像黄鹤那样一去不复返了,要靠我们大家来建设新上海。话音刚落,顿时赢得全场如雷掌声。上海人第一次领略到这位叱咤风云而又平易脱俗的儒将风采。

上海解放后三年,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我有多次机会聆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毅讲话。有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重心似乎放在华东军区司令部,移驻南京,不免使人有寂寥之感。但是后来我却得到另一种机缘,作为《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得以捧读并亲手编发他的诗词稿件,比读者先拜读原稿,先瞻赏那龙飞凤舞、潇洒飘逸的书法,就更感到幸运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到 60 年代初,陈毅同志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不少诗篇。怀人伤逝,感

事抒情,纪游揽胜,内容广博,体裁多样,旧体诗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绝句齐备,还有自由体新诗,使读者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和精美的艺术享受。评论陈诗,需要长文宏论。作为副刊编辑,我们对作者在处理诗稿时的一些小事自有特殊感受。陈总诗作都是亲笔原稿,从不打字复印,下署“陈”字样,也从不由“陈办”代劳。我们一见到信封,就会欣喜相告:“陈老总又有诗稿来也!”

195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烈士殉难 30 周年之日,陈毅同志发表六首五言绝句悼念,第四首有句云:“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用文天祥在燕京殉难典故(柴市即今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菜市口,古刑场)。发表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并非柴市。我们当即转去陈总办公室,三天后就接到他亲笔复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五月六日你处转来王九一和闻舟两先生的信,今日下午收到。他们信中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应在今安定门交道口以南府学胡同地方,不在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除专函向他们致谢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

陈毅 五月九日

1958 年 3 月,陈毅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回来,寄来一组《访问朝鲜诗录》,附有一信,专门关照几件事:

一、送上访朝诗录请登载。

二、建议你报与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四家联合同日登载。由你报负责组织,希望帮

助并同意此办法。

三、北京日报1955年专门征诗,我答应他们,直欠债至今,为了还债,有此必要。余二报亦屡屡征稿,藉此报答其盛意。否则别人不满,说我只给你报服务。今后仍应多登你报,以销路多读者更广泛广大也。

四、稿酬只要你们一家的,不要他们三家给。因篇幅不少,是否一天或两天登完,由你们决定。

五、诗句不妥之处,委托你们和他们修改,欢迎指教。

这组诗共12题,17首,最短的七绝四句,最长的是《在朝鲜的上阳村》,新诗74行,一天是登不完的。我们按陈毅同志嘱咐,同那三家编辑部商量,分别从3月15日起陆续发表,为照顾各报版面安排的技术问题,也并未约定同日见报,我们想作者定会谅解的。

陈毅同志对读者来信指正一处小差错表示谢意,对报社三年前的约稿“欠债至今”一直未忘,对诗的篇幅不少由编辑部决定如何刊登这类小事,都一一细心交代清楚。这封信我们在文艺部全体会议上宣读过,大家对陈总的高尚朴实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久当编辑的人,每天要同各类作者交往,对比之下,高低立辨。陈总信上殷殷说明同一诗稿何以要发四处的理由,特别关照稿酬只要一家的,从这类细微处能见到伟人的风范。

正如陈毅同志信中所说,他后来写的诗(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大部分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自然是我们的殊荣。他作为外交部长出访亚非欧各国的诗篇,考虑到对国外的影响,多数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其中《赠缅甸友人》那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我吸川上流,君饮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又由作曲家谱成一首抒情歌曲,成为东方歌舞团一个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前些年我访问缅甸时,望着澜沧江下游湄公河的清流,不止一次地同缅甸朋友谈起这首诗。上了年纪的朋友都记得它,赞美它,我就不无得意地说我有幸当年经手发表这首诗,使缅方人士惊羨不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老人,1960年5月29日因患心脏病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对这位早年即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不幸离世,举国军民同声哀悼。陈毅元帅其时正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到噩耗,自然十分伤感,即作诗表示悼念之情,并连同林老遗诗一并寄给我们。

副刊编辑部同志:

寄上林老遗作及我所写挽诗,请刊登日报。要求把林老遗作放在前面。

敬礼!

陈毅 10/6(6月10日)

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意见,将林老遗作和陈毅挽诗同时刊登在6月14日的副刊上。林老上一年(1959年)8月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作《少年蒙古》七律二首:

山环一水太而都,春满新邦万象苏。
跑马余风总作健,射雕能手有前途。
稚松自长背阳茂,戈壁丛生细草腴。
蒙古包中话沿革,牧民已失主和奴。

望澈曙光苦未眠,却已鸡鸣步独先。
伟业相将随老大,雄心终是思华年。
充分生活需维达,协调宫音赖主弦。
建基正为谋宏远,真理从来破不颠。

林老这两首诗,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寄给诗友。陈毅同志特地抄录寄来,连同他的挽诗,题为《在蒙古首都闻林老逝世写长律二首》:

北京计到影瞳瞳,故旧从今不再逢。
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
长征走步关山月,晚岁诗吟跃进红。
访问蒙古留友谊,此间吊唁悲哀同。

疑真疑梦事朦胧,恍惚围棋又相逢。
论政衡文成往迹,伴游催诗记音容。
投身革命轻艰险,面对谈判战恶龙。
七五高龄今结束,风流文采几人同。

字里行间,表达对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前辈革命家的推崇与尊重,也追叙两人论政衡文件游催诗的友情交往,情深谊重,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将军诗人的本色。(责任编辑 舒元璋)

陈独秀在监狱的研究生涯

● 祝 彦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出卖,陈独秀于当晚在家中被国民党上海警察逮捕。1933年4月20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后经他上诉,才被改判为8年,剥夺公权则部分撤销。

远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就把监狱与“研究室”等同对待,他说过:“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段话连同“五四”运动中的“总司令”——陈独秀成为时人崇拜追求的偶像和境界。但是以前几次的蹲监狱,由于时间短,陈独秀在监狱里并不能做研究工作;而这次被捕并被判刑8年,确实使陈独秀实现了监狱式“研究室”的愿望。虽然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提前被释放,但在4年零10个月又8天的监狱生活中,陈独秀以学者兼思想家的勤奋多思,把监狱当成研究室,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把监狱当研究室, 拟出宏大写作计划

陈独秀经江苏省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后,被押送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即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对于陈独秀在狱中的待遇,据陈独秀的外甥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得到一点优待,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有专人看守,监视他的一切。其余人住普通牢房。当初监视颇严,不准通信,不准看书看报,后经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了些。陈独秀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典狱

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话虽这样说,典狱长还是作了让步,以上几个不准,终于悄悄地准了。”以后随着来探视陈独秀的人络绎不绝,而且其中不乏国民党政府里的权贵显要,以及社会各界的名流。这样监狱逐渐地对陈独秀就更加“网开一面”,陈独秀的独监室,是由看守宿舍辟出的一间房,约有10至12平方米,室内有一书桌,一书架,一单人床,室外有天井。陈独秀的饮食也比一般犯人好,每餐两菜一汤。他要求将菜和汤混做成一个菜,主食吃面包。外面送来的食品很多,常吃不完。朋友送钱给他,由狱方保管,需要物品时由狱方代购。天热时,看守叫犯人挑两桶水给他洗澡。有人来看望他时,他说见就见,说不见就不见。会客时,看守在室外走动监听。陈独秀就在这样较其他犯人优厚的条件下,开始了他那漫长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被捕入狱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如果按刑期8年呆在狱中,对于一个习惯了投身于火热的政治运动又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革命家来讲,无疑是太残酷了。陈独秀显然感到这漫长的8年狱中生活,不能白白浪费,何况,陈独秀本来就是那种思想闲不住的思想家、革命家兼学者。早在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就把监狱看成研究室,并认为只有“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次陈独秀真是充分实践他自己的这种倡导,把国民党的监狱当成了自己的研究室。首先,陈独秀写信给汪原放和胡适等人,帮他在外面购买或借来大量书籍。

仅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要了这些书籍:“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此外,还有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他的囚室变成了书房,“他房里有两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他在狱中的藏书包括政治理论、经济学、史学、文字学、地理学、传记文学等多种领域的著作以及《东方杂志》、《国学丛刊》、《国学季刊》、《大美晚报》等各种报刊资料。

正如许多被关押过的知名革命家一样,陈独秀利用监狱里尽可能提供的条件,潜心钻研,积极思考,著书立说。陈独秀有一个很宏大的写作计划,1934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就列出了他的著述目录,“弟拟在二、三年内着手写下列各书:《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埋头研究音韵学,成果颇丰

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喜欢自由、受不得束缚的人,现在被关在十几平方米的囚室里,使他离开了火热的革命舞台,这大大影响了陈独秀的心情和情绪。他的学生陈中凡回忆说:“二十三年冬日,我从粤回京,到狱中去会先生,见先生形容憔悴,没有当年豪迈的气概了。在青年人的心目中,陈独秀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形象,但现在被囚斗室,真有种‘虎落平川’的味道。”这种心境必然影响陈独秀的写作计划。陈独秀自己也表达了这种内心世界:“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情的人,但狱中的日子把他的这份天资逐渐地磨蚀掉了。于是,陈独秀把注意力放到了似乎与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的文字音韵学的研究方面。当陈独秀投身于这些研究中时,似乎忘记了狱中生活的无聊,而且他也确实已经醉心于这种工作,与人谈起来也兴致勃勃。据陈中凡说:“二十五年,我回京执教,先生移押江宁第一模范监狱,时常往晤,与他商量旧学,兴

致很高。”陈独秀在入狱的最初几年,研究的成果,主要在文字音韵学方面。著述主要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手稿);《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连语类编》(手稿);《荀子韵表及考释》,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2号;《屈宋韵表及考释》(未完成稿);《晋吕静韵集目》(手稿);《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4号;《表》(手稿);《实庵字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5、6、7、10、13号;《识字初阶》(未完成稿);《干支是字母说》(手稿)。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陈独秀著述如此之丰,难怪当时就有人赞称陈独秀在学术上的造诣。王森然在写《陈独秀先生评传》时,其中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法文日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针砭时弊,创作《金粉泪》组诗

陈独秀在狱中每天能接触大量报刊,恶劣的时政,激发他写了长篇组诗《金粉泪》56首。陈独秀早年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中的“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以及在南京监狱里给刘海粟题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等警句,至今还在传诵。对于陈独秀的诗风,当时报刊上即有人评曰:“皆忧时感世之作,……有谓陈伯玉、阮嗣宗之遗”。也就是说,陈独秀的诗中感时伤事,十分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风花雪月。李大钊也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

陈独秀是个意气豪迈的人,而且他关心国事民瘼,立意高远。“诗如其人”,他很讨厌无病呻吟,所以,他的诗确实有“魏晋风骨”。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居然这样评论陈独秀:“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吟风弄月、惹草拈花的旧文学家,与诗僧苏曼殊,很有深交。他个性是浪漫的,疏懒的,理想无实的,很像温李一流人物。假使他生活在闭关时代,只配做花月痕上韦痴珠,还够不上做韩荷生。”这个人可以说根本不了解陈独秀。陈独秀曾参加了拒俄运动,暗杀团,组织

了岳王会,指挥了五卅运动等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忽略了这些,而把陈独秀比做温(庭筠)李(煜)那样的“婉约派”诗人,真是天大的误会!

《金粉泪》写于1934年,全诗感时伤事,针砭时弊,嬉笑怒骂,极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正如陈旭麓评点指出:“诗中涉及的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但字里行间仍流露着早年爱国革命的豪情……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无谓呻吟。”整组长诗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揭露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表现出来的妥协行径。取名为“金粉泪”即有寓意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六朝金粉”之地南京却是歌舞升平,真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人对此充满了亡国之痛。如“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又“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弃地丧权非旧事,庙谟密定两三人”。二是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如“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指斥特务横行,滥杀无辜;又“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开倒车。赢得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三是斥责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政府腐化,官场黑暗,如“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又“皇皇大典枉抡才,官运高低靠后台。封锁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费疑猜”。四是讽刺国民党要人的丑恶嘴脸。如讽喻汪精卫,“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又讽刺国民党官僚主义,“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组诗的最后一首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纵观全组诗的内容,决无“风月”之弄。对这组诗的艺术风格和思想价值,陈旭麓作了如此评价:“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的失意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不难窥见作者自诩‘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意志。”确实,全诗洋溢着诗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之气概!

撰写“传记文学之瑰宝” ——《实庵自传》

陈独秀在狱中的第三大成果,是留下了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瑰宝”的《实庵自传》两章。陈独秀最初写自传的动念,完全来自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胡适的建议,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写自传,首先,他自己做了先锋,带头写了《四十自述》,同时他也建议别人写,“我还劝告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其二,是托派中一些人的劝告,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像托洛茨基一样写《我的生平》,通过自传形式来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的过程,但陈独秀开始并未对此建议和劝告放在心上。陈独秀写自传的初衷,亦并非胡适与托派朋友所希望的那样。因为陈独秀当时的经济负担很重,超支了亚东图书馆不少的钱。因此,陈独秀写自传,最关心的是能否出版,只有出版了才有稿酬,才能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1932年12月22日,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动手,……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又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当然,除了物质需要上的考虑外,影响陈独秀延宕再三的因素,还有当时的狱中生活。1933年10月13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何为如?或名自述)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愿望。”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此时,对写自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只是由于狱中的生活枯燥无味,使得他“不大有兴味写自传”。

最后,动笔是在1937年7月份,陶亢德回忆了“当时向陈先生要此自传的经过”。他说:“使我得到陈先生自传的是汪孟邹先生,他为我写信到南京去。”7月8日,陈独秀回函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

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到这时,陈独秀才“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但至于“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7月30日,陈独秀去信陶亢德,通知他:“第一章拟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拟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陶亢德说,“信上没有提到第三章以次拟为什么,大概是当时没有拟到,谁知结果只有发表了这两章,好似预先知道了似的,也有点奇怪。”据陈独秀在稿本上的短跋中说:“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0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只写了以上所拟两章,总共字数为一万三千字左右。于是“八月中旬他的两章自传就在炮火连天中寄到了上海”。

陶亢德接到自传稿后,立即送到自己任职的上海《宇宙风》杂志,于1937年11月至12月的第51、52、53期连载。《宇宙风》在刊出时誉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后记中对陈独秀的赐稿,大表感谢,“实不特本刊之幸福也”。但是,陈独秀自传写了两章,就永远画上了句号。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遗憾”,笔者根据当时的情势,分析认为,恐怕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陈独秀出狱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他必然全身心地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中去。正如陶亢德所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思续写。”

其二,陈独秀仍然很关心写了稿子后能不能出版,他就曾写过信“问自传稿收到否?《宇宙风》能继续出版否?”由于战时的交通不方便,陈独秀出狱后很快从南京到了汉口,不久又去了重庆,他不可能马上得知自传已经在上海发表,并得到很高的评价,所以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另外,战时混乱,有些事情难以预料,就是陶亢德自己也不敢担保《宇宙风》能否出版下去,他不无顾虑地说:“在烽火漫天之际,《宇宙风》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唯天知道。”

其三,陈独秀写作严谨,从不马虎敷衍了事,所以在接到陶亢德的催稿函后,陈独秀于1937

年11月3日回函,答复了陶的“逼稿”：“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

其四,陈独秀如果继续写下去,必然要涉及大革命时期的托派问题,他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还有与托派、与国民党之间的是是非非,会徒然引起纷争。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作为既不见容于国民党,也不见容于中共的“两不是”人物,陈独秀在当时的思想言论,无论在苏区或国统区,都是不相容忍的。所以陈独秀当时在报端发表文章,尽管有的是特约稿,也常常是有了上半篇没有下半篇,有时竟开了天窗。所以,陈独秀研究方面的专家、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说,《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的。”笔者认为,也许正因为《实庵自传》存在这样一种天然的残缺,才更显得它弥足珍贵!

不仅现在的人们觉得两章《实庵自传》写得好,在当时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1938年汪原放将它印成单行本出版发行。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编者这样赞许道:“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会道出他自己的变迁,他的活动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自传,实包含有无限的历史的教育的重要性。……《实庵自传》的刊行,对于近代史学尤其对于青年人的意义之重大,已可不言而喻了。后之来者,从这个领导时代的人物的自叙中,定能懂得写什么并学写什么!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就已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其特有的奋斗精神。”静尘1942年7月在追悼陈独秀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末尾,这样写道:“陈独秀死了,我不为独秀的生命哀,也不为独秀的不能成功哀,——因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败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却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一个自传哀。”因为“中国近代史上少了这一篇传奇式的文献,实在太可惜了,……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损失,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责任编辑 程 度)

两弹一星功臣 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

● 宋文茂

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逝世 13 周年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烈士，也不愧是一个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今年是他的 35 年祭。他 1968 年死于非命，10 年后被追认为烈士，17 年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30 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姚桐斌何以让人们念念不忘？姚桐斌到底为我们留下些什么？

一颗“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姚桐斌，1922 年 9 月 6 日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由于家境贫寒，姚桐斌读完小学后，父亲不再让他继续读书，只是校长特别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数次到姚家劝说，父亲才让他上了无锡中学，成为该镇第一名中学生。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无锡先后沦陷，不忍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的青年学生，纷纷逃离敌占区。姚桐斌也约好几位同学，相机越过日军的封锁线。1939 年冬，国立十三中在江西省吉安县公开招考江西及江浙沿海各省流亡学生，姚桐斌以优异成绩考进该校高中部。由于他学习用功，在江西全省会考时，获得总分第一名，报考五所高校均被录取。姚桐斌选择了当时已迁往贵州平越的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他对同学说：“开发中国的资源，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

那时的大学生活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姚桐斌这样的穷学生，夏天在集体宿舍，饱受蚊虫之累；冬天御寒，只有一件薄薄的灰色土布棉被。为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又不得不勤工俭学，或打扫实验室，或分发邮件，或为中学生补习功课。

1944 年冬，日军进攻湘桂黔，学校被迫转移到四川璧山丁家坳。同学们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各自奔往目的地。这里较之贵州，住宿环境更差，没有夜读的条件。同学们便自备一盏桐油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读书。人们注意到，几乎每晚姚桐斌的油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但第二天大家起床时，他又第一个在窗外朗读英语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5 年，姚桐斌以全班总评第一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经济部重

庆北碚矿冶研究所。

1946年,一心深造的姚桐斌,赶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的机会。考生云集,角逐激烈,姚桐斌又以优异成绩取胜,他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该校终身教授弗·康德西博士(V Kondic),研究液态金属凝固过程。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是姚桐斌最为满意的,但生活费用的重压也无情地向他逼来。在国民党政府终止了他的学费供应后,他便把到手的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为省钱,他搬到一家犹太人的屋顶小间,早餐经常是面包和茶水,连黄油也舍不得买,一直到1951年在该校毕业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1952年1月,姚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工作,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他对铝硅金属合金的热裂进行研究,其成果受到专家的称赞,为此他于次年获得该院的D.I.C学位。

姚桐斌学习的用功是著名的,多少次大考争得第一名桂冠,但他绝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深深植根在他的头脑中。刻苦读书,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据姚桐斌的老同学庄先生回忆,在唐山交大毕业前夕,姚桐斌与他有一次长谈,谈的就是毕业后个人发展如何着眼于社会的问题。他的另一位老同学董先生,也在自己1946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寻觅到姚桐斌出国留学前的思想发展脉络。姚桐斌曾向他说,留英有两点顾虑:一是怕在国外的优裕的环境中沾染资产阶级习性;二是怕所学东西对人民大众没有直接的用处。董先生谈到这里感叹地说: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思想基础是何等坚实!

难怪留学英国期间,姚桐斌在努力完成学业、精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日夜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以排江倒海之势由北向南推进,千疮百孔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日渐土崩瓦解,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赤子无不欢欣鼓舞。其间,姚桐斌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总务干事、刊物编辑、秘书、主席等职务。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包括海外侨胞在内中国人的心声。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姚桐斌和一些爱国留学生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祖国自然不会忘记这些海外游子,姚桐斌不断收到寄自祖国的报纸杂志、影片资料等。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姚桐斌激动不已。从此,宣传祖国的每一个进步,也成了姚桐斌的自觉行动。

英国虽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其政府内敌视新中国的官员大有人在,姚桐斌的作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53年的一天,姚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通知,约他去“谈话”,实际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英国。

这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Pivowarski)听到此事,邀请姚桐斌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让他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姚桐斌1953年赴慕尼黑大学进修三个月,提高自己的德语听、说能力。



姚桐斌(1957年回国前摄)

在联邦德国的四年中,姚桐斌除了要处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完成众多繁忙的教学工作外,他专心致志研究金属液体理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的研究成果,在联邦德国《工业通讯》、《铸工》等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此期间,姚桐斌思想上也有一个飞跃,由一名爱国者变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56年他在瑞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姚桐斌应召回到祖国。

一种为破“千重关”锲而不舍的精神

1957年底,姚桐斌带着报国的激情应召回国。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曾希望他去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服从工作的急需,到了国防部成立不久的第五研究院(七机部前身),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1958年1月姚桐斌来报到时,这里只是一个仅有12名大学生的航天材料研究组,办公室是当年袁世凯练兵的营房。到1960年,这个材料组已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即七〇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

摆在姚桐斌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真可谓困难重重,关隘重重。但他深信,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为破前进道路上的“千重关”而殚精竭虑。

作为所长,姚桐斌认为,首先应给研究所以恰当的定位,从而确定研究的方向。姚桐斌的设想是:七〇三所和火箭设计部门根据型号的需要提出所需材料的规划,然后将此要求委托国内有关部门开展研制。在此期间,七〇三和这些部门密切合作;这之后,七〇三所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接近火箭条件的应用性研究,直到这些材料使用到火箭上为止。这样,既可以避免滥铺摊子、重复建设,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积极性。

姚桐斌曾亲自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此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又联合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材料工作会议以及测试会议,姚桐斌的主张得到会议的支持。这些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会后的实践,促成了全国范围火箭材料、工艺

和测试方法研究的协作网的建立,也促进了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

要取得科学研究成果,先抓人才培养。对于科技人员的培养,姚桐斌从来是事必躬亲。

新入所的大学生,包括留苏回来的博士生,都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姚桐斌组织大家由学习火箭、导弹的基本知识开始,进而了解火箭、导弹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最终胜任各自的研究任务。为此,姚桐斌所长经常亲自授课,有时也从外单位请专家来,冶金界元老李熏博士、两院院士师昌绪等,都到这里来讲过课。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多不识英语,成为他们查阅英文资料的极大障碍。为了及时了解西方国家有关科技发展情况,姚桐斌在所内倡导学习英语,最盛时,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班一齐开,一时形成争学英语热潮。

姚桐斌同时很重视工作人员的作风培养。1962年初,他在七〇三所组织了一次“科研专题作风研究会”,把研究工作、技术学习、技术管理与技术责任制方面的50个好坏典型,770多件实物展示出来,加以分析对比。真人实物,振聋发聩,使科技人员加深了对正确科研程序和科研方法的认识,克服了自己的不良作风。一位当年实验室的“小鬼”,至今记得姚桐斌一面作示范,一面教他正确操作方法的一席话。姚说:“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当初都从事过小型实验。实验工作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平平凡凡,但没有这些,就没有以后的成果。当好一个实验员,关键是确保所作数据的准确,有使用价值,使科研人员敢于应用你作出的数据,这就很了不起。”

姚桐斌根据自己在国外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针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问题,写过一篇题为《研究工作方法》的长文,钱学森院长很赏识,曾推荐给院刊《研究与学习》发表。至今被七〇三所的同志视为“仍在熠熠生辉”的“宝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2000年该所还将它印成小册子,作为教材供青年科研工作者阅读。

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活跃在重要岗位上的一代航天材料及工艺专家,不少人赞许当年姚桐斌的言传身教,呕心沥血的培养。

作为中国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的姚桐斌,其卓越贡献,自然首推他为火箭所需新材料的成功研制。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很低,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火箭材料的研制均从零开始。

有一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其成分和工艺,苏方对我也严格保密,只是对我们说:中国需要时订购好了。1960年中苏反目,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像这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想向苏联订购也不可能了。这种材料的研制,一时成为我国发展航天材料工业的“拦路虎”,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姚桐斌带领七〇三所的同志,与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当年便确定了这种材料的成分及其比例,经过反复分析试验,很快生产出了高温钎焊合金。后发现质量不稳定,姚桐斌又亲临生产第一线,找出原因,提出建议,先后用40多天时间,使问题得以解决。为此,18年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七〇三所和上海合作单位获得重大成果发明奖。

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3000℃以上的高温,容易烧坏零部件,引起事故。为此,姚桐斌等立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科研课题。刚提出时有人曾说是“胡子课题”(意即等白了胡子也不会出成果)。姚桐斌坚信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几位工程师默默地进行研究,他们终于获得成功。将他们新研制的材料和工艺用于新型号的火箭上,使火箭发动机的高温大为降低,同时还提高了比推力,增加了射程。

众所周知,火箭结构越轻,就飞得越高,越远。姚桐斌建议立足本国资源,立项研制重量轻、强度高的钛合金气瓶,取代当时使用的钢气瓶。这项研究成功后,每个气瓶即可减少重量7公斤以上。而火箭的最上一级每减轻1公斤,卫星的载荷则可增加1公斤。其经济的、科学的效益是何等可观!

重视预先研究,是姚桐斌对火箭材料工艺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姚桐斌认为,搞火箭材料的研究,不能只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必须有前瞻性,搞好“预先研究”,即他常说的:“做到今天,准备明天,想到后天”。

但是,姚桐斌的正确主张曾被批评为“学院

式研究”,他的某些预先研究项目被“砍掉”。然而,他出于对火箭技术发展规律的认知,本着对事业负责的使命感,他反复解释“材料先行”的主张。他说:“搞材料的如同开饭馆,不能等顾客点肉菜时才去养猪,点炒鸡蛋时才去养鸡。”

据航天材料所后来的统计,由姚桐斌主持论证立项的预先研究课题数百项,有80%已用于各种型号的导弹和火箭。可见姚桐斌对型号设计要求研究之透彻,对某些材料和特种工艺发展方向把握之得当。

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姚桐斌到底有多么深厚的天赋和巨大的潜能?他的一位当年的同窗好友,以后成为冶金专家的同志读了199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怀念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同志》的文章后,才第一次得知姚桐斌的具体工作及其贡献,这使他惊讶和激动。他说,姚桐斌回国前研究的是融溶金属,这个领域不是很宽的。尽管得力于多年的刻苦学习,他有十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为了适应新的任务,他必须知道的新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位同是科学家的同窗老友不禁感叹:姚桐斌“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他“有超人的毅力”,“有超凡的智慧的头脑”。

就是这样一颗智慧的头脑,被两个愚蠢的家伙,以“革命”的名义惨无人道地击毁了。行凶者一个是七机部下属二一一厂的炊事员高某,另一个是从七机部在永定路下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他们一个用切过肉、砍过骨头的手,一个用整天熟练操作榔头的手,各执一根暖气管,向姚桐斌头上猛击,姚桐斌当即被打倒在地……

正如姚桐斌的挚友董先生事后致姚夫人彭洁清女士信中所说:“这种事情,只可能在那无比荒谬的年代才发生。一个具有巨大科学才能的头脑,一颗怀着对人民无比忠诚的赤心,就这样无缘无故被那群无知无耻之徒轻易地毁灭了,多么可惜,可悲,可恨!”

正是这样荒唐无比、野蛮至极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

1966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



1950年姚桐斌在英国

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依据国家大法选出的国家主席拉下马。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一时间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造反有理”、“无法无天”被引以为荣。

1967年湖北“七·二〇”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广为宣传，激发了8月上旬的全国接连的大规模武斗。

七机部当然不是世外桃源。时至1968年初夏，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武斗时有发生。许多人不能上班，有的车间处于瘫痪状态。姚桐斌多次同干部商量避免生产停顿，但无济于事。姚桐斌不愿意随波逐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说：“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

楼外的武斗，无法阻止姚桐斌头脑的思维，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科学研究，何况中央对于火箭、空间技术研究的要求一直没有放松过，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已列入议事日程。

1968年6月6日，姚桐斌兴致勃勃地带领

七〇三所的几位主任，去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孙家栋主持的防热方案讨论会，并提出和讨论了卫星防热系统等研制方案和任务。

姚桐斌常常以一个学者的单纯，去观察那诡谲莫测的政治形势。他多次给妻子和同事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

然而，“大干一场”的机会再没有给这位善良的忠心效力于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家。就在姚桐斌出席空间技术研究院防热方案讨论会后，屈指没有48小时，一幕人间惨剧发生了。

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武斗，姚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他惦念孩子，还是回家了。就在这一刻，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人闯进家来，拳打脚踢将他推出门外，在拖往“总部”途中，两个狠心的家伙抡起钢管，猛击姚桐斌的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见法医鉴定书）。

听到姚桐斌被害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震怒，责令公安部长立即查明此案，并指示有关部门，开列一张有贡献的科学家名单，加以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据梁思礼院士回忆，姚桐斌被害后，七机部军管会对六级以上高级工程师采取了保护措施。他说：“我当时是五级工程师，在七机部二分院也属保护之列。二分院地处永定路，我们的办公区大院已经封闭，有解放军战士看守。……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父亲梁启超被认为是‘保皇党头目’，我又在美国学习、生活了8年之久，多亏周总理指示予以保护，否则必然吃了大苦头。”

人间正道是沧桑。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随之宣告结束。

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女士，以一位受难者妻子的名义，以三个孤女母亲的名义，为姚桐斌喊冤叫屈、伸张真理的义举终于得到回应。

1978年3月18日,在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那天,七机部为姚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追悼会。

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处于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1983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京烈第080040号《革命烈士证明书》。在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一栏中写着:“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附]

彭洁清:“炼狱”四日

编者按:2003年6月8日,恰逢姚桐斌烈士35周年祭,本刊特发表《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一文,并附彭洁清《“炼狱”四日》,沉痛纪念逝者,同时也告诫世人,切莫忘记那个敌视文明、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1968年6月8日,星期六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回家了,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离开学校,虽然车上人挤人,我却习以为常,只希望能早见到分别一周的桐斌和孩子。

好不容易到了,抬头一看35栋就在眼前,我家在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客厅,长沙发靠着窗户,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到我了。

到了楼门,我快步往上跑,满怀希望桐斌已坐在沙发上等我,因为现在已经该下班了。

我刚踏上三楼楼梯口,家门忽地打开,保姆啜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任由手袋掉在地上。天哪,这不能是真的。星期一我上班时,他不是送我到车站,我不是还向他说“亲爱的,星期六再见”

199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授予姚桐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9月,姚桐斌半身雕像在七〇三所揭幕。

在中华大地上,人们欣喜地看到,“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开始形成;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已提到议事日程。让我们记取历史教训,永远告别那“无法无天”的时代,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远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阳光下。(责任编辑 程 度)

了吗?他不是还微笑着向我告别,一直到汽车出站才往回走吗?直到惊恐的三个女儿跑过来哭成一团,直到看到直挺挺躺在客厅长沙发上的桐斌遗体,我才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天,七机部对立的两派发生武斗时,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我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桐斌记挂孩子,还是回家了。他还未来得及扒上一口饭,一群暴徒冲进我家,他们架起桐斌就往楼下推,拳打脚踢,抽耳光,一个家伙还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吼声中,有两个暴徒举起钢管,向桐斌的头部猛击,立刻鲜血冒出,他倒下了。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桐斌光着一只脚被架到他们“总部”,继续拷问。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即倒在地上。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怕桐斌死在他们“总部”,才差人把桐斌拖回我家楼前,丢在人行道上。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并找来我家的保姆,他们请求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将桐斌送医院抢救,遭到拒绝。大家只好把桐斌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清醒过来,于下午三时许停止了呼吸。

我必须尽快把桐斌被害的消息传出去,但家里的电话,当天上午已被割断了。我只好叫我的大女儿去我的一位朋友家,请他领我女儿去找驻七机部的军代表,报告桐斌被害之事。

天渐渐黑下来,女儿还没回来,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难道我让带给军代表的信又招来新祸?我跑到抓桐斌的那个“总部”去,寻女儿未果,想起桐斌之死,禁不住怒火中烧,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力抓人、打人?回到家中,只见两个小女儿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他们父亲的遗体就在身后,我们母女又相抱而泣。

这一晚,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小女儿毕竟年幼,在我怀中抽泣着睡着了。我却难以入眠:桐斌的遗体虽近在咫尺,但已是天上人间,阴阳路隔了;派出送信的大女儿,一夜没有消息,我的心都要碎了。

1968年6月9日,星期日

漫漫长夜终于熬了过去,朝霞送来了这新的一天。两位军代表带着我大女儿跨进家门,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好几大桶冰块。高个子的军代表首先向我解释说:“昨天因为太晚了,不放心你的女儿回来,让她住在我们那里。”我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你们难道不能派人送她回家?我都快急疯了!”军代表说:“昨天周总理一听说这里发生武斗,姚桐斌同志被害,就派粟裕大将乘直升机来了解情况,恰好您的女儿进办公室,我们让小姑娘当面向粟裕同志报告了姚桐斌被打死的情况,时间拖到很晚。”我仍在火头上:“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讲得清楚?你们军代表到七机部时间也算不短了,难道还不知道我爱人是好同志吗?”军代表也承认桐斌是位好同志,他被打死,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谈到姚桐斌的遗体,军代表说联系几家医院都暂无停放的地方,所以决定每天早晚由战士送冰块来。他们把桐斌的遗体放在我家卫生间的浴缸里,四周放满了带来的冰块。

夜幕降临时,战士们将新带来的冰块放置在桐斌遗体的四周。我家保姆紧随着解放军战士走进屋。她整理好她的箱子,对我说,她害怕住在我家,想另找工作。我完全理解保姆此刻辞职的心

境,只好点头应允。接着走的还有住在我家的七〇三所的两对年轻夫妇。七机部造反派夺权后,认为我家住房多,就安排他们搬来我家。昨天桐斌被害后,他们便没有回来,今天是来取东西的,说是已另觅住处。

走了,军代表和战士走了,保姆和同住的人也走了……只有我和三个女儿默默无语,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孩子们终于睡着了,我一个人孤独地伴着桐斌的遗体,为他头上的伤痕哭泣,为他英年惨遭毒手哭泣,为他不能同我白头偕老哭泣……我多么想“随他而去”,但很快予以否定:当时,自杀即自绝于人民,自绝人民即叛徒。我的孩子们就会成为叛徒的“狗崽子”,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

1968年6月10日,星期一

解放军战士照例按时来为桐斌的遗体换冰块。他们一走,整个家又处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晚上,原来那两位军代表来了,进屋后就忙着解释:“上午有急事耽误,没有来成。七机部军管会主任杨国宇同志想见你,现在我们走一趟怎样?”我当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向上反映情况的机会。我看一眼三个睡着的孩子,便随军代表匆匆走了。

杨主任身着海军制服,操一口四川话,据说是一位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长征干部。他在一张大办公桌前站起来和我握手,第一句话便说:“请你来这里谈谈,是因为这里安静。”他谈到周总理得知姚桐斌遇害的愤怒,谈到军代表向他汇报我写信的情况,在我向他要求尽快缉拿凶手时,他也坦诚地谈“文化大革命”中七机部情况的复杂性。在军代表提示杨主任“法医马上要到姚桐斌同志家”后,杨主任站起来同我告别,嘱我相信组织,保重身体。

已是晚上10点半了,紧随我们到家的另一辆吉普车上走出两位着便衣的法医,上楼后,一位军代表领他们直奔卫生间,另一位军代表则一直坐在沙发上陪着我,不让我去看。

过了好长时间,法医才从卫生间出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但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深同情。军代表对我

说：“快12点了，您早些休息，明天还要去海军医院为姚桐斌同志做解剖检查。”这时，法医才作解释说：“在家只能作初步检查，去医院作解剖，才能作出权威的结论。”

1968年6月11日，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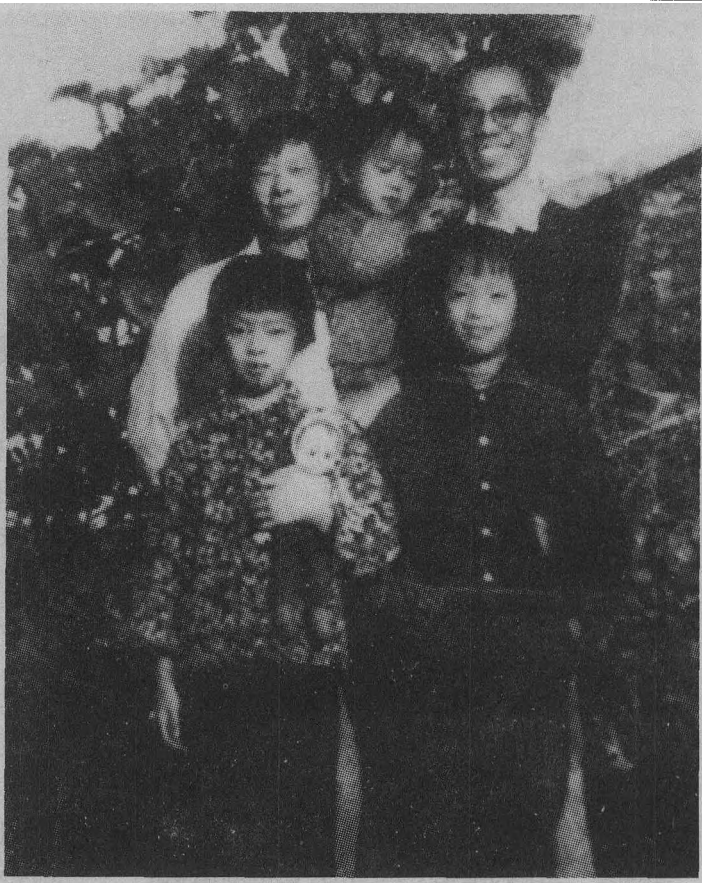
是一个大热天，阳光透过纱门，撒在我们房间的毛泽东主席的肖像上。由此，使我想起了《东方红》的歌，想起人民对于毛主席的称颂，不禁潸然泪下。无法控制感情的我朝着毛泽东肖像大喊：“毛主席啊！您救活桐斌吧！救活桐斌吧！”几天来闷在心里的悲痛像开了闸的水奔泻而出，孩子们被我的哭喊声惊醒，团团围住我，也大哭起来：“爸爸！我们要爸爸！我们要爸爸！”

只见解放军战士抬着冰块进了屋，才知道昨晚忘了插门。解放军战士发现我家哭成一团，不知所措，悄悄下楼请来了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医生扶我到卧室，为我作一般检查后，给我服了两片药，又打了一针，劝我：“你要想开点，好好休息。你把身体搞垮了，几个孩子就更可怜了。”我凄然不语，她的眼眶也红了。

中午大孩子催我们吃饭，桌上摆了好几样菜，我以为全是她做的，还是老二告诉我，是新新的妈妈让新新送给我们家的。新新的父母由美国归来，父亲也在七机部，在另一个研究所任副所长，据说前几天还挨过批斗。在这个当口送菜给我们，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入夜，我早早打发孩子们睡觉。军代表带领好几个战士，乘海军医院一辆大汽车赶来，将桐斌的遗体抬进车里。我们都一起同车前往海军医院。车停在解剖室门前，我要求随桐斌遗体一起进去，被军代表劝阻，并留下一人陪着我。

陪着我的军代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点点红光闪现在我眼前。一直昏昏沉沉的我，想起我们刚到北京时就住在海军医院隔壁，当时我曾对桐斌说：“住在这儿真不赖，要看病多方便。”他笑着回答：“这是海军医院，我们怎么能去？”他现



1967年姚桐斌一家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在真的进去了，但不是看病，而是验尸。想起人的生死祸福，想起我家的不幸，不由仰面发誓：“苍天作证，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申冤，为我的丈夫报仇！”

待法医和军代表从解剖室出来，天已经很晚了。我询问解剖结果，法医说要写一个书面报告交军管会，以后再转给我。我只好坐军代表的车回我的家。

后来，我看到1968年6月12日局治技字第81号鉴定书，该书称：对死者姚桐斌的尸体检验鉴定意见：1、死者头部左侧有典型的条状挫裂伤，左侧头皮下广泛血肿，颅骨条状塌陷性骨折，硬脑膜破裂，硬脑膜外及硬脑膜下，有大面积血肿形成，脑质挫裂伤，脑受压，脑水肿，符合于被钝器猛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左顶部外侧前后纵行的几处挫裂伤是致命伤。

（此文系编者根据彭洁清《航天情——永远的眷恋》一书有关章节摘编）

（责任编辑 洛松）

温济泽与温良恭俭让

● 曾彦修

在2月7日上海《文汇报》上看到邵燕祥《一个难得的共产党员（读《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后，我即提笔写此文。因为文中提到了我，而我是绝不敢当的，故而必须表个态。

文中说：“他的老战友曾彦修说从许多方面看，温济泽都是一个难得的（好）共产党员，共产党应以有温这样的党员为骄傲。”在厚厚的一本纪念文集中，燕祥同志找出这两句来加以发挥，我当然感到极其荣幸。但又不得不说明几句，“老战友”三字我是绝不敢当的，也不好默认。

我不得不说明的是，我绝无资格称为温的老战友，温作为共产党员坐监的时候，我才十来岁，温比我早加入共产党八年，因此他是我名副其实的革命长辈。至于在知识和革命功业上，我更不及他的数十分之一，这是事实，所以我不得不作此说明。

但是，对我的这两句话，恐怕有不少人会不同意。其中有一种是囿于多年养成的老观念，甚至会嘲笑以至愤怒地说，我说的太出格了，温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有什么了不得呢，你这话也未免口气太大了。是的，温在解放后最高不过是中央广播局副局长，离休时也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按习惯，这不过是千千万万中层干部之一罢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普通之至。这样的人能代表党吗？我说，恰恰是这样的人代表了党的光明面。

老百姓看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以人的职位大小定高下。湖州张建智先生有一本书叫《中国的狱神庙》，原稿令我看过去，其中有一个狱神，就是广东增城县的一个看监牢子的名字，竟与皋陶、萧何这些同为狱神的大人物们并列。由于他

对犯人特好，所以得到一切人的赞美。而这是经过明代时的省级司法机关同意并转报中央司法机关批准了的。

可见，老百姓是不看你官职高低，而是只看你人的好赖的。党的威信的来源根本上也是如此。党的高级领导人固然重要，但那么多一生埋头苦干、不计荣利、不计生死、终生苦斗、继之以死的，像温济泽这样半尘不染的大量党员的活动，才更是党的威信的来源，才能把党撑持到今天，使党得到发扬光大。可惜，七八十年来，从前苏联起，就把历史颠倒了，我们学习的全是个人决定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举个大家眼见的通俗例子：苏德战争的苏联电影，大多就是斯大林与希特勒两人在那里斗法，偶有战士出场，也是不得不有的龙套而已。中国很多解放战争的电影，更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在那里斗法，战士的龙套任务，比苏联片还不如。但是，我几次从电视上看过西方拍的《（世界上）最长的一天》电影，是专写1944年6月6日，英、美、法、加等盟军在西欧诺曼底海岸登陆作战的，血战了24小时，电影中出现的最高人物，是美军一个少校。（作为走过场，艾森豪威尔等是否在英国总部出现过，我已记不清了。）我们叫了几十年的群众观点，宣传的恰恰是个人决定历史的超英雄史观。从1938年起我们就差不多只学制造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斯大林的《联共党史》。

我是1978年初秋，偶然地从李慎之同志处听说温济泽也在1957年被定了“右派”。听说后，我掉了眼泪。温也是右派，那末，还有何人不可以定为右派呢？

后来，温济泽成了第一个被“平反”的“右

派”，是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毅然决定为他平反的，足见胡早已认为把温定为“右派”是多么荒唐的事！

那么，温济泽究竟有哪些地方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的呢？我想在平常习惯以政治为中心的优点之外，另外提几点他个人特具的、然而又是大家特别值得学习的优点和特点。

第一，是温刻苦学习和钻研自然科学的精神。温入狱之前，仅读过初中性质的学校，自然

科学的程度当然不可能高。他三次坐监几年，尤其是最后一次，长达五、六年之久，他在狱中固然找了当时所能得到的零星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来看，此外，他在狱中主要是学自然科学，这方面的书，狱方不限制。温不仅很快把高中自然科学书学完，而且把大学普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天文这类书，也尽量找来拼命研读。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有些书，如《普通物理学》、汤普生的《科学大纲》之类书，他都找来读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因编书事我同他住在一个宾馆几天，得知他在狱中学习自然科学的简况。他说，他先学高中自然科学书，困难不大。然后就是学大学的基础自然科学课程。温还说，他的数学基础差，因为数学要动手演算，但狱中纸笔较难寻到。尤其麻烦的是，狱卒一看见就要没收纸笔，还要严格处分。所以偷偷弄来一点铅笔纸张，又无刀片，很难办。以上说的是温在狱中的情况。我们现在也要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了，自然科学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应当学习温济泽在狱中也全力学习自然科学的精神。

第二，是学习温济泽的“温良恭俭让”。学习他的人情味，终生和气待人，循循善诱，永远温尔雅的态度和作风。有人会问：“温良恭俭让”不是早就批倒批臭了吗？我以为，不必理它。不是连



温济泽（左）与李铁映在一起

让农民吃饱肚子也要批倒批臭吗？我们必须把坚强的党性与美丽的人性结合在一起。这两者决不是一个消灭一个的问题，而是二者缺一不可的问题。如果消灭了温良恭俭让，还谈得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吗？党在今后逐步走上领导高度知识经济化的建设中，就必须同一切知识经济体现者们，永远保持亲密无间，情如一家关系，而决不是什么一时利用谁谁谁的积极性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温济泽老当益壮，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其实，这是安度晚年的一个最好方法。而且这样更能延年益寿，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永远是朝气蓬勃的。温退休后，行政事务少了，除开他做的大量别的工作不说，仅就他编成15卷《瞿秋白文集》和10卷《革命烈士传》两件事来说，就是一件极难得的事。以烈士传来说，并不是编选现成的文章，而是新拟名单，绝大部分是初次编写的，所以工作量很大。而人物的挑选，没有他这样的革命老资历和公平的态度，也是难于胜任的。没有始终熊熊如火的革命热情，温济泽能够在七十几岁以后再干它十多年，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

所以，温一生职务虽不高，但他一生对革命，对文化，对做人态度，对领导作风的贡献，却是不多见的，所以我才敢说“共产党应以有温济泽这样的党员为骄傲”的话。（责任编辑 方可）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 陈大斌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永嘉1956年的试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源头。

杜润生说,永嘉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永嘉的这次试验开创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说,“永嘉包产到户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它同凤阳的胜利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共同的真理。”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先行者们为县委领导、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和一些区乡的干部,其中贡献突出的有三位: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试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派到燎原社进行试点的工作组组长、亲手完成试点全过程各项工作的,并写出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总结的戴洁天。这三位里,与我有点交往的只有戴洁天一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人谦和的学者,了解加深之后,更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正直的品格,重实践做实事,脚踏实地的作风所感动。正是从他身上,我认识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先行者们的胸襟和胆识。

与农民、农村共命运的知识分子

戴洁天是浙江省瑞安县人,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就接近党的外围组织,后在

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时,投入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加剧,大批爱国、进步学生疏散离校,戴洁天回到温州,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个地下小组,温州解放后,戴洁天参加永嘉青年工作队,配合进城部队做好城市宣传和接管工作。1950年戴洁天进浙江省干校土改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回温州专区永嘉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与永嘉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互助合作运动兴起后,他常年在乡下办社,与农民共同生活,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县里的人们说,“这个大学生可真是从里到外,真正工农化了。”

1955年冬天,永嘉全县出现合作化高潮,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的集体农庄(高级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三溪区潘桥农庄。这个农庄以一个高级社为核心,吸收周围15个初级社、一批互助组和一批单干农户,组成一个有1184户人口,8456亩土地的大型农庄。戴洁天是县里派来的建社工作组组长。建社完成时正赶上春节,只见到处红旗飞扬,村村敲锣打鼓迎“高潮”,社社演戏庆“升级”。可春节一过,开始备耕,社干部们才发现,面对如此庞大的农庄,上千男女劳动力,不知该如何有序地组织生产,合理计酬,只好仍然沿用小型初级社的办法,包工到生产队,队长天天忙派工,夜夜忙评分。戴洁天感到问题严重,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春耕大忙一到,全社肯定会乱成一锅粥。眼下社员口粮普遍紧张,如果不能有效组织社员搞好生产,增产粮食,今后合作社如何巩固?社员靠什么生活?他当机立断向上级提出报告,要求在完成建社任务后,继续留在潘桥社“解剖麻雀”,帮助社干部摸索如何搞好大社的生产管理,发展生产。

得到批准后,戴洁天就在潘桥扎下来,他选定农庄主席谢文法所在的生产队作为试点。他先是白天跟随社员下田干各种农活,夜晚参加评分。做完这一切例行工作后,再召集社干部研究生产管理问题。戴洁天很快便看到问题的症结:这里实行的粗放管理办法,干什么集体伙干,只有大包工,没有小段计划,计酬仍然是“死分活评”,“白天大伙一起混,夜晚面红耳赤争。”这时,正巧浙江省委农工部印发了一个《改进生产管理》的小册子,介绍了《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可惜小册子里只介绍了这个名称,却无具体做法,也没有可参考的实例。即使如此,戴洁天也很受启发,他多年探求的目标就是要解决社员责任心不强,农活质量无法保证的问题,这个“个人专管地段”里大有文章可做。过去一直是包工包产到队,至多包到作业组,绝不允许包到社员包到户。这个“个人专管地段”就突破了包工不可到人的禁区。结合过去实行过的小段包工的经验,他和社干部一起着手改进生产管理。首先是划小、加强基层劳动组织,全社以行政村

为基础,划为7个大队,55个生产队,生产队固定作业区(专管),以生产队为包工包产核算单位;然后是全社建立“四包”责任制,生产队向合作社“四包”,作业组向生产队“四包”,而社员个人,按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固定管理一定的耕地面积(社员个人专管)。这就叫“个人专管”,“联地到人”。几个措施的实行,把“专管制”与层层“四包”,与按件计酬结合起来,建立起“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从而使潘桥

社生产管理上了一个台阶,正常生产秩序初步建立起来,队长、社长觉得好管了,全社的生产管理面貌从此大变。

试行两个月后,戴洁天写出《潘桥社建立个人专管地段的生产和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报告》,中共温州地委在报告上批道:“这种办法是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一种高级形式的管理制度。”

决心从实际出发,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实行这种专管制,解决了生产管理上的“大呼隆”,使生产秩序大为改观,但这种办法只“联地到人”,却不联系产量,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社员的生产责任心不强,劳动质量无保证的问题。社员说,增产一千斤,也没有我一斤的好处。社员们出勤多了,并不愿多出力流汗,更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干好每一件农活。而搞农业种庄稼,是开“露天工厂”,受制

于天,受限地,既是社会生产过程,又是生物的生长过程。所以,农业的管理绝不比工业管理容易,人的责任心至关重要。农业生产还有一个特点,从种到收,要几个月时间,劳动环节很多,每个环节都没有最终成果,但每个环节都对最终成果——作物产量产生直接的、无法挽回的影响。只要哪一个环节没做好,其他环节的劳动可能全部劳而无功。只有从种到收,每一个环节,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才可保证这一季庄稼丰收。所以农



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试验三位主要人物。左为李云河,右为戴洁天,中为李桂茂

业上真正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能够让社员们人人关心生产,时时事事注意农活质量,尽力尽心地做好每个工序的劳动。戴洁天说,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农业生产中的责任制,绝对不能离开包工到人,而且还一定要联系产量。要搞好高级社的管理,就要在个人专管制、联地到人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建立联系产量计酬的包工包产到人到户的责任制。

戴洁天此议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大伙都说这个办法准灵。可是,从合作化兴起就狠批单干是资本主义,大集体才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的是“时时集体,事事集体”。当时上级已有明文规定,“三包”也好,“四包”也罢,只能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最多是作业组向生产队承包,绝不允许个人承包。这种既包工又包产,而且还要包到人、包到户的办法,能够实行吗?

戴洁天的想法得到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让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发言。李桂茂是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山东老干部,1949年南下来到永嘉。他作风深入,熟知农村情况,了解农民,重实际、敢负责。在合作化问题上,一直注意从实际出发。他是永嘉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者。县委宣传部长李云河(这年6月他才升任县委副书记),也积极支持包产到户试验。恰在这时,《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刊登了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当包工包产》,介绍了安徽芜湖、四川江津一些农业社包工包产的情况,支持这些地方试行的包产到组、到户的做法。永嘉县委看了此文大受鼓舞和启发,更坚定了搞联产到户责任制试验的决心。李桂茂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上常委们意见分歧,支持的、反对的各有四票,是试还是不试?最后的决策系于李桂茂一人。这关键时刻,李桂茂当即拍板,决定在三溪区潘桥社进行包工包产到户试点(后因故又将试点改在李桂茂在土改中的基点乡燎原农业社进行),并决定戴洁天担任县委试点工作组长。

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大社,有778户,3600口人,有水田5400多亩。1956年5月戴洁天带领县委试点工作组来到燎原社,决心通过与群众共同的实践搞好试验。在燎原社试点的十

个月里,他白天下田劳动,在生产中了解、发现问题,夜间开会研究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农活种类繁多,地块不同,季节有异,要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回忆起当年在燎原社的试验,戴洁天说,“当时,我就住在会计室的后间,在小学里搭伙。我和社干部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每天夜里工作到下半夜,没补贴,没有例假日,不计报酬,不计名利,积极苦干。尽管生活清苦,但我们并不感到难受,反而感到其乐无穷。因为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建立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既符合社员心愿,又符合党的政策要求,既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责任制。”“全体同志意志坚强,忘我工作,夜以继日,经常油尽鸡鸣,不觉东方之既白,肚子饿了,喝一瓢冷水充饥,相顾笑语。我们是在实践中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从5月到9月,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探索,试点组拿出了一整套实行联产承包的经验来。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份总结既可实际操作,又有理论上的阐述,是对这次包到户实践进行的科学、系统的总结。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这是中国第一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进行深入、系统、科学的总结。时间虽然过去45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

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包产到户总结

戴洁天写的这份《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管理特点,就是应该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南方水稻地区生产特点相结合。”“总结”正是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永嘉当地实际情况,阐述了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总结”细致地分析了当时燎原社的基本情况:实现高级合作化后,“生产关系改变了,劳动组织变了,不仅从个体经营变为集体经营,而且较小社的劳动组织规模,已扩大了三、四倍以上。”“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劳动组织,具有某些大生产的特点。”而“作为社会生产力最

活跃因素的农民来说”，“劳动热情高涨”。“但作为劳动工具来说，除抽水机以外，仍然是古老的落后的。自然条件方面，除增加几条灌溉渠以外，都还受工具的限制，基本是一〇〇七部队（一条扁担，两只粪桶，一把锄头为主要工具）”。这样一来，“新问题就很明显地暴露出来，那就是独立生产单位中，拥有很多劳动力，劳动出勤率很高，原来不下田或很少下田的人，现在也投入生产了。这么多劳动者，带着古老的手工工具，拥到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依着小农经营方式，进行细致复杂的生产”，“小块地上拥着一大堆人，一件农活经过许多人合作，就很难正确执行按件计酬”，“很难保证劳动质量”，“一窝蜂的生产，必然带来评分‘满堂红’与管理一团糟的混乱状态”。生产队长“面对着几十个强弱不同的劳力，小块分散的土地，复杂的生产内容与精致的耕作技术，加以生产不一的作物，晴雨不常的天气，很难进行计划管理和建立正常的秩序，往往束手无策，放松领导，放任自流，使社员合作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社员与社员之间关系紧张”，因而，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行包产到户是最简便有效的办法。

“总结”提出，合作社应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大生产方式来积极兴修水利、搞基本建设、抗拒灾害，改造自然条件来适应集体生产”。而“对于田间管理中的耘田除草，以及饲养积肥，则采取‘个人专管、分户经营’的办法。既要发挥集体经营优越性，又要充分利用小生产小规范经营的积极作用”。

燎原社总结对建立生产责任制为什么要联系产量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对如何检验社员劳动质量这个中心环节，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劳动质量对产量高低影响甚大”，但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劳动质量好坏一时不明显”，只有“到收成时才能从产量看出来”。《总结》说，“产是工的实际后果”，“产也是工的实际鉴定”。所以要“以产来鉴定工的价值”。联系产量、包产到户是贯彻责任制的必然要求。结论是：“离开产量的责任制就不是真正责任制”。

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已经触及到了农业集体经济生产管理方面的核心问题，对一些带

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实践和探索者们的结论，也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包产到户试验成功和戴洁天的总结，改变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怀疑、斥责之声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中共永嘉县委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决心让燎原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试行。1956年9月17日，县委书记李桂茂不顾各方的议论，毅然决定，召开全县合作社社长千人大会，在全县不同类型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议文件要求全县“不管山区平原半山区，都可以推行个人专管地段分工到丘、责任到户”。从此，包产到户在永嘉由一社试验进入了全县“多点试验”的阶段。很快，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占农户总数42%的人口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地区各县也很快受到“传染”，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也实行起来，据统计，1957年春天，温州地区各县共有1000多个合作社自发、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15%。

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触及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最敏感问题，其主张和做法与当时党和国家推行的合作化主流不相一致，在某些人看来，属离经叛道之举。试验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论争。

这场公开大论争的开场锣鼓是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敲响的。在永嘉县委决定多点试验之后的两个月，即1956年11月19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一篇评论：《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文章武断地给永嘉的试验戴了帽子，定了性，说这是“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倒退到分散经营”。而对燎原社试点后社员劳动积极性高涨的事实，评论说，这种办法调动起来的是“个体生产积极性”。

永嘉县委不服。在李桂茂主持下，决定向温州地委和《浙南大众报》社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在地委会议上，李桂茂与《浙南大众报》总编辑面对面地进行争辩。县委还决定对《浙南大众报》的责难进行公开答辩。戴洁天等联名写文章

寄给《浙江日报》。李桂茂召集不久前刚从县委宣传部长升任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戴洁天等人商讨,写出了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上报中共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党中央农村工作部。这份专题报告在戴洁天《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的基础上,对包产到户理论上的正确,实践中的突出作用,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述。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说,“这是全面阐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第一篇论文”。文章概括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雄辩地回答、驳斥了对包产到户的种种责难。

永嘉县和温州地区,为包产到户展开的争论,引起浙江省委的重视。1957年1月,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召开调研会,永嘉县委派出李云河和戴洁天两人去杭州参加。会上,戴洁天代表永嘉县委向省委详细汇报了燎原社试点情况,并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包产到户的性质、作用。

林乎加听了戴洁天的汇报后,对“永嘉提的‘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这四句话予以肯定。他说,责任到户是好的。“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不过这四句话的排列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营’是第一句,‘三包到队’是第二句,‘定额到丘’是第三句,‘责任到户’是第四句。永嘉对生产管理是动了脑筋的,十几条中(永嘉戴洁天汇报了包产到户后的十项政策问题),有很多东西是好的,这样具体是否行得通,是否走样子,要研究,从多数人水平出发不要太复杂。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一句话的口号(包产到户)是简单化了些,四句话就完整了。”

林乎加表态不久,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李云河署名的永嘉县委专题报告《“专管制”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使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第一次关于“包产到户”大辩论中,戴洁天执笔写了另一篇长文,这就是以永嘉县委的名义上报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典型”材料:《中共永嘉县委关于燎原社在三包到队基础

上试行生产责任制到户的报告》,此文除了介绍情况外,在理论上就包产到户有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和探索。文章开门见山说,“高级社后迅速上涨发展生产的要求已逐渐地与原有的管理水平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干活‘一窝蜂’、评分‘满堂红’的‘人海战术’,造成管理困难,生产不便,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折了社员集体劳动的热情,影响了按劳动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正确体现。因之影响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巩固,不少农民认为入了社就是‘交了家’,分公家的粮,干公家的事,甚至也有把自己比作给社里当长工,因此干活挑肥拣瘦,讲量不求质,真是‘分粮嫌秤短,干活嫌天长’。公共财物任风吹雨打,肥料任意乱施,赚得工分,就算达到要求,不管肥份利用与成本高低如何。以上情况的出现,使贪懒社员增加,勤劳忠实社员的生产情绪与物质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虽不是主流,但是它却影响了生产力的继续提高与新生产关系的巩固。”“不解决这些新矛盾,就会影响新的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完善,对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障碍。”

可惜,这篇“典型材料”上报后,没有能够按原计划向大会散发,此文也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至今鲜为人知。好在中共永嘉县委的历史档案里,完好地保存了这份材料,使得我们有幸得见。

这场大论争从永嘉、温州开始,逐渐扩大到浙江全省,涉及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省、地两级党报发表双方多篇文章,前后延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10月,中央一级新闻媒体也参加进来,这场论争的影响扩大到全国。不过,这时已处“反右”高潮之中,论争已经变质,成了严酷的政治批判。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该社记者写的报道《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这两家中央级的权威媒体联手向永嘉的试验发动了猛烈批判,指责永嘉县委的包产到户试验,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是“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这场论争的发难者《浙南大众报》更是提高了调门,文章的题目就是一个政治大批判口号:《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1957年7月13日《浙南大众报》)这篇杀气腾腾的“评

论”说永嘉的试验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场论争最终变成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残酷的批判、斗争之后，无情打击的“组织处理”接踵而来。

1957年春天，形势逆转。据说，浙江有人向北京告了“御状”，上面发下话来，浙江省委也顶不住

了，就下令永嘉停止试验，凡实行了的地方，立即全面纠正。永嘉县委领导和有关人员，从此成了批判的对象。到了夏天，“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有关人员全部跌入“反右”的漫天火海，无一幸免。

1957年7月，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浙江省、温州地区对包产到户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了。浙江省委派出工作组到永嘉处理包产到户事件。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批判永嘉“包产到户是路线性原则性错误”。9月14日，永嘉县常委会向县党代会做的工作报告，肯定了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性质”，温州地委很快改组了永嘉县委，在全地区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批判。

几个月后，1958年2月21日，浙江省委批准永嘉县委的报告，开始对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主要人物进行“组织处理”。永嘉县委从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一批人遭受残酷打击、迫害，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从合作化以来，在全国各地出现过若干地方搞包产到户被打下去事件，无数干部惨遭打击迫害。但像永嘉这样打击面之大，打击程度之残酷，不是仅有，也属罕见。在试验中三位贡献最大的代表人物，自然更是无法逃脱。

李桂茂最初也要定为右派分子，作敌我矛盾处理。最后报到省委，据说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说了话，认为他的错误严重，责任重大，但



1998年8月永嘉包产到户试验42周年座谈会人员留影。左四为杜润生、左三为朱厚泽、左二为戴洁天

念及他是从战火中出生入死走过来的有功之人，决定对其网开一面，定为“中右”，撤销党内职务，从温州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降到另一个县的一个公社管委会担任副职。

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

在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几个代表人物中，戴洁天为试验付出的心力最多，最后受的处分也最惨重，被法庭进行刑事判决：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判决刑期是管制劳动三年。

戴洁天被开除团籍和公职，送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押送上路时妻子没有话别，也不敢相送，只有四岁的大女儿跟在后面，一路嚎啕大哭。轮船离岸开走很远，戴洁天还听到女儿在声嘶力竭地哭喊：爸爸，你去哪里？听着这哭喊，这个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手拍船栏，泪如雨下，仰天长叹！

戴洁天由法警押送原籍瑞安县白门乡下川村交群众管制劳动。从此，他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了劳改生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偷看一下书报，也要被斥为阶级敌人妄图窥测方向的罪名。当时正值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高潮，生产瞎指挥，劳动组织军事化，青年上山砍树烧炭炼钢，老弱妇女下地耕作，大兵团作战，大锅饭食堂，每天折腾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吹号收工，早上两、三点钟又吹号起床到食堂吃点薄粥出工。由于劳动过度，戴洁天的两条腿已由酸痛转入麻

木,上下床只能用双手捧上放下。

从押送回乡管制之日起,他就再没有一分钱工资补贴,完全靠自食其力。那时农村生活全部军事化,实行政治评分,以他的政治条件只评给四分半,比妇女半劳力还低半分,口粮少得可怜,靠采集一些野荷、“革命草”(饲料)和别人丢弃的蕉藕根作口粮充饥。孩子们看见畜牧场热腾腾的猪食,都会垂涎。几个孩子都因营养严重不足,患上夜盲症,到了黄昏时刻就寸步难行,啼哭不止。面对如此惨境,戴洁天欲哭无泪,吟出几句令人辛酸的诗来:

身经缧绁非吾罪,累及倾巢神亦伤。

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菜饭香。

身处这样惨境,戴洁天没有灰心沉沦。他回乡不久,农村就陷入“大跃进”的狂潮和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农民苦不堪言。连累加饿,戴洁天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两臂不能平伸,双腿僵木,夜间连床都爬不上去。这时,他想的不是自己的苦,而是国家、人民的灾难。“一大二公”对生产的破坏,使他又想起在燎原社那场试验。如果当初能够继续试下去,把燎原社的做法普遍推行,何至有今天的大灾大难!心苦至极处,他吟了几句诗:“庙堂有策倡‘大统’,大地无情悲薄收。蚕到僵死丝未尽,万户啼饥我憾多。”真是身陷绝境,心忧天下!

正当戴洁天在瑞安老家苦挨日月时,被撤职降级的永嘉县委老书记李桂茂,也被发配到瑞安塘下公社当副主任。一天,这两位天涯沦落人在塘下见了面。李桂茂见了戴洁天的惨状,抱头痛哭,说试验是我们决定搞的,当时你吃苦最多,受处分又是你最重。我总还有一点工资,有口饭吃,你连个饭碗都没有了!我对不起你啊!可现在我爱莫能助,你好好保重身体,等待来日吧!

而这时,戴洁天对自己一向崇敬的老书记诉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苦难。他说,几年来自己作为自食其力的种田人,切身体验到集体生产迫切需要责任制,更坚信我们过去做的没有错。

身陷困境,生死难料之时,他仍然想的是国家、人民的命运!这就是先行者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

经历了二十几年春秋的风风雨雨,永嘉在1956年的“包产到户”试验,终于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在试验中作出贡献而被以各种罪名打倒的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一批先行者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貌:被讨伐多年的“包产到户”,原来是救国救民的良策,身陷万劫不复的罪人,本是探索改革之路的功臣。

永嘉1956年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立即引来了人们的关注,一时间成了舆论中的一个热点。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争相报道,史学、经济学学者,从事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研究的专家们,倾注心血,一篇又一篇评论、研究文章问世。文艺界也跟了上来,有报告文学等作品出版发行。包产到户试验先行者们,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敬佩景仰有加。其中有的人多次接受报刊、电视台采访,作报告,很快成了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其实,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考验。一向淡薄名利的戴洁天面对这样的“热闹”场面,总往后退,他埋头于自己的新工作——平反后,他辗转调入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致力于温州经济模式的研究,写了不少论文、调查报告。对于报刊、电视的采访,他始终保持“低调”。他说,1956年的试验成果是当时燎原社700多户社员、十几名社干部日夜辛劳探索出来的,是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我个人只不过是身处前线的普通一兵,没有群众办社的艰苦实践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哪来我们的文章?

后来,宣传中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有些基本史实竟被歪曲了,戴洁天挺气愤,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回应媒体的专访,对某些广为传播、但都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说法,尤其是歪曲史实、贬损老书记李桂茂的做法,(李桂茂远在临海,很少有记者采访,少有说明真相的机会)他仗义执言,道出历史真相。他说,我说的、写的东西,可能与某些报道,特别是与某些报告文学、访谈的内容,有所出入。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的责任是依照历史真实说话,反映事物本来的面貌,作为存史、资政的参考。“寒梅无意争春色,为报人间天地心。”经过一场浩劫之后,他对自己荣辱名利,都看得极淡,只追求做人的境界,他用这两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迹。

(作者原系《瞭望》杂志总编辑)

(责任编辑 程 度)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 陈铁健

从《多余的话》说起

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是因为写了狱中遗言《多余的话》而被打成叛徒的。因此，笔者这篇记述瞿案复查往事的文字，下笔伊始就不得不提起当年颇遭责难的拙著《重评〈多余的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刊出拙文后，主编黎澍说，胡乔木院长阅后说：“如果文尾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乔木显然在总体上肯定这篇文章，但批“凡是”那段话易招非议，令他担心。那段话是：

一切正直的学术工作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这种貌似马列主义，实则假马列主义的赝品。既要打破那种依恃权势，指鹿为马的霸道作风，又要反对那种信奉“两个凡是”，只看权力等级，不敢坚持真理的奴才心理。

这种作风与心理，今天已成为稀罕物，当年却是大有市场的。

1979年4月间，北京史学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大礼堂举行学术报告会。会议主席李新师要我就瞿秋白评价问题讲一点意见。我手持《重评》清样，扼要讲了我的见解。一位军队的政治教员看到清样，问文章是否准备发表？我说已发《历史研究》，他神色异样地问：“是真的吗？”《重评》在有些人眼里确属“离经叛道”。于是，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展开类于“文革”时派性小报《讨瞿战报》的大批判。有的作者竟是我素来尊敬的师辈。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我要求著文答辩，反而被拒。

6月间，我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

者执意要我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弄几个人来围攻，想打我个措手不及。真的是像黎澍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卫道者要打棍子的。”我看穿了这个把戏。答辩时，我告诉他们中的一位“勇者”：你的论据和语言都是重拾《讨瞿战报》之牙慧，站不住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真情和勇气，比那些自诩为一贯正确、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对瞿秋白不仅应予平反昭雪，而且应当为他树碑立传，不管有人怎样的不高兴。事后，我才知道那几位先生，特别是那位“勇者”曾经是当地红极一时的“讨瞿英雄”。会议组织大家到瑞金、上杭、长汀等地参观，安排的节目多半是毛泽东故居之类。我趁晚间休息，请一位朋友带我到长汀中山公园参谒秋白临刑前拍照小酌的凉亭，寻觅秋白囚室。夜色浓重，一无所见。翌日清早又独自赶去细看。凉亭已破败。囚室约一丈见方，白木地板，内置木床、书桌、木凳、木脸盆架等。窗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显长些的天井，原先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走出公园，步行到西门外罗汉岭秋白就义地。以中速行走，边走边记步速时间，约需20分钟。以当时秋白身体状况，至少要走40分钟。那座原来高耸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已被造反者改成革命烈士纪念碑，失去了它的独特魅力。

就在“英雄”们批我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我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电报无声，却有惊雷那样的震撼。原来在对《重评》围攻中同情我、但不敢公开表示支持的朋友们，喜形于色，纷纷道贺。几位“英雄”顿时一反常态，有的脸色黯然；有的殷勤有加，一再问我何时动身，好预先安排车子送行，



1999年1月,陈铁健(左)、瞿独伊(中)、赵庚林摄于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似乎围攻那件事,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世态炎凉,随风摇摆,“文革”把某些号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性格扭曲到怎样可怜而又可鄙的地步。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从闽西经江西赶往上海。

中央纪委第八组

7月1日,我乘火车抵达上海。在站台与复查组的常凡见面。常兄身材高大,脸庞端正,沉稳和气,彬彬有礼。我俩同是东北出生,一见如故,倍感亲切。当天日记写道:

昨乘178次车自南昌起程,今天上午9点27分抵沪。常凡同志以车接,住东湖招待所一号楼311房。此地为“海上闻人”杜月笙公馆之一,原杜美路七十号。前读台版杜月笙传,知此屋美仑美奂,今日目睹,果不其然也。中纪委孙克悠同志介绍瞿秋白复查组工作简况。据谈,四月,瞿氏胞妹、杭州瞿轶群和秋白女儿独伊,分别写信给中央,要求为秋白作结论。五月,陈云、胡耀邦同志指示,明年要为秋白同志作出公平的结论。中纪委调集五

人,成立瞿秋白复查组,对外称八组,以孙为组长。此次来沪以调查瞿氏早期革命活动为主,并召开一次座谈会,请了解秋白的同志谈对瞿评价问题。拟请沪纪委与宣传部门出面主持。邀请人员名单待由杭回沪后商定。要我多作些联络工作。

克悠大姐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老干部,曾与华国锋共事。大姐告诉我,八组筹建,先已借调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中纪委由她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她考虑应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参加,遂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院里请她到现代史研究室找李新。李新师说,我推荐我的学生、《重评〈多余的话〉》作者给你如何?克悠大姐说可真巧了,我们正要找他呐。我担心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大姐鼓励我说,你多做些文字和学术方面的事,大家分工合作,一定做得好。她不时就《多余的话》提出问题,一边问一边解析,像是自语也像说服他人。她敏感而又理智,宏达而又细腻。谈起瞿秋白,在钦敬中总是带着感喟和惋惜。我常有一种与大姐的思索相通的感觉,有什么想法愿意找她交流。在半年多工作过程中,我始终在克悠大姐的关照下,与大家一起愉快地顺利地完成了复查报告。24年过去了,我仍能深切感受到克悠大姐种种关怀的暖意。

杭州访瞿轶群

7月2日凌晨,车发上海赴杭州,拜访秋白胞妹轶群。小名群群的大妹,仅小秋白一岁,生于1900年,今已是八旬老人。1916年春节,母亲金衡玉因贫债交逼自杀之后,群群带着阿森(景白,10岁)、阿谷(坚白,4岁)暂住舅父金声侣家(先居常州斗巷,后迁江阴贤庄),1919年投奔杭州四伯父瞿世琥。景白后随秋白到上海大学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随秋白到苏联,在肃托运动中“失踪”,时年22岁。坚白1930年在浙江淳安县教育局做课员,不满国民党统治。1935年获悉大哥被蒋介石杀害,大哭一场。后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徐特立介绍入陕北公学学习。1944年,坚白32岁,在太行区第三地委调研室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牺牲于河北武安百草坪。家中在1949年收到第二野战军于同年8月13日寄出的慰问信,才知道坚白早已为国捐躯。

我们住在西湖公园附近的向阳招待所，两层小楼，类似民居，很不显眼。房内却是地毯、吊灯、空调、套间，陈设虽感稍旧，当年却是豪华富丽的。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曾是林立果在杭州的一处重要秘密据点。

当天下午，铁群长女王凌志来谈三小时，多为瞿家兄弟及王家家世。她说铁群长期心境不好，患心脏病多年，近日脉动每分钟仅45次，有心力衰竭之象。大家不禁为之担忧，而梅雨季节的西湖犹如销金锅、煮鸭池的气候，更增加了心情的郁闷。4日晚，省纪委二位负责人来作礼节性访谈，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也显出不那么积极，对瞿家所受迫害，无丝毫同情表示。原以为他们胆小怕事，不敢介入。谁知，我们还没回到北京，此地的告状信已经寄到中纪委，给我们加的罪名竟是与瞿秋白亲属频频接触，政治界限不清，为瞿秋白翻案。显而易见，在某些人眼里，瞿秋白依然被当作“叛徒”，连其亲属也属另类，永无翻身之日。

7月5日，铁群身体稍好。上午，我们到弥陀寺路92号拜访铁群。房间不大，陈设简朴。铁群坐在床上，慈眉善目，语调舒缓。她早年嫁人，丈夫吃喝嫖赌将她遗弃。秋白、之华1925年来杭州为她办理退婚手续。她后嫁工人王子白，“文革”中因秋白案被批斗，1975年患心脏病去世。铁群及子女均受秋白案牵连，屡遭迫害，她日夜盼望解决秋白问题。见面时，她注视北京来的每一个人，急切地询问“哪一位是陈同志？”她沉痛地说，当年哥哥被国民党屠杀，我们家人感到悲痛。几十年后，哥哥被自己人打成叛徒，掘了他和父母亲的坟墓，我们更感到悲痛寒心。这个打击比国民党的屠杀更残酷，怎么也无法接受。我给陈云同志写信，请求中央给秋白作结论。她说到《重评〈多余的话〉》时，连说感谢陈某，说是“读了你的文章，心里清爽了。”我注意到她手指着墙壁，那里用文具夹夹着《历史研究》第3期，以区别于摆在书架上的其他书刊。我被老人的真情打动了，也被追求历史真实的价值感动了。

铁群的回顾，使我更理解瞿氏一家在中国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和辛酸。逝者已矣，生者将如何自存？老人要求为秋白昭雪，岂止是一人一家的恩恩怨怨，难道不是中国人要求摆脱世纪苦难辛酸的强烈呼声，向

往光明自由的正当追求吗？

上海座谈会

返回上海第二天早饭后，克悠大姐带我们去看望住在东湖招待所7号楼的王震副总理。在座还有他的随员胡启立、伍绍祖和小张（张爱萍的公子）三位。王震是到上海主持新长征火炬长跑开幕式的。听到我们复查秋白案，他说起秋白1934年2月7日在瑞金叶坪“二七”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情形。毛泽东要铁路工人出身的王震主持大会，他特地邀请秋白到会讲话。他说那时秋白大名鼎鼎，受人尊敬。当他说到《多余的话》不好时，伍绍祖插话说那是严于解剖自己。胡启立则谈到，老同志应多写些回忆录供研究历史参考。

7月5日至9日，为在上海召开座谈会作准备，我们先后到市委、市政协、市档案馆、博物馆、鲁迅纪念馆，拜会陈沂、黄逸峰、李培南、罗文、杨兰、郑超麟、杨之英等。我单独到陈旭麓家中拜访，邀他出席座谈会，他慨然应允。听说要为秋白平反，他十分高兴，坚留我在家中午餐。说到秋白的《多余的话》，他认为那绝对是秋白的作品，别人是无法作伪的。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讲了同样的意见。

方行、丁景唐二公，是研究瞿秋白的元老，“文革”中备受冲击。他们不时到东湖招待所，畅谈瞿秋白研究诸事，提供访谈线索。丁公后来应邀一直陪同我们走访常州、南京，贡献良多。

杨之英是杨之华的胞妹，小她姐姐12岁，时年68岁。丈夫吴元坎曾任《大公报》记者，在上海不少出版社任编辑，并兼大学外语教授。大革命时期，之英随秋白夫妇在武汉、上海做地下交通员时，年仅15岁。“文革”中秋白、之华被打成叛徒、特务，之英全家受牵连，工资停发（每人每月仅发生活费15元）。除了变卖家具、首饰，只得举债度日。有时为了2元钱，不得不向保姆求借。谈到之华，之英说姐姐先被说成吹捧叛徒秋白，继而之华本人也被扣上特务、叛徒帽子，送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全家扫地出门。女儿独伊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独伊女儿晓女去内蒙插队。独伊母女都患严重胃病，先后到上海住在之英家中医治。1973年10月，之华病危才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

院。之英赶往北京探视,见姐姐已体瘦如柴,说话声若游丝,三天后即逝世。之华死前悄悄对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独伊始始终认为母亲死因不明,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四年之后,杨之华才予平反。

吴元坎身体欠佳,沉静少语。之英说他青年时代是很活跃的人,记者嘛!多半也是几十年人为的风风雨雨,把人的性格棱角全磨平了,成就了一位静观世事、参透人生、大彻大悟、深藏不露的智者。上世纪究竟造就了多少这样的智者,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对杨、吴二老产生了由衷的怜惜、同情和尊敬,还想有机会听他们讲述往昔故事。在二老盛情邀请下,加上他们的女儿吴幼英、女婿钱世锦的催促,我从常州、南京返回上海,专程往访杨家。坐定片刻,唐振常前辈也应邀来聚。之英、幼英母女下厨治饌,饭香、菜香、酒香和唐先生的美食宏论,使小小客厅洋溢着一片温馨和舒畅。

上海座谈会因为人多,分别在7月10日、11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方行、丁景唐、陆志仁、沈以行、蔡尚思、陈旭麓、陆诒、周晔、刘振海、蒋森荣、张炳隅、钱世锦、王铁仙(以上出席10日会议);许德良、陈一诚、温仰春、王尧山、陈修良、黄逸峰、黄有恒、李培南、罗竹风、汪原放、乐嗣炳、郑育芝、刘冰岩、杨之英、吴幼英、王凌志等(以上出席11日会议)。

10日会议,多为学者出席,所议围绕《多余的话》真伪及对秋白评价问题。蔡尚思讲话声音洪亮,他说:《多余的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敌人也许动过手脚。即使完全是秋白写的,不过表现其书生气十足罢了。说自己不宜作政治,只能作书生,自我批评,很老实。我们有些人的自我批评不如他。秋白没有出卖党,决不是叛徒。不能凭某个人一句话定论,否则学术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那个“顶峰论”害死人了。讲一口湖南话的陈旭麓说,《多余的话》与狱中诗词、致郭沫若信笔调一致,感情相同,我不怀疑它的真实性。秋白狱中文字没有求生之念,对敌人不抱幻想,只是自我解剖。秋白一生革命,应该照历史决议的结论来评价他。谈及党史,发言者一致指出,应该公布历史档案。党史许多问题至今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封闭档案?历史的惨痛教训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以免重

蹈覆辙。不公布历史档案,只对那些文过饰非、伪造历史的人有好处,而对党和人民有百害无一利。秋白昨日烈士,今日“叛徒”,领导人那样讲,真叫人心寒。当时的发言者,只把责任承担者看成是某个领导人,而没有洞察制度层面的弊端。

11日会议,与会者多是资历深厚、与秋白同时代的老同志,所议多为与秋白有关的历史问题。诸如大革命时瞿与陈独秀的争论,上海大学、八七会议、上海中央的地下斗争,秋白与共产国际、秋白与鲁迅及上海文化斗争,王明集团迫害秋白、秋白在中央苏区、秋白在狱中斗争等等,自然也离不开《多余的话》这个话题。当年在上海大学工作的许德良说,秋白从容就义,说他是叛徒,我很奇怪。上海大学教育方针是由他决定的,他为“上大”制定了一个好规划,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黄逸峰说,当年我们很崇拜他。他接替陈独秀做中央领导人,说明大家是拥护他的。也许我们都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受他影响很大,喜欢读他的文章。中共历史被歪曲的太多了,应当纠正过来。罗竹风说,说秋白是叛徒,我从来想不通。就义者是“叛徒”,如何才不是叛徒呢?连李大钊都成了“叛徒”,党内还有几个不是叛徒呢?30年代上海文坛谁是英雄,一是鲁迅,一是秋白,两人友谊多么深,功绩多么大呀!陈修良深情地说,我在1927年武汉时期就认识秋白、之华,他们是我最早的启蒙者。1928—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华、景白同学,关系很好。我听过秋白的课,对他很崇拜。《多余的话》实际是对王明极左路线不满,又不好明说。秋白深知上海地下党组织关系,可他对敌人一个字都没说。上海党被破坏是1935年6月,李竹声等从莫斯科回来的几个人全部叛变投敌。应该恢复秋白的历史地位,推倒一切诬蔑之词。温仰春1935年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他说,1926年参加革命前后读过秋白大量文章,当时进步青年多喜读秋白文章。对秋白功绩不应抹煞,对他的错误应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联系起来考虑。长征时不让秋白随行,是故意甩掉他。秋白从闽西经香港向上海转移,是陈毅的建议。秋白被俘后,未暴露秘密交通线,交通照旧通畅,证明他在狱中表现是很好的。李培南指出,长征时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老同志都随队长征,或骑马或坐担架,都安全到达陕北。秋白那样的重病人更

应随军长征，他是不是王明一伙有意制造的牺牲品？王尧山、陈一诚认为，《多余的话》即使真是秋白写的，也不能作为叛徒的依据。黄有恒说，1932年底，蒋介石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中共，有一些渣滓被当作宝贝收去。秋白这样的要人如果有一点叛变之意，蒋介石会不要他？黄有恒即黄平，留俄学生，中共早期党员，曾任驻莫代表，参加广州起义，中



瞿秋白复查小组成员与无锡江溪小学教师合影

共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后任复旦大学外语教授。30年代初被捕，他的谈话饱含伤心切肤之痛，很有说服力。

两次座谈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它集中反映了上海学术界和党政领导层对秋白历史评价问题的倾向。除证明秋白被俘后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外，对作为杰出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的秋白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并提供大量资料。它对复查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复查人员一次良好的学习机会。

常州·无锡·南京

上海座谈会结束当晚，我们与丁景唐、王铁仙一起赶赴常州，四天后又到南京。其间，先后往访常州秋白故居、冠英小学、常州中学、博物馆、无锡江溪小学、江阴贤庄环溪、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等。

常州为江南财赋重地，又是清乾嘉时期文化中心地之一，文风繁盛，名家辈出。我们住的长生巷招待所，原名近园，是清代大画家恽南田家宅，亦为常州著名园林。“文革”摧残痕迹园中随处可见，修复工程已经启动。经历浩劫后的常州给人以欣欣向荣气象。我后来多次赴常，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也许这就是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多部落，东

南无与常匹俦”，贯通常州古今的人文精神，养育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等杰出的人物。

羊牧之老人，小秋白一岁。羊母曾为瞿家保姆，牧之常住瞿家，又与秋白中学同学。后随秋白在上海大学、中央宣传部、中央联络处工作。时任常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他与秋白另一同学苏辛伯应邀向我们介绍秋白家世和革命生涯。羊老记忆力好，诗文背诵如流，谈来如数家珍，后来每到常州，我都登门求教。京常两地书信往还，多以秋白为谈论中心。

常州座谈会，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瑞具体组织的。文瑞抗战后期在山东军区第五旅作战时负伤，建国后到常州工作。1953年后，杨之华、陆定一、方行等先后致函或前来商谈筹建瞿秋白纪念陈列事宜。1959年正式成立筹建班子，羊牧之、陈弼等参加，由文瑞负责。同年接待苏联汉学家施奈德，施回国后写《瞿秋白》一书寄赠常州中学，“文革”中此事也算一罪。1963年戚本禹著文大批罗尔纲对于李秀成自述的研究，说李秀成是叛徒。毛泽东对自述有十六字批语，大意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并殃及瞿秋白《多余的话》。1964年秋白陈列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宁传达毛上述批示，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文革”开始，陈伯达等又对瞿秋白有更严厉的讲话。被煽动而起的北

京造反学生砸毁八宝山瞿秋白墓,查抄杨之华家。北京来的“讨瞿战斗队”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3月,不断在常州造反,砸毁瞿母金衡玉墓,并勒令烧毁秋白陈列文物(未果)。羊牧之被批斗,并诬为“老叛徒”、“老混蛋”。李文瑞被戴六顶帽子,李妻患病不准住院治疗;病重开刀,造反者就在病床前狠斗文瑞,李妻不久亡故。常州地区研究或宣传秋白的学者、报人,均被揪斗。天下不平事,在十年浩劫中无地不有,无处不留创痕,今日思之仍不无悚然之痛。

在常州市纪委和无锡市委同志陪同下,我们往访无锡南郊江溪桥的江溪小学。这是秋白在母亲自杀后任教的杨氏小学旧址。原屋已毁于火,周围是农田,门前马路原为河道,秋白当年可由表姐夫秦耐铭家坐船抵达校门。

7月18日,由常抵宁,住西康路招待所。此地是前美国驻华使馆旧址,依山丘筑室,景色宜人。我们的住室,据说原是司徒雷登大使的住所。到宁翌日,江苏省文化局长周邠来访。第三天,往访南京博物院负责人姚迁等,均围绕秋白纪念陈列问题进行调查,以求互相印证。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我们查到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悬赏通缉瞿秋白等七位中共要员的公文。内中瞿秋白、周恩来赏金每人2万元,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等五人各1万元。

常、宁两地事毕,孙克悠、常凡返京,我与丁景唐返沪。在30日返京前往访李子宽、罗竹风、夏征农、陆诒、方行、杨之英、吴元坎,并取来郑超麟所写有关秋白资料。行前,到丁景唐家告别,丁公以所著书文相赠,我回奉以《重评<多余的话>》。书生之交淡然如水,唯以文字相知而已。

秦城狱审戚本禹

回京第二天,8月1日我到中纪委八组报到上班。中央纪委由魏文伯(后为曹瑛)主管八组。这时在京的老王、李玲玉已从公安部借来瞿秋白案审查卷宗20卷,足有三尺厚。内中有蒋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参谋彭励、机要秘书陈定、司书高春霖、排长冯心田(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中统特务王杰夫、钱永健、朱培璜;福建保安十四

团二营营长李玉(带队追捕瞿秋白)、排长曾起(劫金后枪杀何叔衡)、士兵范金标、赖忠顺(俘获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词。公安部十三局在罗瑞卿部长直接指导下,积十年之功对瞿被俘后情况经过严密调查、侦审,已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作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正是常州秋白故居陈列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又过两月,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也先后将陈列中的秋白形象完全除掉。历史事件的真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某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1979年秋天,我们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此人是“四人帮”同案犯中最顽固分子。据狱警说,戚入狱后始终声称他是毛泽东路线忠实执行者,一切行动都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有百功而无一罪。拒绝与同案犯同时放风,只能单独“散步”。他很狡黠,坐定后,直勾勾地打量我们每个人,问孙、常是不是中直机关的,我是不是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直言不讳,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文章在1963年发表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强烈批评,戚已准备写书面检查。年底,江青找戚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1964年戚文第二篇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不少人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后来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六字“铁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内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翻死人的案,是

为了打活人,即以“路线斗争”为名,采取种种手段,必欲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止。刘少奇在几十年前谴责王明一伙制造党内斗争时,把它斥之为“黑暗的”、“罪恶的”党内斗争。结果他真的惨死于比王明路线更黑暗、更罪恶的“文革”浩劫之中,而瞿秋白也成为这幕丑剧的一个牺牲品。

一个时代的悲剧

从8月到12月,我们在北京走访了茅盾、丁玲、柯麟、庄东晓、萧三、陆定一、周扬、刘英、周建人、罗章龙、瞿独伊、宋希濂,并向京外知情者发函调查。同时就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向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调查部等单位咨询,均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印象最深的是与丁玲的会面。5月间,我写信给丁玲,请她谈谈瞿秋白。9月12日,丁玲回示,说她重读《多余的话》很受感动,赞同我对《多余的话》的观点。她要“写一版的文章”,谈她对秋白的认识,只是近来太忙,待年底再说。11月,她托克悠大姐捎来《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长文稿,希望我们看后交换意见。12月21日上午,我同克悠大姐如约来到木樨地她的寓所。见面第一句话她说:“我读《重评》,还以为是老先生写的呐!”丁玲对王剑虹、杨之华、瞿秋白充满深情,并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说,在上海大学时,秋白常对她说和王剑虹说“要脱胎换骨”。他忙于革命工作,难得照料病重的爱妻剑虹。妻死后,他总是在给丁玲的信中自责,说他对不起“梦可”(他给爱妻起的法文名字,意为“我的心”)。秋白有病且忙,生活不能自理,连买毛巾、牙膏都不会。杨之华照料得无微不至,使他全力投入工作和著述。1923年丁玲由秋白动员来上海大学,施存统劝她入党,秋白却说“飞吧,飞吧,飞得越高越好!”“实际是希望我在文学领域里飞翔驰骋。”30年代丁玲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入党,秋白参加了她的入党仪式。

说到《多余的话》,丁玲感慨不已。她说,当今给自己塑像的人多,生怕自我批评,更怕别人批评。像秋白这样坦然陈述自己的种种,这样的人今天太少了,秋白岂不是一个罕有其匹的大勇者!她说,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多余的话》呢?其中有些话会被某些思想简单而又浅薄的人据为把柄,发生误解或曲解。当今这个社会不健全,一个同志

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住不放,加以攻击。特别是当攻击者有权、有势、有帮、有派,棍棒齐下的时候,你怎能不回首自伤、感慨万端呢?而到自己将离世而去的时候,又怎能不叹息是“历史的误会”呢?我以为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苦。秋白一生遭遇的厄运,不是他自身的错误,而是他没有能够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知史令人醒悟

1980年春,《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调查报告》,经中央纪委审查通过。同年10月18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党,复查组宣告结束。

自那以后20多年,我写过不少关于瞿秋白的文字,但我都不满意,因为我未能对秋白悲剧的时代性、社会性、国际性进行彻底考察和深刻剖析;因为那个时代的观念、思维上的情结至今犹存,未能荡涤净尽。

中国的实用理性思维,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革命盛行并取得革命胜利的宏大庆典;而在此后的30年间,在自视为终极真理的指挥下,在非白即黑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误导下,中国人所饱受的人间苦难、思想压抑、精神屈辱,决不小于上半个世纪。仅仅“文革”十年,就是一场浩劫。近20年在力求实现迟来的现代化并在物质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文化现代化却不能不承继政治革命思想过分发达,人文思想相当贫乏和苍白的事实。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包括我)要在新世纪重振科学精神,保持学术真诚,还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它会让人看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清醒感悟,质疑反思;才会摆脱迷信,拒绝盲从;才会独立思考,不为党派所囿,不为教条所惑,不为旋律所迷,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禄所动,力戒附庸趋时,敢想敢言、敢作敢为。庶几如此,方可告慰于已逝去那个年代因革命而牺牲,因内斗而被害,因人祸而饿死……的仁人志士和父老乡亲们。

(责任编辑 庄建平)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志气,为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频频向教育战线疯狂进攻。就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这个文件是由迟群找人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塞到“全教会纪要”中,用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全国。

第一个估计,说从全国解放到“文革”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稿说:“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张春桥在改稿上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稿还全盘否定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就肯定的“高教六十条”。

第二个估计,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吉伟青

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只是“不同程度的进步”。张春桥还在改稿上,加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污蔑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基本内容。

1971年全教会“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两顶大帽子紧紧扣在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头上。到了1977年,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人们的思想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没有人敢于触动“四人帮”用中央名义下发的《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正在此时,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有学者、教授和专家参加的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小平同志首先对大家最关心的“两个估计”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地说:十七年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两个估计”必须马上组织写作力量进行彻底批判。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两个估计”出台背景,以《情况汇编》的形式,上报了中央。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复。他还专门就这份材料,召集教育部领导进行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9月19日,小平同志又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再一次明确要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所谓“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纪要》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纪

要》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

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他提出立即恢复废除十年的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最后他说,教育要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要敢于大胆讲话。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的,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二

小平同志在1977年9月19日对教育部语重心长的批评,教育部党组十分重视,于9月底,一方面立即安排大学招生事宜,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另一方面,党组决定由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琦挂帅,抽调专人组织写作班子。

在酝酿撰写批判“两个估计”文章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批“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个经毛主席圈阅过的中央文件,这在当时是个棘手的问题。虽然李琦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的讲话精神,但是,写作组的吉伟青和罗劲柏等对批毛主席圈阅过的红头文件(即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事,仍心有疑虑。在李琦耐心解释和指导下,写作组拟定了撰写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和文章的框架,并暂定题目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以下简称《论战》),同时,还设定写这篇文章的四条原则:

(一)这篇文章是批“四人帮”谬论的头一篇文章,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有气势,应该“高屋建瓴”,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求写作组每人写一部分,然后集体讨论,由吉伟青、罗劲柏汇总修改。

(二)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消除思想顾虑,放开胆量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正确的论据辨是非,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大量事实,彻底揭露“四人帮”篡改历史,污

蔑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罪行。

(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放以来至“文革”前十七年的各个历史时期,教育战线克服种种困难,力图奋进,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作出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工作的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公正的评价。

(四)写作组既是撰稿者,又是组织者,要做好这篇文章,就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不能只在饭店里闭门造车,并强调多多征求有关领导和教育战线上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使这篇文章成为发挥集体智慧,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佳作。

在《论战》写作的后期,正当写作组和部领导感到稿子显得有点平淡,批判的力度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在偶然间,发现了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问题曾同“四人帮”部分成员谈过一次话,针对“两个估计”发表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帮”为掩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一直未向与会同志传达,只在“四人帮”分管科教工作的极少数骨干和亲信中作过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怎样发现的呢?过程是这样的:

说来也是一个“奇遇”。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线索的是《人民教育》编辑部的孙长江,他当时是审查“四人帮”在教育部的骨干分子薛玉珊的专案组组长。他在查看薛的笔记本时,发现薛笔记本上有记录不全的毛主席指示。他立即向李琦作了汇报,引起高度重视,随即教育部党组请示中央审查办,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当时是“四人帮”安插在教育战线的亲信,任科教组组长、副组长)的笔记本。由孙长江负责审阅核对他们笔记本中关于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指示的记录。整理后,经写作组研究,建议写进《论战》稿中。此建议报教育部党组请示胡乔木,获得同意。写作组在文稿中用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谬论,同时,也揭露了“四人帮”封锁毛主席指示的险恶用心。

李琦曾三次将《论战》草稿送请乔木审阅修改。乔木看得很仔细,在他审阅第一稿后,送请小平审阅,10月31日小平批示:“此稿写的不算很

好,但还可以用。”按照小平的指示又对草稿逐句进行修改。

在乔木审查第二稿时,他在草稿中引录的毛主席 1971 年全教会期间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之前之后,加上了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却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 1971 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注:毛主席 1971 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因到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查到原文,故发表时称作是“毛主席指示精神”。)

乔木增加的这两段话,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

审阅修改后的草稿清样,由胡乔木于 11 月 13 日径直报送邓小平审核,11 月 17 日上午,稿子退回。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得到这一消息,全教育部都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乔木还批示,《论战》可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并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197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次日该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教育事业大

有希望》。1977 年第 12 期《红旗》杂志全文刊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 11 月 19 日至 20 日前后全文刊登。人民出版社也于 1977 年 11 月出版了《论战》单行本(书内还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人民教育》杂志也在 1977 年第 2 期(1977 年 11 月出版)全文刊载。

《论战》发表的当天,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心情激昂,在教育界人们欣喜万分,纷纷奔走相告,有的学校还集会庆贺。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中小学教师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有的同志说:我们解放了,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被砸碎了。有的同志说:“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把十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歪曲。19 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还刊登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全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批判“两个估计”的讲话。11 月 20 日教育部和《人民日报》邀请部分教育工作者座谈,北大校长周培源深有感慨地说:“两个估计”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全省工作会议上发表“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教育搞上去”的重要讲话。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何东昌批判“四人帮”否定高教“六十条”的罪行的文章,他说,周总理肯定高教“六十条”是正确的,“四人帮”就歇斯底里地反对。上海市教育局揭发“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在全教会前后炮制“两个估计”的种种罪行。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班座谈会上也系统批判了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论战》发表后,对文艺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77 年 12 月 2 日,文艺界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茅盾、刘白羽、贺敬之等同志纷纷著文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他各条战线反对和批判“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言论和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文作者曾任《新建设》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教育》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77 年秋是批判“两个估计”的写作组成员,负责写作组日常工作)

(责任编辑 江之洲)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评析(上)

● 吴 江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功绩是摧毁封建专制主义,使人类政治文明大进一步,虽然它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几年前作者曾接受记者的采访,对此有过一次谈话。兹记录如下:

记者:从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发展历史来看,从世界政治文明的漫长过程来看,资本主义政治民主是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资本主义民主应有一个全面的、恰当的评价。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过去有过简单的全盘否定的倾向,因此引起一些争论,也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你能否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作者: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反封建极不彻底的国家来说,许多方面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领域,决不可以轻视。照我看,如其推崇封建主义或封建特权,不如推崇资产阶级民主。评价资本主义民主,还得从民主的一般过程谈起。“民主”一词出自古希腊文,从词源说,民主是由民众和权力两词合成派生的。所以最早从民主萌芽时起,民主就是表示人民群众或社会统治

阶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列宁说,民主发展的辩证过程是:“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367页)这里,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有些方面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我们不能轻易略过它。你大概记得马克思关于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经历两次“解放”——一次是“政治解放”、一次是“人类解放”——的理论吧。马克思说的“政治解放”,就是指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用政治民主代替政治专制,即列宁所说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说的“人类解放”,就是指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用真正的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有限的政治民主。

记者:列宁所说的“没有任何民主”大概是指国家权力的消亡?

作者:阶级和国家权力一起消亡,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就不再存在,那时,人才真正成为“自由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表达的共产主义理想:人类解放,世界大同。但这种理想现在还不可能作出确切的解释。

记者:马克思本人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怎样描述的呢?

作者:马克思一方面从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角度来描述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指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在历史上有以下贡献:第一,它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共和权力代替个人意志至上的专制权力;第二,它“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通事务,即真实的国家;……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撕掉了笼罩在国家头上的神授光环,使它成为一个普通事物,因而将国家事务由少数垄断者的垄断变为广大人民的参与,实现了国家活动方式的民主化。当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与“人类解放”相对立

的角度指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它必然陷在自身的矛盾中,主权者——人民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受限制。

记者:我们先谈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贡献。马克思是从原则上说的,你能否谈得具体一点?

作者: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可以试一试。概括地说,我认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五项:一是创造了以选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二是建立了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三是开创了政党政治,四是树立了依法治国和法制权威,五是发明了舆论监督。议会、分权、政党、法制和舆论监督——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五种表现,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五大贡献”。

记者:指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这五个方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看来这是合乎实际的,不过也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那就是议会、分权、政党等是否真如你所说是发明于资产阶级之手?譬如拿议会来说,在13世纪的英国封建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

作者:这也正是我准备说明的。我们先来谈议会。英国在中世纪确实已经产生了“议会”,但那时的“议会”和近代资产阶级议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代议制”和“民主”这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因此称“代议制民主”。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国家中,那时还是奴隶制,已经形成

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但这种民主制度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不同,它是一种以全体公民直接参与政权为特征的“直接民主制”,如在雅典城邦,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种政治中,既没有权力的分立,也没有代议机构、代议制度。像这样的“直接民主”,一般说来仅适合于小国寡民的古代城邦。到了中世纪,封建专制给政治罩上了黑暗的幕布,古代那种简陋的民主在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面前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一些国家如英国出现了议会的形式,但这种议会与近代资本主义议会不同。如果说古代民主是一种无议会的民主,那么,中世纪的议会便是一种无民主的议会,这种议会既没有任何选举权、立法权,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而是紧紧附着在封建政治机构的肌体上,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服从于王权。

记者:中世纪的议会没有民主的内容,但这种形式总还是代议制吧?

作者:中世纪的议会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国王钦定的,具有等级代表会议的性质,与近代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和改造了中世纪议会形式。经过资产阶级的创造,近代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和中世纪的无民主的议会相比,显现出这样两个特点来:第一,资本

主义民主贯彻了“主权在民”或者说作为“公意”的代表(至少在形式上)和民主选举的原则,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使议会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高居其上。第二,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使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也有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能。这显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进步。正是在这一历史进步的推动下,代议制民主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比较普遍的国家制度。

记者:再来谈法制。资本主义法制的产生似乎也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因为在封建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像中国这样封建基础深厚的国家在封建统治的各个朝代都有各自的法律。西欧中世纪除了国王规定的世俗法律外,还产生了影响颇大的“教会法”。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就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法律建制。因此我想,资本主义法制是不是如同资本主义议会制利用中世纪议会形式一样,也是在扬弃封建法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作者:你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要真正弄清资本主义法制的创造性之所在,要作具体的分析。

第一,“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制包括“立法”和“法治”两个方面,即包括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和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两层含义。狭义的法制仅指“立法”或法律制度的建设。如果就狭义的法制而言,法制本身并不是资

产阶级的创造,甚至也不是封建阶级的创造,而是在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这就是我们在广义上理解的“法制”。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在西欧中世纪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但平民百姓,即使总统以及立宪君主制国家的国王,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就狭义理解的“法制”即法律制度本身而言,资本主义法律与封建法律相比也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这主要是指内容上的差别)。这些差别,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封建法律是封建王权意志的体现;资本主义法律则是资产阶级意志(也不可避免地包括部分平民百姓的意志,因为这个民主是广大人民同资产阶级一起向封建阶级争取来的)的体现。(2)封建法律是反民主的,是王权实现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法律则是反对个人专权,维护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部分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3)封建法律是钦定的,国王是首要立法者;资本主义法律则主要是由选举产生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机构——议会所制定。(4)在封建制度下,法律完全隶属于王权,

并且允许种种等级特权存在;资本主义法律则具有很高的权威,它除了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并据此获得的经济特权以外,不保护等级特权。总之,资本主义法律为资本主义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机制,并为广大人民争取更多的民主提供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法律相对于封建法律也是一个大进步。

记者:这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这确实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创造。

作者:接下来谈谈分权问题,所谓“分权”,就是权力的分立,以及权力的互相制衡。在封建社会,由于实行高度的个人集权,封建君主大权独揽,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王权的机制,因而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一点点“分权”的踪迹。只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势力进行搏斗的时候才发现了“分权”这个有力的武器。“分权”在一定程度上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斗争的胜利果实,同时又使资产阶级懂得在取得政治统治权以后继续运用“分权”的手段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迄今几百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实了资产阶级运用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制衡问题,即使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

义民主建设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记者:我们是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国家,虽说我们现在实行民主集中制,但至今权力的过度集中仍是我们制度中的一项重大弊端,有时甚至形成“民主其名,指定其实”的模式。当然,我们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靠这种制度如何建立一套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需要我们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党内权力也要互相制衡,举个例子说,同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者同样应对党代表大会负责,所以如果涉及领导高层中的重要大案,在处理上若两个机构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则起码应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讨论解决,不能由中央委员会少数领导人说了算,或者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国家法律处理。这个问题列宁早有提示,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在内)能够把它很妥善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憾事。

作者:下面我们就来谈政党问题。关于政党,过去我们议论不少,但是,关于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资产阶级建立政党政治的历史意义等很少涉及。前面谈到,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创造。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存在政党的,政党只是近代的产物。这是因为,在未突破封建专制的躯壳之前,在资产阶级和人民未争得起码的民主权利之前,是不可能产生政党的。从政党的



吴 江

形成过程我们看到：最早几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在资本主义议会内孕育产生的，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人们不仅获得了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权的权利，而且有了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使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有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这种组织之一就是政党。

记者：在以上论述中，关于政党为什么只是在资本主义政治条件下才能产生的问题，我看大体讲清楚了。按照你的见

解，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它政党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确立为前提的，或者说政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产物，把一定的民主条件视作政党产生的必要前提，这不难理解。不过我想提一个问题，这种从民主运作中产生出来的政党对民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是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还是作为一种消极因素或不正常的阻碍力量影响民主政治？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政党政治长期以来是一个令人褒贬不一、颇多争议的领域。例如，美国立国之初，英国曾通过美国初期形成的政党渗透自己的势力，这就是美国首任大总统华盛顿厌恶政党的原因。华盛顿在辞掉总统职务时在其《告别演说》中特别提到：有些政党“为外国势力打开了大门，外国势力通过政党的途径发现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门”。还有法国，法国人一向拒绝外国势力对于内政的干涉，法国政界从左到右

最忌讳的是被指控有外国背景，名望最高的人物，一旦被指控有外国势力背景，不仅为法律所不容，而且立即会被舆论和群众所抛弃。19世纪末美国的法官胡克（Hooker）也谈到：“在我们最早的记忆中，政党政治一直是一种精明的和耍手腕的事情，并不总是正当的。”（《史蒂文森选举委员会案》，载美国《西北地区报告》第76号，第915页）照这种观点，政党未必是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

作者：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作三点说明：第一，政党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民主条件，但这并不否认政党也是派别斗争或不同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产物。在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即使不同势力和派别间的争夺，也由其政治上的公开性和合法性而体现了一种民主的进步（与封建专制相对而言）。第二，政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始终包藏着某些不正当甚至肮脏的“耍手腕”的东西，这在政党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情况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何况政党政治既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又不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部分。第三，政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因为它不仅是民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而且为民主政体的运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活动机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洛厄尔在他所著《大陆欧洲的政府与政党》一书中就指出：“对民主的历史大致一瞥，就应该足以使我们明白，在一个大国中，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也不能真

正地进行统治的。实际上,我们是由一些行动多少受公意指挥,但又不完全受公意指挥的政党来统治的。”(转引自[美]古德诺著《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80页)为什么资产阶级要通过政党来实行统治呢?古德诺在他的著作《政治与行政》中提供了答案。古德诺说:“要使政府协调地运转,就必须找到某种使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协调一致的办法。……这种办法在政府体制内部不能找到。所以,必须到政府以外的一些法外的制度中去寻找。事实上,可以在政党中找到它。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是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的成员,即立法机关的成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又说:“在美国,由政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要比最初根据宪法冥思苦想,使总统的挑选与人民的关系更进了一步。”还说:“人民本能地感到,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载自《政治与行政》第57页、79页、93页)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的论述,它说明政党与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强调政党在政治民主中的作用。

记者:古德诺的观点的中心思想,大概是要说明政党在政府和人民中间起着某种中介作用。尤其在近代大国,这种中介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挑选“立法机关的成员”

或挑选“执行官员”,还是“提名总统候选人”,政党都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组织者的角色。在一个近代大国,在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的条件下,要通过政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才能够把散落的、繁杂的个体意志集合起来形成“公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使“公意”上升为国家意志。古德诺说:“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恐怕道理就在这里吧?

作者:这样理解是对的。其实,除古德诺之外,西方不少学者都看到了政党的上述功能和作用。例如美国的乔西亚·H·桑德曼明确指出:“政党活动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媒介”,政党可以起到“控制、指导和稳定冲突”的作用。英国政治观察家布赖斯勋爵也评论说:“政党能使为数众多的选举人从混乱的状态中实现秩序化”。(杨百揆编《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春秋出版社出版,第353页)

记者:从这些评论中,我感觉到政党的“中介”作用与议会的“代议”功能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

作者:政党与议会的这种联系应该肯定。我们前面谈到,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其实它也具有中介的性质。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前几年,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曾写过一本题为《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书,在该书中,密利本德确认“议会制度的实质是它在政府和人民之间

起着缓冲的作用。”认为议会制度“赋予人民以选举他们的代表和从事多种形式政治活动的权利;但它又叮嘱人民让他们的代表承担起支持或反对当时的政府这一重任。它把政治生活的注意中心从选民移到下议院,从人民移到他们的代表”。(拉尔夫·密利本德著《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第47页)这里虽然讲的是英国,而英国议会与美国议会的作用是不大相同的,但却至少揭示了议会处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中介状态和由代议性质所决定的协调和缓冲功能。

记者:这就是政党与议会的相似之处吧?

作者:可以这样认为。不过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有着更深刻的联系。这就是,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它是议会民主制赖以确立的最根本的组织基础;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则是实现议会民主制的重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正如我们刚才讲过的那样,通过政党的中介作用,把个体意志集合起来形成国家意志;而议会则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或者如古德诺所说,是“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

记者: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议会和政党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

作者:其实,在政党出现以后,议会、政党、分权、法制等就始终处在一种交互作用之中。而这些因素的合力(如果它不被破坏的话)在一般情况下使资本主义国家有较稳定的政治结构。难怪密利本德十分自信

地宣称：“资本主义民主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有一定的恢复力及其政治体制承受危机、冲突和混乱的巨大能力。”密利本德还举例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政权受到过重大威胁，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记者：在上述“五大贡献”中，舆论监督还只是提了一下，能否谈详细一点？

作者：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些民主权利在封建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利用公众舆论宣传和动员群众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才首先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言论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反对专制的犀利武器。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伯斯比尔就曾说过：“出版自由是鞭撻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言论出版自由被作为革命胜利的成果载入资产阶级的宪法性文献之中。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也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对此，马克思作了高度评价：“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

言论出版自由为资产阶级

宪法确定以后，就成为一种具有法律保障的监督政府、防止政治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舆论力量。这一点，美国第三届总统杰佛逊就曾指出：“报纸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英国哲学家边沁也讲得很明确：公众舆论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有效牵制。法国拿破仑则感慨系之，认为“三家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支枪更可怕。”难怪现在西方国家纷纷把舆论监督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记者：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言论出版自由（包括新闻自由）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有权了解政府的活动并有权对理论提出批评。这种认识也应该是正确的啦？

作者：这个看法应该肯定。1989年3月，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有来自苏联、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约300多位代表参加的“第十届世界传播媒介大会”，会后就有人总结说：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这一人的基本权利的体现，“它既是构成任何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又是维持社会平衡稳定的一个基本保证。”

资本主义国家中舆论监督有时确实发挥作用。如19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就是导因于“水门事件”被新闻界所揭露。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于1974年辞职，亦由新闻界揭发其涉嫌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贿款案所引发。另一个沸沸扬扬的里库路特股票贿赂事件，使竹下内阁总辞职，前首相中

曾根也牵连在内，就是由于1988年6月里库路特案受到报界揭发所致。职务越高，舆论监督也越不留情，不但其本人的政绩和言行，而且其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甚至私生活等，无一不在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这样一来，就使得身居高位的官员既不能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也不能徒居高位平庸度日，无所作为。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舆论监督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劳动人民对于当权者的监督。

记者：舆论监督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还没有立法，党和国家支持得也还不够，这是我国民主落后的重要方面。在各地，现在舆论监督受恶势力的压制和迫害的事件很不少。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立法持冷漠态度，也是不对的。

作者：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要消除或减少各级政府和干部的不正当行为和腐败现象，以及各种胡作非为现象，没有切实法律保障的舆论监督是不行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致 中）

作者更正

贵刊今年第4期刊登的我写的《常态与变态》一文中，“马克思百岁诞辰”应为“马克思逝世百周年”。谨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陈四益

“城中好高髻” 的联想

● 杨天石

那是好多年前了，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到一首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是汉代时尚流行的情况。据考，汉代京师贵族女子崇尚高髻、广眉、大袖，各地群起效法，结果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强化，于是头发梳得愈来愈高，高至一尺以上；眉毛愈画愈宽，以致宽到遮住半个额头；衣袖愈做愈大，以致耗费整匹绸缎。

这是一首很有哲理，富于警示意味的歌谣。何以然呢？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度。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合理的，但是，超过了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它就变成不合理了。例如，头发梳得高一点，眉毛画得宽一点，衣袖做得宽松一点，也许很美。但是，过高、过宽、过大，也许就成了怪物，由美变丑了。这就是掌握“度”的重要性。我们的老祖宗说：“过犹不及”，那意思是说：过度与不足，“左”和右是两个极端，都不可取，必须“执两用中”，在“左”与右的两个极端中取其“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度”，也就是合理的分寸。

想起1958年的事情来了。那时候，上面提倡深耕、密植，借以增加农业生产，目的也许是对的。但是，下面却愈耕愈深，愈植愈密。有一次，我读大学时的所在班级到京郊平谷县东鹿角村锻炼，和村民们一起深耕。好家伙，那地几乎挖了一人多深，站在地底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土甩到地面上。自然，来年严重减产，丰收的希望变成了歉收的懊恼。为何？耕得过深的结果是，适宜谷物生长的熟土层被破坏，不适宜谷物生长的生土被翻

到了上面，不减产才怪呢！

那年头，这样的例子似乎很不少。上面号召大炼钢铁，下面就全民炼钢，处处炼钢，人人炼钢。记得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提出，国家争取年产1070万吨钢，北大要争取年产1070吨钢。于是，立即行动，在宿舍旁就地挖坑，从教授家中的壁炉上拆来耐火砖，从卧室床上拆来铁制脚蹬子，煤炭、劈柴、废铁，混置共治，轰轰烈烈地炼起“炒钢”来，自然，炼出的是一堆废渣。河北省有一个徐水县，为了响应上面“大跃进”的号召，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跑步”的时间原定三年，不久就听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大家纷纷取经，参观那靠“红薯”撑饱肚皮的“共产主义”。遗憾的是，很快连“红薯”也供应匮乏了。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这首民谣所描述的是民间“时尚”的变形走样，然而它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例如，一种“主张”，或者一种“号召”，提出之后，经过流传推行，就可能层层加码，愈演愈烈，以致完全扭曲。聪明的领导者要了解这一“规律”，自然地加以防止。汉代的政治家们就很懂得这一点，不止一个人阐述过这首民谣的警示意义，认为它可以告诉人们：“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那意思是：上面不仅要慎其所“好”，而且要严防下面发展为“甚”。好事一过头就会成为坏事，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荒谬。至于坏的决策呢，一“甚”起来，可就惨了！

走笔至此，想起著名老一代漫画家丰子恺。他在1956年11月发表过一幅漫画：三个古装女人，一个高髻冲天，一个阔眉蔽额，一个大袖扫地，奇形怪状，毫无美感可言。那画的题目就是“城中好高髻”，显然，老画家是看出了这首民谣所包含的哲理或警示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这幅漫画后来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批判词有云：“当时正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爆发不久，国内外反动派蠢蠢欲动的时刻，正处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前夕，一贯反共的老手丰子恺，立刻跳出来，配合了这股反革命的气焰，利用他‘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反革命伎俩，首先向党发起进攻。”云云。

想起此事，不禁感慨系之！

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

● 刘路生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接掌国政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了袁世凯的官，令他回籍养病。此后，直至辛亥革命复出，袁世凯隐居彰德洹上村三年。对于袁世凯这几年的活动，史籍语焉不详，民间有许多猜测和误传。

横祸突降

1908年的袁世凯，如日中天，权倾朝野。10月，在他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周年之际，于一片祝颂声中，度过50岁生日，步入了他的知天命之年。然而，天意难测，一个月后，11月14、15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之内相继先后去世。慈禧遗命3岁的溥仪嗣位，是为宣统。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监国。50天后，1909年1月2日，还在帝、后百日大孝期间，载沣就对袁世凯下了杀手，以袁腿脚毛病为由，罢了他的官，开去一切差事，勒令回籍养病。

这天，正值袁世凯当班入宫为光绪帝值宿守灵。尽管恼羞交加，他仍然按照规矩向清廷叩头“谢恩”。袁世凯不能再入宫值宿，又不敢擅自离去，进退失据。得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代为值宿，才得以脱身回家。清朝的权臣开缺之后，往往可能是下狱、抄家，乃至处死的大祸继至。袁世凯忧惧万分，第二天，微服出走天津，以观动静。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杨士骧，本是袁的亲信，但他深知干系重大，拒不接纳。同时，北京方面也传来奕劻、世续等枢廷重臣的消息，可确保无杀身之虞，于是袁又返回北京，匆匆只身南下回籍。

袁世凯的担心并不多余。据说，载沣当初确实是想杀掉他，消除十年前戊戌政变时袁出卖光绪皇帝之恨。而且此时外间已有谣言说，袁世凯已经篡位自立，北洋军已集中北京。庆王奕劻已

经被幽闭。这些，都是杀掉袁的信号。据深通清代历朝秘闻及掌故的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说，即使没有袁与光绪皇帝的这场过节，载沣也会有除袁之举，以确立新朝的权威。

但是时代不同了。到了20世纪初年的清末，外重内轻的局面已经形成多年，清廷已宣布预备立宪，许多客观条件制约了清廷随意处治权臣的可能。而载沣生性庸懦，也缺乏他的先辈们那种杀伐决断与胆识。在清廷和政府方面，除了几个少不更事的皇族青年新贵，张牙舞爪，支持载沣以外，所有枢机重臣，满汉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共七人，奕劻、张之洞，世续、孙家鼐、那桐、荣庆、鹿传霖等，都不赞同载沣的主张。张之洞力言，主少国疑，为“朝局计”，对袁世凯“务宜镇静宽大”。世续、那桐、荣庆等，虽是满蒙人，亦都力保袁世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他们保袁世凯不止保袁个人，而是为了大局稳定。”在地方上，北洋陆军更是“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英、美、日本的驻华使节，在中国的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外国新闻媒体，都表现了对袁世凯命运的关心。英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已经在商议共同干涉清廷对袁的处置。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载沣，不得不接受折衷的办法：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将之放逐回籍。

韬光养晦

袁世凯于腊尽岁末之际，凄然离京南下，寄寓卫辉府汲县自己的私宅。稍后，又移居彰德府（安阳）城外的洹上村，开始了他的三年养病生涯。袁世凯在安阳，颇有一派隐居山林的模样。

第一，宣示中外，隐居林下，一心养病，绝意复出。袁世凯的一位重要幕僚沈祖宪保存有此一

时期袁的未刊书信稿,从1909年初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年七个多月时间,共有750通,大多是对人来信的复函。收信的人包括从奕劻等以下的当朝权贵,到各方督、抚大员、州县官员、北洋陆军袍泽、师友、亲朋等各方人士,其中以称养痾为辞的信函就有625通。他反复表白:“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痾。圣恩高厚,莫名钦感”,“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余年,皆出天家所赐也”。对于那些复出的慰勉和劝说,袁均明确表示婉拒:“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反复声言:“杜门养痾,不干外事”,“向不与官场通信”。婉拒为人说项、请托,拒绝接受各方的银钱馈赠。

第二,经营寄寓宅第。袁对汲县宅第,甚不满意,适有儿女亲家何炳莹以彰德城外的一片乡宅相赠,于是,决定营造房舍,举家迁居彰德。彰德新居即后来著名的洹上村。袁世凯以慈禧太后赐给他的“养寿”二字命名,称为“养寿园”。园中以“养寿堂”、“谦益堂”为正堂和主建筑,二堂均以慈禧太后赐书命名。他集龚自珍诗句为“养寿堂”拟的门联是:“君恩够向樵渔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为“谦益堂”写的题记是:“光绪辛丑季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勗臣至矣。园居成,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循自省云。”其借慈禧以自保的用意十分明白。

第三,闭门课子。袁世凯在洹上设立了家塾,除长子袁克定“仍留京供职,其余诸儿均携之来卫,督令读书”。还手定了《家训》十一条,为子孙立下做人的规矩。

第四,倡导社会公益事业,并以文会友。从1909年起,袁世凯便以在籍绅士领袖的身份,联合曾长期寓居卫辉的徐世昌,倡议重修卫辉县百泉名胜,并领衔募捐筹集资金,得到张镇芳、端方、蔡绍基等以及北洋袍泽、河南绅民的热情捐助,

共募得捐银一万五千余两。历时三年,至1911年秋竣工,百泉诸胜迹,焕然一新。由袁世凯撰文徐世昌书丹,立重修百泉庙碑,以记其事。此外,他曾函请直隶当局,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并为该校优秀毕业生颁赠奖学金。

时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袁本人亦自诩是办事的,不是做学问的。但避居彰德之后,既应人之请,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题词,又资助时人编辑的《四朝史诗》刊刻,亦与人吟诗唱和,并编诗集刊印,还专门批读《古文观止》。虽未免有些造作或矫情,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也是遭遭开缺官员们避凶趋吉的一种常态。

第五,经营实业。袁世凯回籍之后,1909年夏敦请王锡彤出任实业经营的主持人。袁对王锡彤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实业关系国家兴衰”,“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王锡彤欣然应招。

王锡彤首先接手经营京师自来水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兴办之议,始于1908年。时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问袁,如何防备京城火灾,袁以建自来水公司对,于是责成袁主办此事。自来水公司官督商办,集商股300万银元,1910年竣工。是为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北京自来水设施的基础。稍后,袁命王筹办河南罗山银洞冲银矿,亦曾同严修函商是否参加李石曾等倡办的



袁世凯在洹上村“隐居”以渔翁自诩

豆腐公司。此外,袁也在寓居的彰德投资实业。一面重新集资,接办当地原已停产的豫新纱厂,一面投资水利事业,购置土地,经营农业。这些都反映了他兴办与投资实业的积极态度。

人们经常说,袁世凯不回祖籍项城,择居彰德,这是他为东山再起的精心谋划与安排。此说不符事实。首先,豫北卫辉宅第,是在此次罢官之前,由一位亲厚何木(汲县人)帮为买定,作为将来致仕回籍的住所。当时并无罢官之事,自然亦无再起之谋。再移彰德,则确有亲家以乡宅相赠的偶然性。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其次,袁世凯不回项城原籍,确有一些隐衷。项城袁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是庶出,且又出嗣于叔父袁保庆。其嗣父死于外省任上,他奉嗣母回里时,就未返项城祖居,而是寓居于陈州府城淮阳。此后,自袁世凯从军后30年间,他这一门,完全离开项城了。袁世凯生母死后,他以直隶总督之尊,奉旨回籍葬亲,却饱受挫折和窝囊气,他的生母不得与其父合葬,只得另找了一穴墓地独葬。袁世凯无颜亦无意再回项城了。其实,即使无此特殊情节,袁世凯亦未必一定回原籍。袁氏族人流寓在外地者大有人在。第三,卫辉、彰德一带,交通方便,铁路南北通达,水路上通天津,又有较好的人文景观,适于居住,许多外地官员如李秉衡、徐世昌及其祖上、王廉都寓居这里,端方也打算在这里寄寓。总之,袁择居豫北,同罢官后的再谋复出并无必然联系。

不平与不安

袁世凯在50岁的盛年被开缺罢官,其意气难平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回籍后给各方来信的复信中,就不时流露出忿忿不平之气。他明言:“只以事变纷乘”,清廷才将他罢官削职的,“放归养病”只是借口。他多次用“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这样一类的言语,隐怨清廷苛待功臣,刻薄寡恩。

1910年春夏,袁世凯邀集了各方人士到养寿园游园聚会,借着同来游者的吟诗唱和,尽情地抒发了胸中的积忿和对时局的感触。袁和友人诗说:“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表达了一片龙入浅水、虎落平阳的心

境。他以《登楼》为题的诗说:“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明白地表示,他身在蜗居,志在高山。以《病足》为题的诗则直斥了庸夫误国。诗曰:“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而和张镇芳的诗,则明白地表示了他对时局的隐忧以及复出的强烈欲望:“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此乃扬言:他袁某健壮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扰攘,收拾局势,舍我其谁。袁撰写的《重修百泉祠庙碑》,抒发了与其诗作同样的意思。他以“怀奇负异”的“龙骧虎踞之士”自居,要在“时方多艰,风云倏扰”之秋,出而平定“多难”的世道。

袁克定为袁世凯的唱和诗写有一篇跋语说:“诗中‘连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已成诗谶。”“洹上杂咏,可作中华民国虞歌观,亦可做中华民国纬文观。”知父莫若子,这是袁克定所理解的其父心声。

凶险的遭际,使放逐中的袁世凯时刻关注着朝廷的动静,提防着个人的安危。袁世凯的未刊书信稿表明,袁克定坐镇的北京锡拉胡同宅第,即是他的驻京办事处,京汉铁路火车是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旧部随时维持和保证通讯的安全。1911年夏,有袁克文的信使在顺德(今邢台)火车站被窃,大名镇总兵言敦源迅即派干员缉查,数日之内便告破获,缴回密信,反映了京汉路信息孔道的重要与安全保障之严密。

袁世凯的另一位亲信、铁路局长梁士诒,更为之专备火车以供缓急之用。梁士诒曾对杨士琦说:“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供他“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从而确保生命安全。

时谋再起

放逐中的袁世凯并不甘心寂寞,而是多方呼应,时怀复出之望。在大量的信函往还之同时,还有各方许多人士亲来洹上与他会晤。《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提及者加上通常熟知者,前来晤袁

的人至少在 60 位以上。其中有部院大臣唐绍仪、端方、严修等及其以下的京官，有封疆大吏如周馥、袁树勋、何彦升等以及各级地方官员，有北洋旧部如王士珍、倪嗣冲、言敦源、段芝贵等，有社会政要、闻人如张謇、李时灿等，也有日、法等外国人士。民国《安阳县志》说，“谗者谓，袁之隐居，实盛于苏秦之盟诸侯。”这是在引用一个历史典故，战国时苏秦倡合纵盟六国之地，即在安阳。

通过信函往还以及踵门来访者的晤谈，袁世凯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同直督陈夔龙、鲁抚袁树勋（后为粤督）、孙宝琦、豫抚宝棻、江督张人骏、皖抚朱家宝、赣抚冯汝癸、浙抚增韞、吉抚陈昭常、新疆巡抚何彦升等，同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许多藩、臬司、提法、提学使，司、道、州、县官员们，议论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多所赞画，出谋献策，乃至调停他们之间的过节（如对陈启泰与蔡乃煌）。袁同张謇洵上一席夜谈，令张氏对他从内心十分佩服。袁赞同并积极支持盛宣怀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之初，袁就为之出谋划策：“大节似先驻汉阳，分投委员查勘，步步为营”。倘若端方接受袁的忠告，不冒险进川，也或许不至落到暴尸川东的惨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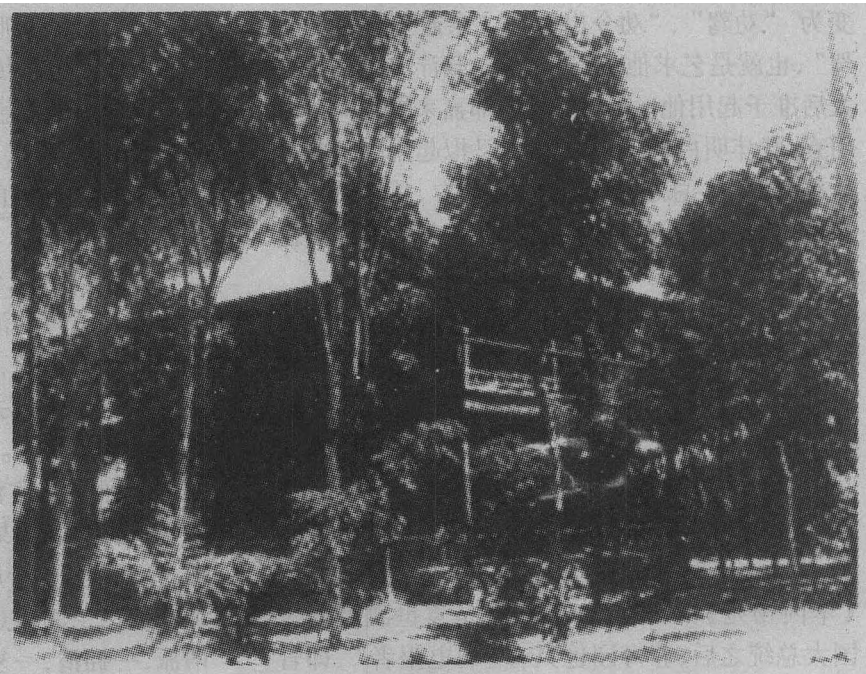
在武人方面，袁世凯同长江及江北各提镇直至东北的新军统领张绍曾等，多有信函往还。至于同直隶的提镇和北洋旧部的书信往还，以及他们的来彰拜候，更是频繁如同家人。袁亦对他们关注有加，对他们的升迁去就，殷勤慰勉，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悉心排解。例如王士珍与雷震春不睦，袁复雷函曰：应“笃念同袍，和平了结”。吴凤岭与陈光远有过节，袁复陈函曰：二人“知交有年，仍望和衷共济，庶以补救时艰”。

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在积极地修补人缘，例如，他和盛宣怀本是亲密盟兄弟，袁督直后，因权势之争，二人反目成仇。袁被逐洵上后，经过他们的共同友人端方的斡旋，二人和解，盛

亲笔致书袁，极赞袁在“庚子以后”，“扬历十年，禁烟、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并竭诚吁袁复出：“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袁在亲笔复端方和盛宣怀的信中，都表达了在政见上与盛的共识，称赞盛掌邮部“不过数月，而收路、收邮、筹借钜款以维大局”，这些都是他本人赍志十年“迄无一成”的事情。

宣统一朝三年，国是日非，一派亡国景象。很大一部分关心清朝命运的人们，把扶大厦于将倾的指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复出上。隐居彰德的袁世凯，人望剧增。仅《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所提及吁请袁复出者，就有近 40 人次，未反映在未刊书信稿者，还大有人在，如泽载、盛宣怀、端方、张謇等。此外，完全可以想见，那些踵门访袁的人们，绝大多数应以劝袁出山为话题。

清政府中汉臣领袖、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在去世前，首倡重新起用袁世凯之议。其时，载沣以载洵办海军、载涛管理军咨府。张之洞诤谏说：洵、涛二人年幼无知，此系国家重大政举，应于全国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但载沣不听。1911 年 5、6 月间，立宪派的首领张謇、汤寿潜等四人联名上书载沣，认为，“政府以海陆军政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举措乖张”。他们提出，应当仿效咸丰、同治年间平定发捻的故事，



袁世凯养寿园

“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张之洞、张謇等之所谓“知兵者”、“有学问阅历者”，未便明言，至少袁世凯在首选之列，这是时人的共识。张謇应诏北上赴京，特地电约，专门在彰德下火车，前往洹上与袁晤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首先想到的是起用袁世凯，等等，都是明证。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更是大量报道乃至制造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据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报道的统计，自袁开缺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他的各种活动的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的有64条之多。保荐、敦劝袁出山的人，清室王公有载涛、载洵、奕劻、载泽等；枢机重臣、部院大臣有鹿传霖、那桐、陆润庠、徐世昌、唐绍仪、盛宣怀、邹嘉来、梁敦彦、端方；封疆大吏有赵尔巽、锡良、李经羲等等；还有许多未指名的政要。为袁设计的任职，内有资政院院长或副院长、内阁协理、弼德院顾问大臣、外务部尚书、军事顾问；外有直督、川督、东三省总督、查勘滇缅边界事务，等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不免道听途说，但决非空穴来风，或有某种根据。新闻媒体的消息还反映了一个趋向：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给的官职也越来越大，对袁的倚重也越来越迫切。最初，还是各方亲袁枢臣为袁缓颊，请清廷给袁一个效忠的机会，而到1911年春夏以后，已逐渐改变为“劝驾”、“劝令出山”、“亲赴卫辉极力劝驾”，也就是乞求他重出。据说：载沣亦恳请隆裕太后准予起用他。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晋见时请起用袁，载沣明白表示：“本监国已拟起用”，“将来另有位置”。总之，到辛亥革命前夕，从朝野到皇室，从亲信到政敌，都在营造着一个袁世凯复出的氛围。

面对各方的出山呼声，袁世凯一面用矜持的拒绝来掩盖其急迫的复出心绪，一面也同亲厚们积极地议论局势，寻求最佳出山时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为图谋再起，在洹上村设置电报房，以广肆联络当道。袁力谋再起是实，但设电报房之说则缺乏根据。据袁克文所著《辛丙秘苑》的记述可知，即使是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养寿园也只有“司电报者”，即管理文电的人员，并无电台。袁府对外联络的电报

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收发的，电报局还曾经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如果袁府有专用电台，密电就不会交电报局收发。袁克文是袁世凯次子，在袁世凯罢官之前已官居法部员外郎，袁世凯遭遣回籍，他亦“辞官从归”，帮助料理家务。袁世凯辛亥再起，南下督师，又命他留守洹上，主持家政。《辛丙秘苑》写于民初，记述其亲身经历，当是可靠无误。辛亥革命前后几年，袁世凯的经历是翻天骇浪，而家中设不设电台的细事，根本不必刻意撒谎隐瞒。

按当时中国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电报局是官办，不可私设电台，无论公私官商，明码由电报局收发，密码送收电者自译。即使袁世凯私设一个电报房，收电人也只能通过官办电报局收电，直接打电报给私人的机会与可能几乎是没有什么的，除非对方也私设一个电台。袁世凯被逐回籍，避祸犹恐不及，无必要做出这种不明智之举。以袁之精明，密谋东山再起，更没有必要设这个不实用的电台，授人以口实。

辛亥复出

武昌起义爆发，使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为现实。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次日，正值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他的53岁生日。毕竟是乡居，信息传递稍慢。第三天，才得闻武昌“有乱事”的消息。震惊之后，贺寿之会，即刻成为袁世凯父子以及亲信谋士们在一起讨论时局之会。他们共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袁世凯必将起用。

果然，13日，便传来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革命党人一举占领武昌这个九省通衢重镇，清廷面临太平天国以来的又一次大难。算来算去，有能力指挥平定这场大祸的只有袁世凯一人。清廷在朝臣中遴选同袁世凯亲厚者持诏书前往洹上劝说袁，不念旧恶，顾全大局，应命出山。结果，选中了阮忠枢。14日，阮到达洹上。于是，是否应命，成为袁世凯父子以及亲信谋士们讨论的焦点。据说，袁世凯周围的人分为两派，一拥清，一复新汉。袁克定是“复新汉”派的首领。他们主张，不必应命，或坐待清亡，或附

和革命党,或独树一帜。袁世凯权衡再三,断然否定了这种主张,于15日复函奕劻,16日正式拜折应诏。同时,致函清政府内阁总理、协理大臣,以及亲厚徐世昌、张镇芳,还有北洋旧部王士珍等,公私各方,明告他们正式应诏出山。

但清廷诏令只命袁世凯在荫昌手下“会办军务”,这是清廷又一不智之举。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袁世凯拜折应诏的同时,也向清廷开出了八项条件交阮忠枢带回。其内容主要是:授予他军事全权,足兵足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

以文法,遥为牵制”,否则,拒不复出。平心而论,这也是前线军事统帅打胜仗的必须条件。中国历史上由于朝廷遥制,或缺少后勤供应,造成打败仗的例子太多了,袁世凯自己就有在甲午战争期间在东北前线办后勤的经验与教训,他不得不防。

别无选择的清廷满足了袁世凯的条件。11月9日,袁起程南下督师,离开了他居住了将近三年的彰德。再回来,则是1916年死后的归葬了。

(责任编辑 江之洲)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全价	88.60	10.00
之一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之二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之三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之四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程门立雪忆胡绳	郑 惠	12.00	3.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马立诚	22.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本书展示了过去13年的大脉络,书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内容浩繁,见解独到,既有极强的政治震撼力,又有历史的穿透力。它展示伟人风范,却让普通人的悲欢成为众目所矚,它针砭世情时弊,却让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抗日烽火中开发的玉门油矿

● 李学通

背景

甘肃玉门虽远离中原,但其有石油蕴藏之事,中国史书早有记载。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后汉书》及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均有该地石油、天然气燃烧的形象描述。《大明一统志》更明确记载:“石油,肃州南山出。”到清代光绪年间,随着近代科学的传入,国人也曾有过的设想,但最后胎死腹中。到了1935年,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银行家周新民等再鼓勇气,组织公司,请求南京政府以五年为期,授予探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的特权。南京政府认为,像石油这样重要的矿业开采与开发,按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应归国营,但又考虑在当时国库竭蹶无力经营的情况下,与其弃置,不如利用民间资本提早开发,于是由实业部授予顾维钧等特许权,准许开发,并于当年11月1日由国民政府颁发了82号训令,核准该案。顾维钧等于次年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并于1937年开始对玉门等地进行地质调查。但公司聘请的外国技师们最后没有找到玉门石油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依据,也没有再进一步勘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部铁路线大多陷于敌手,西部大后方的汽车运输又因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失去进口燃料的渠道,中国公路运输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又重新组织起人拉马驮的驿运。当时甚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中国需要开发石油,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石油。国民政府国营工矿企业的主管部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提出了由政府投资开发中国石油的设想。中国的地质学家们当时也在四川、甘肃等地积极寻找着石油矿藏。专家们认为,比较现实的可能是开发玉门石

油。但甘肃石油开发权已由政府特许给予了顾维钧等人,政府要开发,必先收回开采特权。但实业部当年授予顾维钧等人的特权规定:勘探期限为5年,勘探期满后,有20年的开采期限,并可再延续20年。也就是总共有45年的开采特权,即从1935年算起,到1980年方才期满。此事让刚刚上任的经济部长翁文灏颇感头痛。

翁文灏是个民国史上极有些与众不同的人物。论背景,他家当年是宁波巨富,钟鸣鼎食,而他本人却一心向学,丝毫没有纨绔子弟之习气;论学问,他是清末的秀才出身,却又留洋,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论职位,他既是经济部长,却还身兼经济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工矿调整处处长等大小职务;论个头,他只有一米五几的身高,不到90磅的体重。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家,翁文灏大约是中国最早意识到石油在未来工业中重要地位的人。1921年他特意派学生谢家荣赴玉门,调查那里的石油地质问题。30年代初,他发表文章,专论中国的工业燃料问题,并组织科学家积极从事石油替代品的研究。

收回特权

抗战爆发后,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解决汽车运输的燃料问题,由科研项目变成了迫切的实际问题,开发玉门已成为抗战现实的迫切需要。收回开发特权则是翁文灏面临的第一道难关。秀才的文字功底加上洋博士的科学见识,在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有关授予顾维钧等玉门石油开采特权的全部档案文件之后,翁文灏于文词之中一番推敲,果然发现了文件中存在的缝隙。

1935年,顾维钧等人的申请经实业部上报行

政院后,行政院于当年8月28日的226次会议讨论议决:“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五部,并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暨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会同审查。”三天后,上述五部、两委员会奉命开会审查,对该申请案提出了八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限定:须“在呈请特许案核准后六个月内开始探勘”。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虽然派人到青海、玉门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但也可以说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探勘”。翁文灏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地质学家,而且曾任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矿业管理部门的最高技术负责人——技监,当然可以在一般性矿产地质调查与矿业勘探开发之间的界线,做出权威性的判断和划分。于是,他指示此时已由军事委员会归属经济部,负责主管国营工业的资源委员会,以中国煤油探矿公司未能遵奉特许状如期开发为由,呈请经济部收回该公司的玉门石油开采特权。顾、周等人无力开发,在这种情况下也无理由阻挡,于是同意交回特权,翁文灏初战告捷。

陕北借机

最初也有人提议开发玉门应与苏联合作,甚至蒋介石也对此表示认可,但并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工业开发之前的进一步地质调查勘探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翁文灏亲自过问,调集组织地质学家、工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于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并于当天亲自率筹备处负责人登门拜访了正在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

翁文灏为什么要拜见周恩来呢?玉门开发与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早在1934年,南京政府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翁

文灏是秘书长)就成立了一个由著名工程专家孙越崎为处长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陕北延长一带进行石油探采。1935年红军进占延长后,油矿及设备均由红军接收经营。翁文灏拜访周恩来,就是想商请中共同意把原来丢弃在陕北的钻机两套勘探设备,运往玉门从事勘探,协助开发玉门油矿。这两套进口的勘探机械,当时在国内算得上是稀缺的高科技设备,对玉门开发至关重要。周恩来当场“慨允照办”,并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义”。果然,不久油矿筹备处人员在陕北得到萧劲光、高自立、李强等中共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协助下,钻机等设备被“毫无阻碍”地运往玉门。翁文灏闻讯之下既有些意外又颇受鼓舞,认为:“即此可见(共产党)一体为国之真诚,良可欣幸”。当年12月,在风雪严寒之中,第一批科学家和开发人员孙健初、靳锡庚、严爽等抵达玉门老君庙,玉门油矿开发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扩充计划

1939年春天,玉门见到工业油流,8月探得K油层。K油层的发现为大规模工业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地质学家们确认,该地是良好的储油区域,具有重要开采价值,而且当年就产出原油400余吨。虽然最初的地质勘察和工业试采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是否要进一步大规模工业开发问题,则非经济部长翁文灏一人可以决定。因为,设备几乎全部要进口,在抗战正在进行之时,能否得到足



1942年8月26日蒋介石(左二)视察玉门油矿,孙越崎(左一)在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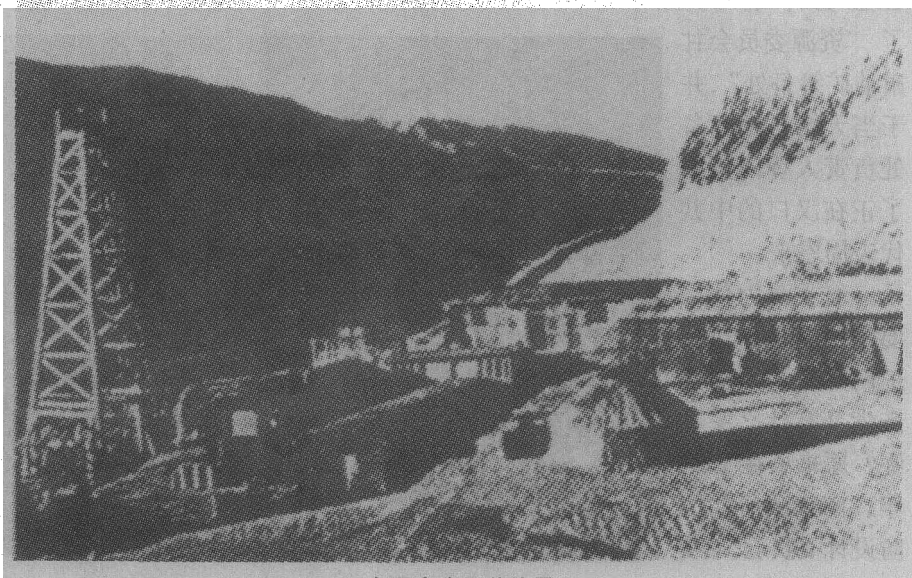
够的外汇资金是个问题；中国石油采炼的技术水平能否担当起这个重任也是个问题；特别是玉门地理位置偏僻，远离交通干线，运输困难，即使能生产出石油，在战时能否发挥作用也确实令人怀疑。为慎重起见，1940年9月，翁文灏又派钱昌照、孙越崎二人亲往玉门实地考察，结论是“玉门油田开发一定大有希望”。

翁文灏召集有关人员，对油矿和冶炼厂的设备、技术、生产及人事安排等工作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一份《甘肃油矿两年扩充计划》。计划至1942年8月，玉门矿达到日出原油7万加仑，汽油44800加仑，即年产汽油1600万加仑的水平。为此需要增加投资法币700余万元，美金300万元。计划上报行政院请求批准。但在12月10日的行政院第494次会议上，该计划遭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冷眼。孔本人一向反对发展国营工业，因此对开发玉门表示置疑。在他的主持之下，会议最后决定政府不对开发玉门油矿进行拨款，此事应采取银行贷款方式，以公司组织的形式招商承办。

在当时情形之下，招商承办，实际就是拖延不办，因为顾维钧等人有特许而无力承办的前车之鉴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即使有私人资本家愿意投资兴办并且能够成功，如此重要、稀缺的战略物资被私人垄断，那对国家又将是一种什么状况？因此翁文灏等人坚决反对招商承办，主张由国家投资，建立国营企业。在一次国防工业委员会（翁文灏为主任委员）会议上，翁文灏让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再次提出开发玉门石油问题，并明确主张应由国库拨款。对于招商承办之事，认为至少也应待第一期计划实行后再予考虑。会上，钱昌照激动地说：“中国如果是一个上轨道的国家，在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采，太不像话了。”财政部长徐堪起而反对，坚持由私人资本承办。二人为此当场发生激烈争辩。

反对的意见不仅来自孔祥熙一派私人财阀们的代表，甚至来自一位学地质的官僚学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朱家骅。朱家骅早先留学德国，学习地质，曾创办了两广地质调查所、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等，于中国地质学事业发展也算有所贡献。此时，他以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掌门人的身份，又刚从玉门参观访问归来，说起话来颇有权威：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开油矿，即使生产出汽油来，抗战期间也肯定用不上。与其如此，还不如把有限的外汇用在直接进口武器和兵工器材上，开发石油是舍近求远。朱家骅的这种意见在当时还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建设非短期可以见效，与其花钱进口设备搞工矿企业，不如买武器来得简单。

但翁文灏、钱昌照等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工业化。日本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工业化。如果中国还不觉悟，即使抗战胜利了，也难免重蹈覆辙。不过经历了几年的官场历练，翁文灏对解决问题的门径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他让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做了充分准备后，带着他直接到孔祥熙的家中去谈。二人到了位于重庆炮台街的孔宅，孙越崎当面汇报了玉门油矿办理情形，又详细介绍计划的可行性，并表示：“这是功在千秋的事情，院长批准了，历史会记下您一笔的。”孙越崎甚至当面立下军令状：我们决不浪费一分钱，此事可由翁部长监督。也不知倒底是哪句



老君庙1号井外景

话打动了孔,总之孔祥熙最后竟然画了圈,完全批准了拨款计划。不过孙越崎并不领他的情,他说,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抗日,开发油矿,发展工业,不仅得不到积极支持,竟然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这种贪官污吏。走出孔宅后他还为此耿耿于怀。翁文灏大概是经历多了,见怪不怪了,对孙越崎说:“我们求他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又何必难为情。只要事能办成,又何必难受呢?”就这样,在翁文灏等人力争之下,1941年2月4日的行政院第502次会议决定:甘肃油矿由政府拨款开发。3月,油矿筹备处正式改为甘肃油矿局,孙越崎任总经理。随后,翁文灏又以资源委员会名义与西北公路局签订了《为运输机件及供应油料互相合约》;与军政部何应钦签订了从1941年4月起,玉门附近的玉门、酒泉、金塔、安西四县应征壮丁拨给该矿充当工人的协议。同时,资源委员会派出专人赴美国洽谈进口钻井、采油及炼油设备。

设备损失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决策的迟误,等到资源委员会得到外汇,再派出专人到美国考察、洽谈、订合同,定购的设备按照要求生产、包装、装船启运等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已经是1941年末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进口设备中有能钻深1000米的旋转钻机12套,抽油机40部,发电机5部,还有储油、输油设备和一套日炼原油1500桶的裂炼装置。由于中国沿海口岸均被日本侵占,进口设备只有经香港、越南海防及缅甸等地,从西南辗转入境。到1941年12月7日,这些设备除少部分尚在美国待运外,大部分分散在香港和缅甸的仰光、腊戍等地运输途中。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美英法等国在亚洲殖民地进攻,香港、仰光等地相继沦陷。到1942年4月,翁文灏、钱昌照仍在督促速将在缅甸的器材内运。此时资委会自美国进口的设备大部分在缅甸腊戍、八募等处存放。翁文灏指示:“如八募已不易内运,应将密支那、腊戍器材迅速内运,甘肃油矿极需,并请令运输处莫处长对油矿器材,务尽最后努力。”腊戍于28日失守。5月1日钱昌照电告:暹町已

失,秩序混乱,抢运极端困难。虽然经过竭力抢运,但大部分机械还是陷于敌手或毁于战火之中,总共在缅甸损失的设备有两千余吨。抢出来的物资一清点,也仅能勉强拼凑成四架钻机,炼油设备则根毛未剩。虽然后来尽全力搜罗了国内一些钢管钢材、订购了车床闸门等,自力更生地自行设计制造了釜式蒸馏炼油炉,但由于当时国产钢材质量不高,又没有耐高温高压的无缝钢管,自制的炼炉最高也只能提炼20%的汽油,而进口设备则可从原油中提炼汽油64%和4%的飞机用高级汽油。如果当初计划早些得到批准,以后的情况可能大不一样。

巨大成绩

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甘肃油矿局还是提出了1941年产量比上一年提高9倍,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宏大目标。翁文灏亲到玉门视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孙越崎率领科技人员、工人全力奋战,11月提前完成当年目标。1942年8月,蒋介石到玉门视察,对他们在戈壁荒滩深处所取得的成就,深表嘉许。

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日机轰炸,1941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的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1939年到1945年间,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今天来看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抗战时期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凡所用油皆赖其供应。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玉门油矿培养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为以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经理孙越崎也因开发和组织管理玉门油矿的成功,被授予1942年度中国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他成为继凌鸿勋(主持修筑粤汉铁路)、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茅以升(设计修筑钱塘江大桥)之后,第四位获此中国工程界最高荣誉者。历史已经铭刻下他们奋斗的足迹,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伟大的功勋。

(责任编辑 庄建平)

成吉思汗陵西迁记

● 薛衔天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血洗华北，屠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也正是此时，汉、满、蒙、藏等中华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不分种族，不分党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表现出空前的民族凝聚力。1939年成吉思汗陵西迁甘肃榆中，阅时数月，历地千里。所经榆林、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当地军政首长无不主持奉移大典，或遣派专员，舁其遗骨，殓以殊礼；而各城镇乡民，宁断隔夜之炊，亦踊跃宰牲献醴，祭奠我中华民族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英灵，人人舒张民族正气，个个藐视倭奴气焰。这是一次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大检阅，也是反对日寇侵略的大示威。

移陵缘起

日寇久欲亡我中华，然依其弹丸之地，鲸吞泱泱大国，力不从心，遂制定恶毒的满蒙政策：分裂中华民族，肢解中华躯体，建“满洲国”，设蒙奸政府（德王“政府”）。但广大蒙古族同胞不受其奸，与各族人民一起，奋起抵抗倭奴。1938年日军进犯包头，欲侵占鄂尔多斯草原，掌握蒙古族圣地——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伊金霍洛，以资胁迫蒙古族同胞，停止反抗。然其兵锋屡屡受挫，遂出险谋：盗取大汗银棺及速率定（大汗神矛）等神器，盗窃不成，则连陵带棺炸而毁之，永隳我蒙胞精神丰碑，其奸诈狠毒，莫此为甚。

是年10月，伊克昭盟郡王旗留日学生华登托拉固尔返籍探亲，途经归绥（今呼和浩特），将其探得上述日伪奸谋告知当局。此后风声日紧，有消息说：敌寇对伪蒙军讲话，鼓励其“发挥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之精神，向伊盟进军，夺回蒙

古圣地伊金霍洛。”又传，敌特务机关决定，与德王商酌，将成吉思汗之灵柩盗劫东移，如盗移不成，必要时即行炸毁云云。1939年1月13日，敌寇果然向伊盟新城进犯，并扬言进攻伊金霍洛。我守军更加英勇作战，打退来犯之敌。此次敌军虽未得逞，但其阴谋已真相大白，我有关当局不能不谋万全之计。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原系成陵吉农（奉祀官），遂于是年1月赴渝，向蒙藏委员会报告并密请转呈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妥筹万全办法，将成陵迁移，于是有移陵之盛举。

成陵乃蒙胞心灵丰碑

伊金霍洛汉语意为“主上园地”，位于伊克昭盟郡王旗境内，是700年来蒙古同胞之圣地。伊克昭汉语意为大庙，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地，位于甘陕两省之长城以北，属当时绥远省境河套地带，是蒙古西二盟之一。其幅员、资源虽不及其他各盟，而其历史地位则居各盟之首。盖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为全蒙古人心所系之故。其土地之所有权属郡王旗之扎萨克（旗长），而使用权则归于成陵守卫并祭祀者达尔扈特辈。达尔扈特即陵寝的“圣神护卫者”，以守灵为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

据记载，成吉思汗病薨于六盘山军中，其部众奉火葬后之灵灰，拟迳返大汗之降生地——斡难河，而运灵马队行抵伊金霍洛地方，骤遇狂风，飞沙走石，数日不止。部众因忆大汗生前曾称美此地，咸以为大汗威灵显应，佳城吉壤，毋待卜筮，遂奉安焉。先前，大汗行军至此，见四周沙丘环抱一片草原，绿草如茵，繁花棋布，百鸟奏鸣，

贊之曰“宝地”。当安葬完毕,狂风顿息,余风习习,风走沙鸣,如人间仙乐,部众皆谓神奇。

大汗陵寝为一复式帐幕,内供大汗之银棺、大汗御用之马鞍、大汗画像、雕弓一张、宝剑四柄。银棺长三尺,宽三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上镂龙文,覆以黄缎。据传,银棺内保存着真正的大汗骨灰(另据记载,大汗的骨殖葬于蒙古国境内),是我蒙古族同胞生命所系。另有速率定(神矛)霍洛,为专门供奉大汗神矛之地。传速率定为大汗建立武功之神物,共五,一大,四小,均铁质。大速率定之柄长丈余,矛之下端缀枣骝马鬃之缨,树立于陵寝之外,数百年来未尝锈蚀。四小速率定供小铜庙中,每年达尔扈特人众,擎以分巡伊盟各旗,供官民瞻拜。大汗第三福晋之灵柩,则安葬于去伊金霍洛90里之小伊金霍洛。

凡此数处者,蒙古同胞均视为圣地。700余年来护卫和祭奠不衰。蒙古族各部虽风俗有别,但一律尊崇大汗为始祖。每逢举行大祭,新疆、青海、西藏,乃至云贵等地均有蒙古同胞络绎而来,伊金霍洛实为联系蒙古民族的纽带。蒙古民众云:“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心,速率定为成吉思汗之灵魂。”且应指出,成吉思汗不惟蒙古族人民所景仰,他作为我国元朝的始祖,也被列入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列,得到了汉族等其他各族人民的敬重。

日寇欲盗棺毁陵,实冒中华民族之大不韪!

蒋介石决定移陵 程潜全权处理

最高当局接获情报后,密令傅作义副司令长官转敕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卓盟喀拉沁人)负责保卫成陵,并令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派兵

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謝覺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代表滕代遠,陝甘寧邊區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寇退兵,爲稱中國,不分蒙漢,如出一轍。雖然反共,實則殘民,萬家各族,皆眼中釘。乃有奸人,雖然附敵,漢有漢奸,家有漢賊,驅除敗類,整我陣容,抗戰到底,大義是安。頑固份子,準投降派,磨擦愈兇,敵於痛快。鞏固團結,唯一方針,有破壞者,羣起而攻。元朝太祖,世宗英傑,今日郊迎,河山生色。而今而後,五族一家,正團結,唯敵是遷。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雖異,在平努力。艱苦奮鬥,共產黨人,煌煌綱領,救國救民。武克繩,當仁不讓,大早雲霓,國人之望。清涼散,延水湯湯,此物

尙鑒

1939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謝覺哉及延安各界的祭文

协助,而伊盟保安长官公署亦派队前往,确保陵寝安全。白海风是当时著名的抗日将领,又是蒙古族人,在未奉命令前派兵分防伊金霍洛、小伊金霍洛、速律定霍洛、吉洛金霍洛等地,并准备足数骆驼,遇必要时即奉移至安全地点。

蒋介石接到蒙藏委员会转来的报告,即交战时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多数以为,成陵安全已确保无虞,遽然迁移,难免人心浮动,议决暂不迁移,万不得已时再迁。沙盟长面见蒋介石,直陈成陵为蒙古族民心所系,不可有万一差池,力主西迁。蒋介石遂从沙王所请,交最高国防会议复议通过,于1939年4月24日电令天水行营(行营设于西安)主

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

其电令曰:“西安程主任颂云兄:密。案据蒙藏委员会转据壹(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签请将成吉思汗灵柩迁移,免被敌伪窃据利用等情,经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决,准予迁移,并经核定暂迁甘肃榆中兴隆山,兹希转敕遵办下列各项:(一)准备一吨半以上之卡车十辆带油交由中央护送灵柩人员支配使用。(二)希派宪兵或得力部队六十名交由中央护送人员指挥随灵护卫。(三)成灵定由伊金霍洛经榆林转西安赴榆中,希转敕沿途军政长官迎送致祭,并妥善保护。(四)成灵抵达西安时,军政长官应迎送致祭,并妥善保护。以上四项,希妥慎机密办理。其余应办事项,应由中央护送人员商承办理为要。渝。中正。敬办四。印。二八、四、二四。”

遵照最高命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签拟办法,经呈请核示报可。政府派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军事委员会边事科科长唐井然、郡王旗协理台吉贡布扎补为迁移护送专员并以楚明善兼

主任,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旗扎萨克图布吉升巴雅尔、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归化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绥境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严、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等为启灵致祭官,并以沙盟长为主祭官,奉厝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俟抗战胜利后,仍奉还伊金霍洛,以示国家崇敬与保护民族英雄之至意。

在西安方面,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成立 100 余人的专门奉移成陵筹备委员会,将各项有关事宜安排停当。

圣陵千里播迁 共祭炎黄始祖

4 月初,迎厝成吉思汗灵柩专员楚明善、唐井然率领随员自重庆首途,月中抵西安,当与天水行营商洽关于启运办法,并经由军事委员会电令绥、陕、甘各省政府,第二、第八、第十各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准备沿途警备及经过县城迎送致祭等事宜。

6 月 8 日正午,举行小伊金霍洛起灵祭典。小伊金霍洛为小主上园地,去扎萨克旗政府约 15 里,是为成吉思汗第三福晋巴格鄂金之陵寝。两蒙古包相连属,内间藏厝福晋之银棺,外间系甬道,包内四周张黄色布幔,棺前设香案,案前置铁火架一,棺上悬双剑,案旁竖四矛,陈设极为简单朴素。由沙盟长和唐专员致祭词,仪式按蒙古族通例。

9 日黎明,中华民族史中有名之祀典开始。致祭官沙克都尔扎布、图布吉升巴雅尔、邓宝珊、高双成、荣祥、傅作义,代表袁庆曾、何柱国、白海风,奉移主任专员楚明善等率步骑官兵 700 余人齐集于伊金霍洛,伊盟各旗代表达拉特旗扎萨克康达多尔济等 20 余人均先期到达。祭奠程序悉以民国礼制,三献供,九鞠躬,在悠扬之军乐声中大典告成。当时并由中央党部特派摄影师摄成新闻影片。礼毕,沙盟长以吉农地位率各旗代表举行旧制礼仪。祭礼告终,移灵用之白色神驼、高轮大车导入陵坛,成吉思汗之银棺即由达尔扈特辈虔敬移入灵车。当时执事者之态度庄敬肃穆,观礼之蒙古同胞均热烈欢呼,表示衷心拥护政府移陵决定。

6 月 9 日上午,成吉思汗银棺自伊金霍洛起灵。下午,成吉思汗福晋银棺自小伊金霍洛起灵,先后运抵扎萨克旗阿木台庙。10 日正午,绥境蒙旗政务委员会、察绥蒙旗党部、伊盟保安长官公署、伊盟盟政府、扎萨克旗旗政府、扎旗保安司令部、扎旗学校等各派代表,举行公祭。13 日,银棺、铜庙、速率定、祭器等由十八里台起运,千里移陵正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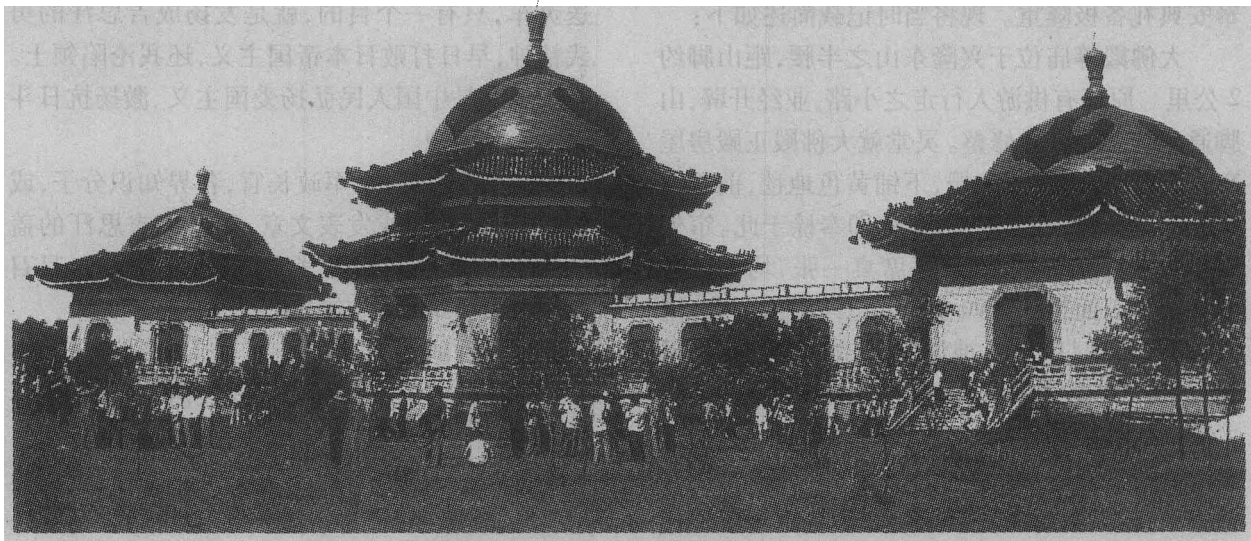
自扎萨克旗起运,沿途蒙古汉族民众,均从遥远村庄踏沙而来,顶礼膜拜,虔诚敬信,情真意切。各族民众目睹圣灵远道播迁,悲愤激昂、同仇敌忾之情溢于垄亩。

16 日下午 3 时,灵队抵榆林,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及民众二万余人,各擎五色标语纸旗,齐集北郊恭迎大汗灵车。烈日下民众夹道而来,焚香瞻拜,作吉祥之祷告。灵柩抵北关,在欢呼雷动声中入城。爆竹声响彻云霄,国旗插遍街头巷尾。大汗灵车在盛大欢迎声中穿城而过。灵堂设在南门,彩棚正中悬大汗遗容,香案罗列,陈设牲、醴、果、蔬各种祭品,四壁满张挽联谏幛、花圈。灵柩入灵堂后,祭奠随即开始。主祭官行政督察专员兼榆林县长富文领导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公祭。此外,绥境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严代表长官阎锡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相继致祭完毕。在庄严肃穆之祭乐声中率与祭之公务人员绕棺一匝,典礼随之告成。随后,由护卫军警领导灵堂外观礼之民众绕棺,各遂其瞻仰圣灵之愿。

18 日,灵车抵米脂县城,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代表延安各界前来祭奠,发表热情洋溢的祭文,号召五族一家,内除败类,外抗强敌。

19 日,清晨离米脂县,晚 8 时半抵绥德,到场迎祭者有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绥德县政府、县党部、八路军驻绥德部队等 20 余单位。绥德当抗日战事前线,灵车过境未便久留,午后 5 时抵清涧,20 日抵延川县之永平镇,22 日上午 10 时抵甘泉县,傍晚抵洛川县。

23 日 9 时许过轩辕黄帝桥陵,蒙古籍护送专员贡布扎补及达尔扈特要求:“黄帝为我蒙汉共同之始祖,今日机缘巧合,拟往拜谒。”楚明善、唐井然两专员欣然接受,前导登桥山恭谒黄



成吉思汗陵园

陵,并由楚专员讲解蒙汉同祖之历史,所有蒙古同胞甚为感动,其对黄帝祭奠之虔诚,于成吉思汗毫无二致,“蒙汉一家”,得到生动体现。

谒陵毕,灵车入中部县。上午11时抵宜君县。下午4时抵同官,县长田在养率民众两千余人,在大雨滂沱中举行公祭,秩序井然。牲醴供献甚丰。同官为极贫瘠之区,戮力为之,民众诚敬圣灵、恪恭将士之精神,令人无不感动。

24日12时抵耀县,3时半,抵三原,县长何庭铠,骑军骑兵第二师师长马禄率军民5000余人郊迎于五里外,在南关外城南公园祭场恭谨致祭。5时3刻,经泾阳县,7时灵车疾驰抵咸阳城外。省主席蒋鼎文郊迎十里之外,设坛路祭,沿途迎灵之军民十余里。

灵车转赴西安,自西稍门入西关,全市旗帜飘扬,鞭炮之声有如珠连,市民焚香秉烛,夹道欢呼,灵车缓行三里许,进安定门,过西大街,所经各十字路口,均搭彩坊,又四里许,达钟楼安灵所。钟楼为明代建筑,位于城之正中,高7丈,通东西南北四大街,遥与四城门相对,楼下穹庐极为宽广,灵堂即设于此。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于中央特派护灵专员抵陕后,即敕西安各机关妥慎研究灵车过境时之安全问题,并经行营政治部、第一战区政治部、陕西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部、陕西省政府等机关召集各人民团体学校等成立成吉思汗灵柩迎送大会,经月余之筹备,动员工作人员达百余人。会场灵坛正中设方坛,两银棺安置其上,坛之四面穹洞中遍插联幛花

圈。面南为致祭位置,门外四周均扎彩制牌坊,堂皇富丽。夜9时,祭礼开始。行营主任程潜代表宴勋甫,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陕西省参议会议长宋联奎以及各机关首长,各团体、各学校代表,依序举行公祭。灵前牲醴果蔬,铺陈甚丰,继宣读祭文达数十通。于是庄严肃穆之盛大祭礼遂在军乐悠扬声中礼成。参加之10万群众为此一片欢呼。

从西安起,灵队转乘汽车,大大加快行程。26日黎明灵车运回咸阳。27日由咸阳西行,过醴泉、乾县、永寿、彬县。28日过长武,入甘肃省境,经泾川、平凉、隆德,于7月1日抵榆中。由此西南行15里即达奉安地点之兴隆山。

至此,千里行程,始行结束。

宝山安灵

兴隆山去兰州90里,层峦耸秀,长林郁翠,松风拂面,灵泉洗耳,真是难得宝地。大汗灵柩厝此,人杰地灵,相得益彰,如同天造地设。灵车到来之前,本地阴雨连绵,7月1日开始,云开气清,山岚郁秀,似迎圣灵,随行蒙古同胞莫不欢天喜地。关于灵堂、道路、随护官员住所、驻守部队各项,均由甘省府各机关组织之迎厝成吉思汗灵柩筹备会一一布置完善。除灵柩安放地大佛寺外,山上娘娘庙、药王庙、灵官殿、菩萨殿四庙均经鸠工修缮,粉饰一新。是日,大汗灵柩、福晋灵柩、速率定等神器一并奉移入争秀峰之大佛殿,

奉安典礼备极隆重。现将当时记载简述如下：

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东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原仅有供游人行走之小路，业经开辟，山脚通西兰公路亦经修整。灵堂就大佛殿正殿房屋高度宽度，上以黄布架棚，下铺黄色地毯，前悬黄缎红布，里连檐走帘三副，灵柩即奉柩于此。帘外设象腿黑漆木神龛三具、祭席桌一张，均饰以红布桌围，正面悬二尺四寸成吉思汗画像一张，镜架一座，万年灯一盏，神灯六盏，蜡烛台三对，果碟九只，大小香炉三座，及花瓶香插等陈设。并就大殿梁柱各形势扎红黄二色洋布半圆彩坊三座，檐以红彩金花纸球装饰，各悬匾额、对联。左右壁，左右偏殿均满悬各界所献联幛花圈。大门扎彩坊一座，沿山道树枝点缀以红彩，山下扎松柏立体彩坊一座，悬党旗、国旗，榆中城外大道与上山路衔接处，扎红黄蓝三色立体彩坊一座。抬灵杠夫二十四名，各着黄土布服装，灵前引以黄绋，主祭官及陪祭人员均执绋前导，军乐抑扬，龙旗招展，武士赳赳，民众熙攘，与岚光翠蔼，寺壑雄山相辉映，声容并茂。灵车到达路祭处及山脚，各鸣炮九响，鞭炮三万，安灵时燃鞭四万。灵前祭席一桌，供果九碟，龙烛三对，花烛三对，焚檀香。祭牛一头，羊九只，猪一口，路祭羊三只，花烛一对，供果九碟。

司仪读赞者各二人。国民政府特派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为安灵主祭官，所有驻甘中央各机关代表，地方党政军机关代表，省立大中小各校师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观光外宾千余人均入山与祭。中央特派护送专员楚明善、唐井然、贡布扎补亦共同与祭。圣灵妥奠后，随灵之喇嘛、达尔扈特诵经，山中羽士亦奏乐朝拜，奉安大典于是告成。

政府特派一连军队长期驻守兴隆山，随行土尔扈特照常守灵，直到抗战胜利灵柩迁回原址，圣灵毫发无损，日寇奸谋最后落空。

弘扬爱国主义 激扬抗日斗志

这次移灵，灵队行数千里，经数十个县镇，沿途社会各界，上从最高地方军政首长，下到普通百姓，迎送灵车者总数达几百万人。他们不分党派和民族，不论狂风暴雨，不管酷暑高温，热烈迎

送灵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扬成吉思汗的勇武精神，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沦陷领土。这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激扬抗日斗志的生动表现。

在移灵过程中，军政长官，各界知识分子，或撰写挽联祭文，或发表文章，颂扬成吉思汗的盖世武功，藐视倭奴嚣张气焰，谴责日寇暴行，号召各族人民团结，军民奋勇杀敌。

代表性的祭文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等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的祭文：“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豁然反共，实则残民，汉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谄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容，抗战到底，大义是宏。……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生色。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

阎锡山的祭文：“全民一致，奋起图强”，“抗战胜利，再奠陵冈”。朱绍良的祭文：“慰祖英灵，系我民望”。邓宝珊的祭文：“繫维太祖，神武英明……阅七百载，倭寇横行……更施狡计，毁我阵营，图窃陵寝，用资号令。爰为遣地，永固佳城，维蒙与汉，如弟如兄，幸祈呵护，共跻升平”。八路军驻榆林办事处祭文：日寇“竟欲利用德王，盗我元太祖灵柩为号召，投彼之计。……殊不知我中华民族，精诚团结，愈战愈坚，非任何鬼蜮伎俩所可破坏也。中央为彻底击破敌计，并仰慰先灵，而加强抗战，决心特派大员亲临奉移，典至重也。”

具有代表性的挽联有：

阎锡山的挽联：七百年漠烈如新外薄裨瀛犹震叠 三千里灵神昭格即看民众共讴思。

朱绍良的挽联：武烈震西欧东亚之邦百战功勋垂汗简 大行自梧野桥山而后八方风雨奏神弦。

蒋鼎文的挽联：鲸波东起龙驭西迁远道过三秦此去名山传福地 汉武堪俦唐宋未逮丰功照一代每怀大漠仰雄风。

邓宝珊的挽联：勋业满乾坤想当年叱咤风云纵横欧亚 寇氛连华夏看此日仓皇战马凭吊英雄。

（责任编辑 周 庄）

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

● 江仁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诱因,贩毒走私、黑社会性质犯罪死灰复燃,犯罪的有组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国外犯罪组织加强渗透,从而导致了新型犯罪——洗钱犯罪的出现,并呈现蔓延之势。据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反洗钱行动形势紧迫,任重道远。为此,本文就洗钱犯罪的特点与防治进行粗略探析。

洗钱犯罪的主要特点

洗钱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芝加哥等城市出现了以阿里·卡波涅、莫龙、约·多里奥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大力发展自己的犯罪企业,谋求巨额的经济利益。这个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财务总监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服,服务费收取现金,每晚计算当天洗衣服的收入时,他将其他非法所得的赃款加在一起,再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扣去应缴税款外,剩下的犯罪所得也被披上了合法收入的外衣,从此便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洗钱”一词的来历。在我国,洗钱犯罪现象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出现的洗钱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国际上一些犯罪分子也盯上了中国大陆。不久前,国际反洗钱专家、七国集团金融特别行动组主任迈克·唐纳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多年卓有成效的反洗钱努力,目前洗钱犯罪已经改变了目标,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这些国家没有反洗钱法和金融监管滞后等弱点,大肆进行洗钱活动。”因此,反

洗钱问题不仅受到理论界和法律界的严重关注,也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国刑法第 191 条谈到洗钱的几种行为,即,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效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提供资金账户的;协助将财产转移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通俗地说,洗钱就是将从事犯罪所得的赃款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中转,掩盖其非法来源和性质,使之合法化的一种行为。比如将走私、贩毒、逃税、诈骗、贪污受贿和资本外逃等犯罪所得,通过银行或其他方式的经济运作而披上合法外衣,造成其收入来源合法的假象,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可见,洗钱犯罪是各种经济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派生物。但是,洗钱犯罪有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各种犯罪的特点,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洗钱犯罪具有显著的国际性。据了解,洗钱犯罪多发生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墨西哥以及亚洲的新加坡、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澳洲的澳大利亚等。近 30 年来,随着国际上有组织恶性犯罪的日益猖獗,不法分子洗钱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近来联合国官员称,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 1 万亿至 3 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洗钱的总数额相当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5%。按照上述估计的最下限,相当于西班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目前,洗钱这一产业,以极快的

速度增长为仅次于外汇和石油的世界第三商业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还惊人地指出,全球的“黑钱”累积至今已达一兆亿美元,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一千亿!国际性还表现在洗钱活动往往在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进行。洗钱者除了以运输方式跨越国境进行洗钱之外,还常利用电子资金划拨,在一国境内进行跨国资金转移,有时还在不同国家共同对犯罪收益进行清洗。洗钱者常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形成国际性的洗钱组织。同时,洗钱者还利用各国主权管辖范围的限制,将犯罪收益在几个国家之间转移,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第二、洗钱犯罪具有危害的严重性。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洗钱犯罪活动在我国早已呈现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据有关方面估计,近十年来,中国内地每年洗到海外的黑钱至少高达 20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相当于 225 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如果这些黑钱用来弥补 3098 亿元的 2002 年的国家预算赤字,赤字水平将减少 64%。据有关人士测算,中国每年因此受到的财税损失达近千亿元。在我国,洗钱犯罪危害的严重性,还突出表现在:一是腐败与洗钱的紧密结合。洗钱活动之所以猖獗,是与那里起主导作用的财界和政界代表人物腐败紧密相连,腐败不但需要洗钱,有时还保护洗钱。2001 年 1 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 4000 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 50 多亿在逃。”国家反贪总局的官员透露:外逃人员中,在金融系统的人员比较多一些,其他为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董事,以及具体接触、掌管钱财的财务人员、营销人员。不久前,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远逃加拿大,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名前任行长余振东和许国俊,此三人所涉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涉案金额高达 4.83 亿美元。我国近年来出现了一股严重的资本外流现象,在国外出现了一批所谓的“中国投资移民”,这些投资移民一掷千金的气势和现金交易的习惯,使得外国人瞠目结舌。当近年国内一些海关关长纷纷身陷囹圄之时,北美西海岸如旧金山、温哥华等城市的房地产却在升温,购买者中有部

分就是原在国内海关、缉私办、公安、法院等执法部门工作过的中国移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司法部门的形象。洛杉矶有个名叫东北村的别墅群,总计有 600 多幢别墅,平均每幢售价 50 万美元,购买者大多是来自中国的所谓“投资移民”。可是有些豪宅的隐居主人却是语言不通、习惯迥异的“孤儿寡母”,男主人在国内“发展”。有知情人士指出,这部分人的资本绝对是黑色收入,所谓的“投资移民”的投资也就是“洗黑钱”。“黑金”的加速外逃,说明了中国反腐力度的加大。二是洗钱与贩毒成为一对连体婴,相互纠缠,掩盖罪恶。据某省缉毒部门的报告称:“在那里,买卖毒品的毒资可以像正常贸易一样在银行间进进出出,丝毫不受限制。”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毒贩子,都是将毒资以 4.9 万元以内的不同数目,用他人的名字或买个假身份证用假名字存入各个银行(许多是同一个人在银行办理众多人的存款手续)。毒贩子这样做,是为了逃避银行 5 万元以上大额资金的存取登记报告制度。许多毒贩子常年以这种方式将毒资存入取出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或调查。据了解,在几百人的小镇上的农业银行储蓄所,就有几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日进出上千万元。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毒贩子聚居的地方,而问及当地一些银行却说,不知道。一些刚出道的毒贩子甚至通过贷款贩毒而成为大毒枭或大老板,他们可以自由运用银行资金,有时用大笔贷款,有时用大额现金,有时用信用证对境外购买毒品担保。许多毒贩子内外勾结,采取联合投资的办法,把购买毒品的毒资或其他非法所得从境外打到某地,建饭店、酒楼、娱乐场所,建完后抵押给银行,然后从银行贷出来的钱就可以大胆地用了;还有的毒贩子以股份顶替购买毒品的毒资。这些方法使得贩毒分子非法所得变为合法收入。另外,在某地的贩毒重灾区,盖房消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房子盖得非常漂亮,而这个地区的人无什么生意,也没有合法收益,显然是贩毒所得盖的房子,但又无法去查。这种情况的存在,刺激了本是奉公守法的人走上贩毒之路,因为这样来钱容易,消费非法所得又没风险。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几乎每一次成功的毒品交易,都是以银行为媒介,几乎每一笔毒资最终都是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成

为正常收入。”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其一，它直接妨害着对犯罪活动司法追究，还诱发重复犯罪；同时还会使一大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因得不到应有的法律追究，仍然在政治肌体中蔓延和泛滥。其二，不仅破坏了金融机构的信誉，而且数额巨大的洗钱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黑钱”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并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其三，洗钱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走私、贩毒、逃骗税、逃骗汇等违法犯罪活动，通常表现为外汇的流失，影响外汇储备，进而影响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稳定。有人担心这将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专家指出，这种“黑钱洗白”，实际上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大笔的非法资金流入投资市场后，便扰乱了整体经济的合理发展，使金融界变得混乱异常，在特定条件下还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洗钱犯罪在中国具有自己的特色性。我国刑法规定，洗钱犯罪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以及走私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联系在一起，而为贪污受贿等犯罪所得及收益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却被排除在洗钱犯罪范畴之外。然而，在我国一种新的洗钱犯罪，即腐败的公职人员洗钱现象日趋严重。他们一方面充当洗钱犯罪的“保护伞”，另方面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及恶劣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洗钱犯罪。所谓洗钱的特色性，就是有些经济专家指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洗钱”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父母、老婆、孩子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

如江苏连云港市前副市长鹿崇有一案，鹿委托其年迈 80 岁的父亲及 70 岁的母亲为法定代表人，注册一家化工企业，便于将自己非法所得投入该企业，隐瞒资金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账户上，又可能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四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清”。虽然国内腐败分子在国际洗钱活动中还未形成规模，但也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某些领导干部早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或在筹划弄出去。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贪污受贿大案轰动全国，其聚敛如此惊人数目的不义之财而没有被发现，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实施了“洗钱”手段。戚案的一个重大线索是公安人员截获的戚火贵妻子寄给台湾亲戚的一封信，信中请求亲戚帮助遮掩他们 1300 余万元家产。此外，在我国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闽浙粤等沿海地区，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地下钱



庄”，主要从事非法外汇金融中介服务，其通常的操作手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则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指定的境外账户。起先钱庄主要为外汇需求大、靠正常渠道得不到及时满足的企业换汇，逐渐演变为走私贩毒、骗汇逃汇、偷逃骗税等非法收入的洗钱工具和资本猖獗外逃的重要渠道。在走私较为猖獗的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地下钱庄为犯罪分子洗黑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总案值高达 530 亿元、偷逃国家税款 300 多亿元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中，赖昌星的非法收入几乎全部通过地下钱庄流到境外。在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 2000 亿元人民币中，走私收入约为 700 亿元，官员腐败收入超过 300 亿元，剩下最大的一块竟然是一些洗“白”为“黑”的合法收入，即外资企业出于避税的目的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据资料显示，在汕头的潮阳、普宁两地从事骗取出口退税款的 100 多个犯罪团伙，仅从 1999 年至 2000 年 6 月，就虚开增值税发票 323 亿元，涉及偷漏税近 42 亿元，这些犯罪活动与地下钱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洗钱犯罪的过程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洗钱犯罪活动通常与其他犯罪行为纠缠在一起，没有固定的模式，特别是在贸易全球化时代，金融全球化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增加了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的复杂的连通关系。一位法国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说，法国和外国银行的许多高层人物私下承认，他们银行洗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从中提取了高达 10% 至 15% 的利润；而且每进行一次“重大洗钱”，还要提取 25% 的中介佣金。毒品洗钱每年达 1000 万美元，而被专门机构查获的还不足 1%，犯罪集团宁愿牺牲 40% 的利润，再将剩余部分投入到合法经济中进行再循环，相比之下，被查获的数额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以“职业秘密”和“不干预”为由，在犯罪集团和合法经济之间竖起了一道挡风板。非法资本与偷税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再循环，金融系统变成了一个熔炉，使腐败的“灰色区”和毒品走私的“黑色区”难以划分，腐败保护洗钱，洗钱滋养腐败，形成了一个金融旋体，从而助长了经济犯罪。据中国人民银行专业人士分析，洗钱活动有四个共同的因素，案犯

在进行洗钱活动时通常会考虑到：需要隐藏有关金钱的真正所有权及来源；改变有关金钱的形式；洗钱过程不得留下明显的痕迹；最后，必须始终控制洗钱的全过程。因为洗钱者要掩饰或隐瞒犯罪收益的性质、来源，就必须要对犯罪收益原有的形式加以转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将犯罪收益伪装成合法收益。典型的洗钱过程常常分为处置、分层、融合三个作业阶段才能完成。具体讲：一是处置阶段。洗钱者将黑钱放入清洗系统，准备进行清洗。通常洗钱者将犯罪收益通过各种方式投入金融机构，以掩盖其非法面目。如存款、电汇到银行，或直接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保险，其采用方式多种多样，而这是犯罪者最容易被侦查到的阶段。二是分层阶段。犯罪所得资金进入清洗系统后，洗钱者便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转账金融交易模糊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将非法所得及其来源分开，分散其不法所得，通常是用账户上的资金进行期货交易，买卖贵重商品，买卖外汇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资金流动多是跨国界进行的，而且大多流向银行保密制度较严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犯罪收益的追查较为困难。美国、欧盟一直认为，一些国家银行的保密制度、宽松的监管体系是造成 90 年代末期亚洲、拉丁美洲地区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也是洗钱活动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三是融合阶段。经过分层阶段的清洗，犯罪所得资金已具备合法形式，洗钱者便以一项显然合法的转账为掩护，使黑钱与合法资金融入到合法金融和经济体制中，如投资于实业，用作正当正常的流转资金等。此时，犯罪收益已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犯罪收益人可以自由地使用该犯罪收益了。从洗钱活动的过程可见洗钱犯罪的复杂性，也使得洗钱犯罪更加隐蔽、诡秘。

第五、洗钱犯罪的手段具有高度的专业性。随着全球金融业的飞速发展，金融服务日益方便快捷，计算机等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金融领域，这为洗钱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洗钱也发展成为国际性专门产业，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洗钱者，其中有的是银行家、律师、投资专家，有的是会计师、经纪人，由于他们精通法律或相关经济业务，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专门为走私、贩毒、黑社会犯罪集团等上游犯罪者提供洗钱服务。这里

仅就电子商务与金融犯罪的紧密结合方面为例,即可看到洗钱犯罪的高度专业性。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开通和跳蚤卡的出现,电子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付款方式。覆盖全球的个人电子转账速度快,取缔了票据和货币的储存与流通,使那些不法大款商人最感头痛的问题迎刃而解。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全球网络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网址,自诩能“处理来源于任何活动的现金”,在安提瓜岛和马恩岛提供“隐秘资产服务”,帮助顾客把资金转入美国银行系统,而不让任何人包括政府知道其来源。欧洲联盟银行是一家国际互联网离岸银行,在加勒比海地区“提供税务保护软件,该软件已通过了国际金融和商业集团的测试”。美国安提瓜岛国际企业服务公司又向前迈进一步,不仅在网络上提供银行服务或指定商业票据付款地点,而且还承办“安提瓜、多米尼加和圣基茨的永久性寓所、护照和公民身份”等服务项目。正如两位司法专家指出的:在应用电子的时代,很容易隐蔽活动地址,甚至用假身份偷税。因此,一个多国公司如果在税收天堂(有人说是电子天堂)里安插一个操作员,就能在全世界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必付任何税收。与这些偷税的可能性相一致的是,电子支付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应用也为洗钱创造了方便条件。电子付款的发展,只要不纳入国际财会范围里,最终会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变得脆弱。

洗钱犯罪的防治

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洗钱犯罪,而且洗钱犯罪的过程和手段将渐趋“成熟”,国外的各种洗钱方法都将在我国出现,如设立掩护性的空壳公司、在股票证券市场中洗钱、在保险业务中洗钱等等。所以,我国的洗钱犯罪,今后在数量和性质上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严重的经济犯罪。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而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不配套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无序现象的存在,使得种种经济犯罪不断滋生蔓延,加之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刺激,境内的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将犯罪资金转移到境外进行清洗,然后再回到境内进行合法投资,所以,洗钱犯罪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必然。二是由于

我国金融制度的短缺和不健全,也为洗钱犯罪提供了契机。目前我国采取比较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银行账户管理比较落后,票据市场不够规范,银行控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机构主体多元化,必然带来经济利益多元化,使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不严格依法对开户申请人进行严格审查,对客户通过账户进行资金处理,也放松了查明资金的真实来源和用途。另外,我国的金融服务和信用制度也不够完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现金交易比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黑钱很容易和合法现金混合,也不易引起警方怀疑。三是由于我国反洗钱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健全,犯罪分子清洗犯罪收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1997年刑法修订后,虽然规定了洗钱罪,但犯罪对象仅限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效益。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和一些控制洗钱国家的立法相比,打击洗钱力度略显不够。从国际合作来看,国际反洗钱领域有互相合作、利益共享的规定,而我国还缺乏完善的反洗钱体系的法律,中国和国外之间没有反洗钱方面的相互协议,则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因此,我国近年来多次发生犯罪分子把资金转到国外,虽经查出,资金难以归还,犯罪分子难以引渡。所以,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使得国内反洗钱工作尚且举步维艰,对付跨国洗钱更难以奏效。

反洗钱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又是个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任何一方面的努力都不可能奏效。笔者认为,必须在总结我国已有的反洗钱实践和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洗钱犯罪活动的特点和形成的原因,进一步加大反洗钱的力度,要真正在防治上下功夫,从思想、立法、执法、金融防范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对洗钱的预防、控制和治理,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洗钱防范体系。

第一、要进行反洗钱的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全民反洗钱的法律意识,是反洗钱的前提。当前,对何谓洗钱,洗钱的严重性、危害性如何,法律法规有些什么规定,怎样依法反对洗钱犯罪活动,又如何依法防范洗钱犯罪等等,不仅普通公民知之甚少,即使国家公务员、甚至很多司法部门和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知之不多,因此,要结合

正在开展的第四个五年全民普法教育的时机,在全民中,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司法机关、金融、税务、海关等系统,以及企事业单位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县以上领导干部、与反洗钱有密切关系的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经过学习,考试或考核合格,才允许上岗。

第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是当务之急,也是反洗钱的基础。现行刑法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等三种,这一规定与国际公约和控制洗钱国家的立法相比,将洗钱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限定得过窄,不利于惩治洗钱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事实上,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等犯罪不但危及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涉案金额丝毫不逊色于毒品犯罪等三种犯罪。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上游犯罪的范围。另外,追缴赃款是打击牟利型犯罪的重要方面,应把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所有犯罪收益,以加强对洗钱犯罪及上游犯罪的打击力度。其二、完善有关客观方面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过于简单,难于涵盖复杂的洗钱行为,应适当增加和完善,或制定衡量一定行为的合理标准,使实践中有法可依。其三、修改有关主观方面的规定。为了严密刑事法网,有必要将“明知”改为“应知”,只要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行为人应当知道其处理财产是非法的,即可定其构成犯罪,而不必确证其明知。国际上对犯罪收益的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反置,即被告人认为某项财产不属非法收益,不应予以没收的,由其举证加以证明。这一立法模式,值得借鉴。其四,赞成许多专家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有利于加大我国反腐败的力度,而且有利于加快建立可疑资金的报告制度,更有利于与国际反洗钱的同步与合作。

第三、加强对洗钱犯罪的侦查,是反洗钱的关键。必须认真侦查洗钱犯罪的资金流向,加大对重点区域、行业的控制。如控制秘密贩毒交易地、走私犯罪多发区域的边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珠宝店、首饰店、房地产公司等,并对重点嫌疑对象实施监控;收集并分析各类情报信息;核查金融记录。其次要注意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兑汇、转账业务的证明材料,对于某些通过虚假的商业活动来掩饰洗钱行为,可以通过

概率分析、抽样分析和隶属关系分别加以揭露。同时加强与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协作,及时发现较大规模的经济犯罪的存在。

第四、健全以金融制度为中心的反洗钱预防机制,是反洗钱的核心。因此,健全金融制度、加强金融监管成为预防和控制洗钱犯罪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强现金管理,充分发挥银行的调控作用,严格现金的审查管理制度,健全银行的货币监控和控制机制。同时,应采取切实措施减少坐支现金、套取现金的现象,加快现金的归行速度。二是建立健全有关金融制度,如建立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交易记录和记录保存制度等。三是完善个人税收征管制度,加强稽查,有利于发现个人收入中的可疑因素,有利于对具体洗钱金额的准确定量,有利于没收的执行,做到罪刑相适应。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洗钱犯罪,是反洗钱的重要环节。反洗钱国际合作大致有以下方面:一是国际间反洗钱的情报信息和技术交流的共享。只有掌握了资金的具体流程和动向,才能甄别异常资金。二是双方互相设立执法处,合作打击包括洗钱犯罪在内的各种跨国犯罪。三是通过谈判缔结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加强司法协助与合作。急需将洗钱犯罪规定为可引渡犯罪。所以,我国应尽快完善有关引渡、没收等方面的规定,以适应反洗钱斗争的需要,增强反洗钱犯罪的能力。

第六、进一步加强反洗钱的组织建设,培训反洗钱的专业人才,是反洗钱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措施有力,反洗钱力度加大,但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到实处,尽快见到成效。为此,建议:一是反洗钱工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监督检查、设施装备等应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强化条块结合的领导管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实行严格的系统、地方、部门(单位)领导和专业岗位人员责任制,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三是反洗钱工作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很强,非常复杂,应加强反洗钱的专门工作人员和与反洗钱业务密切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以适应反洗钱斗争的需要。

(责任编辑 程 度)

人民币总设计师谈人民币

● 朱鸿召

由奥地利中央银行行长克拉尼斯特 (W. Kranister) 主编的《国际钱币制造者》一书,从艺术设计和印刷技术两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选取八个国家的钱币,加以研究介绍。这八个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美国。其中亚洲只有中国的人民币(第二、三、四套)入选。这标明人民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为此,记者走访了第二至四套人民币总设计师罗工柳先生,请他介绍人民币设计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毛泽东三次拒绝自己的肖像上人民币

新中国迄今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开始发行的,至1955年3月全部收回。这是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的钱币,无论是设计还是印刷,都比较粗糙。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石雷介绍,1947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董必武为主任。同年8月,该处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同时组织人民币的设计印刷工作。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原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沈乃镛。稍后,他们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制局设计人员,参与第二、三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金额数字等中文正楷字,都是董必武题写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根据国际惯例,设计者曾将毛泽东主席头像安排在票面草图上。送审后,毛泽东否定了,认



罗工柳

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这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的意见,票面图案设计为解放区工农业生产。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长的石雷请示行长南汉宸,说现在毛泽东已经当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是否可以印主席像?南汉宸说:此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前些天我到中南海开会时,趁会间休息,我当面请示主席,主席讲,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为我们进城前开会有过

决定。这个决定是指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筑物和工厂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歌功颂德、贪图享受、不求进取的情绪,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毛泽东第三次拒绝自己的肖像上人民币,是1950年4月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时,设计人员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英镑用女王,美元用总统,苏联卢布用列宁像,第二套人民币初稿上有毛泽东肖像。送审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

这样,第一至四套人民币上始终没有出现领袖像。甚至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二角券,原设计毛泽东号火车头上嵌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头像,最后也换成一颗五角星。其他诸如一元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五元券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像游行场面中的主席像,全部被取消。

青铜器铭纹,人民币上的中国特色

1950年4月,中央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提议,进行人民币改版工作,并指示:人民币改版后要达到世界水平,必须请专家担任设计。主持其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王显周和印币厂厂长贺晓初,找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兼党总支副书记的罗工柳。罗工柳又推荐了长于图案刻绘的周令钊参加。

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的下午,银行的车子就把他们接到工厂里,连续工作一夜一天,星期天晚上才送他们回家。当时这是绝对机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妻子问,也只回答开会去了。所以,很长时间妻子们只知道他们每到周末就去“开会”。

他们首先研究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设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考虑到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有我们应有的位置,就特别注意设计中的民族特色。1949年前国统区流通的法币,是请英美专家帮助设计的,没有中国特色,也就没有世界地位。他们设计的毛泽东头像方案被否定后,在很紧张的时间里,最

后选用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景物作图案,其中一元币是天安门,二元币是延安,三元币是井冈山,五元币是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还有没有印制的十元币工农兵代表。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和数额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请该行经济处的马文蔚写的,魏碑“张黑女”字体,端庄秀丽,文雅大方。

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币,他们设计好以后,拿到苏联制版印刷。我们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访华,中苏闹翻了,我们要版子,老大哥不给,怕他们随便印刷,从此以后就把三元币取消了。在已经发行的人民币中,这个币种的数量是最少的,目前市场上的收藏价值甚嚣尘上。

随后,1959年他们又设计第三套人民币,专家组由2人变成5人,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还有长于人物素描的侯一民、邓澍夫妇参加进来。这套以女拖拉机手、纺织女工、炼钢工人为形象的设计,政治色彩太浓,还有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政策性的东西都上了货币。作为货币的世界性、永久性特征不明显。但其中的十元币各族人民大团结,设计立意较高,艺术性很好,质量上乘。

在这几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负责图案设计的周令钊拒绝一般货币上的机械花纹,大胆采用民族图案,将一种“唐草”、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故宫的窗棂图案加以变化创新,运用到票面设计上,并且用圆圆的纹样把面额数字围起来,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样。特别是第四套人民币中的五十元币,采用青铜器大克鼎上的铭纹图案,古朴高雅,独一无二,民族气息一下子就洋溢出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先后发明并使用了反平凹版多色接线印刷、浮雕水印造纸、有条件油墨显证、盲文手感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了人民币在世界钱币体系中的独创地位。

中秋之夜,给周总理 写了一封鸡毛信

人民币设计一直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其事者的家人不知道,工作单位同事也不知道。这个机密被捅破,是“文革”中的造

反派干的事。罗工柳这些专家都受苦了。时至今日,罗工柳回忆此事,仍然心有余悸。

那是1967年的中秋节,上海造币厂的造反派串联来到北京,与人民银行系统的造反派搞到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大门贴出海报,“定于明天上午揪斗罗工柳……”进进出出的人都很奇怪,画画的罗工柳怎么与银行有关系呢?此前,罗工柳已经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监督劳动,打扫卫生。走过门口,他心里明白是设计人民币的事,这些家伙硬要说这样设计是大毒草。

回到家里,老伴准备着过中秋节的饭菜,性格刚硬的罗工柳还喝了一点酒,准备喝好,吃好,睡好,明天好去对付那帮混蛋家伙们。但老伴还是看出了点什么,他就把明天要被斗的事讲出了。“这事你得考虑一下怎么办,你可不能大意!”罗工柳已经躺在床上,老伴这么一说倒警醒了他。他想,也是,人民币设计都是属于国家机密,一直是在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家伙们胡闹,岂不是让阶级敌人窃取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情报吗?当时他这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也就绷紧了。

“既是总理抓的,就应该赶快报告总理。”老伴提醒道。

罗工柳马上从床上跳下来,一边吩咐老伴赶紧骑自行车到学院门口把海报抄下来,一边找来纸和笔,他自己在家给总理写信。他们把海报内容和信放在一个信封里,老伴忙着拿糍糊准备封口,他犹豫了,心想,如果作一般信件处理能及时送到总理面前吗?不行,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他让老伴把鸡毛掸子拿来,扯下一根鸡毛贴在信封上,信不封口,让送信的人都可以看到信的内容。

这么安排后,他们两口子乘着夜色赶到学院门口,把信交给值班的解放军同志,并说明情况危急。这位同志接过信看了,叫他们等一等,然后打电话,不一会儿,从里边的楼上下来另一位解放军同志,他看过信说:我们负责送去!

第二天,罗工柳照常到学院去劳动。上午,造反派头头通知他:“揪斗你的那个会,你不要出席。”罗工柳知道,这是那封鸡毛信起了作用。

又过了几天,学院宣布中央通知:凡是因人民币的问题揪斗罗工柳以及其他,要经李富春

同志批准。李富春当时是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造反派们还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个院子里,搞了一个展览,把人民币设计的草图全部陈列出来了。

作为一种特殊艺术的人民币

人民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其美术设计具有一定规律性。第四套人民币设计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中央有关领导提出要体现四个现代化,罗工柳大胆地予以否定了。他说:“这是意识形态,没有可以表现的形象吗。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表现多民族的团结应当是一个既有艺术性,又有永久性的主题。

这时候,罗工柳刚从日本考察回来。看到人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他在主持设计时又提出要增加百元币,以民族人口数的多少,对应票面额度的大小。可是,上报结果,五十元和百元币都被删掉了,票面额度与图案依次更改。理由是领导担心大面额货币出现,老百姓会认为人民币在贬值。等到已经开机印刷的时候,突然又传来指示,增加百元币。罗工柳生气了,说:文章写到头了,没法做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工作还是照样做。罗工柳记得那是国庆三十周年,他们这些设计人员全部被关在北京五四一厂里加班。怎么办呀?心里都犯愁呢。晚饭后,大家看电视,看到群众游行抬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巨幅画像的场面,灵感出现了。周令钊说:有了!这是按照个人对中国革命历史贡献排列的,不是简单地以职位排列,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历史地位,肯定也是经过中央认可的。侯一民、邓澍负责画肖像,直接在钢板上刻。当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中央也同意了。这样,就有了四位领袖肖像的百元币。

总结几十年来参加第二至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经验,罗工柳认为货币艺术应当具有下列基本属性:

其一、世界性。货币设计的主题内容必须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都喜欢的,不能用狭隘的意识形态观点,让一部分人对它产生抵触情绪。

其二、永久性。货币要长期流通,其设计理念

必须考虑到时间的永久性特征,不能搞临时性的政策口号。

其三、艺术性。货币设计必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美元主要以微雕艺术防伪,我们的人民币图像素描是很高妙的。

其四、民族性。货币鲜明的民族特色是赢得世界青睐的前提条件,我们在人民币的图案设计中减少机械花纹,大胆采用多民族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积累流传的手工图案,寓意吉祥,造型典雅,实为创举。

其五、防伪性。货币印制必须采用难度最高的技术手段,防止其被仿制。目前,人民币已经在造纸、设计、油墨、印制等一系列环节上采取独到的措施办法,能有效地防止假冒。

遗憾的是,1999年开始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将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几乎完全抛弃了。曾经参加第三、四套人民币设计的侯一民认为,第五套人民币无论是票面大小、比例,还是颜色搭配都不理想,图案太简单,体现不了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一百元券颜色太鲜艳,国际上一般大面值票面都是比较稳重的颜色。而且几套人民币下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规矩,二元券用绿色,五元券用棕色,十元券用蓝黑,现在新一套完全改变了,五元券用了绿色。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他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半小时

罗工柳,1915年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考取杭州艺专,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学校迁移湖南,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驻会理事。同年6月,他携带全国木刻展览作品,途经西安,到延安,入鲁艺术刻研究班学习。随后,参加鲁艺术刻工作团奔赴抗日前线,在晋察冀边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从事木刻工作。1942年奉调回延安,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后,他的正式工作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应邀为中国人民银行设计人民币,是友情出场,没有拿一分钱报酬。

他为这份额外的工作,差点丢了性命。

那是1978年11月,他为第四套人民币设计

工作,正准备着带队到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收集资料。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出发的前一天,偶然发现自己便血。他对老伴说:“有问题,你不要说,我注意就是了。”他是带队的,怎么能不去呢?这样就往外边跑了两个多月。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四、五个月。不好,再次便血,到医院检查,回家等结果,哪知道当天晚上他就便出了半痰盂的血。送到医院,又是便出半痰盂的血。一个人身上有几个半痰盂血呀?

就这样,除了乏,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一位熟悉的医生到病房里去看他,给他把脉,发现脉象不对,说着说着,他又大出血。马上手术,半身麻醉。他开始还清醒,慢慢地就什么都知道了。后来,医生对他说,情况很危急呀,我们都很紧张,你自己是不知道,你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半个小时,但还好,还是回来了。

手术后,来看望他的人很多。医生在门上挂个牌子:罗工柳,心肌梗死,直肠癌,不许探视。

一天,中国人民银行的几位负责人来了,拿着第四套人民币的整套大样。他们站在门口,护士不让进。他只能亲自说情,请允许我就在抢救室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和他们谈谈。

护士看出来,这是要回避她,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在这样时候来,还神秘兮兮的……”

罗工柳陪着笑脸解释:这确实是国家机密,就请照顾一下吧!

不为名,不为利,但是,一想到十几亿人的口袋里都揣着自己的作品,他就有了一种无上的光荣,伟大的信任,崇高的情感!

这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尽管电话里已经讲明了地址,但我第一次找到北京东城区的那条小胡同,还是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才将信将疑地按响了罗工柳先生家的门铃。走进这平常得近乎冷落,普通得有些残破的街门,坐在罗先生的面前,听他讲自己主持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设计的往事,我为这位艺术家的责任感与生命境界感染了。当我再次来到先生的家,我更为罗先生幽默风趣的情怀吸引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长江三峡反腐古诗联

● 啸 海

畅游长江三峡,浏览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在这几百里天然诗画长廊留下的佳作,人们惊喜地发现,其中一些反腐倡廉的古诗古联,今天吟诵起来,仍具有鉴古观今、警示世人的意义。

白居易诗吟减赋宽刑倡廉政

唐代白居易因上书言事得罪圣上,被贬为江州司马,继而于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至十五年被贬到长江三峡上端川江岸边的忠州任刺史。他在政治上不与上下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在人格上,不畏当时三峡川江边偏僻荒凉,生活艰苦,更加体恤社会底层百姓的疾苦。在忠州任职期间,他了解到这里存在两大痼疾:一是上下贪官层层盘剥百姓,以致赋租加码,刑罚又严又滥,弄得民不聊生;二是由于昏官当道,只知搜刮民财,却无人关注经济,扭转忠州极为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严厉惩治了一批“腐吏恶绅”,减少了徭役,放宽了刑法尺度,削减了压在农民身上的过重赋租,从此,忠州地方官绅不敢再向农民巧取豪夺。同时,他身体力行,倡导廉政勤政,亲手从外地引进许多先进农业技术,从京都学来制作湖麻饼的手艺,都很快在忠州推广。他还经常身临田边地头,劝导农民兴修水利,开荒造田,种植稻麦油菜及荔枝、橘柚等果林。白居易的廉政勤政大得民心,他本人在贬逐生活中却也心亮胸宽,诗兴不减。在忠州,他荷锄上东坡种花,写下了著名诗篇《东坡种花二首》,诗中就有他实施廉政的佳句:

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

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

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

这诗句生动反映了白居易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治理忠州的高招。清乾隆皇帝对白居易在忠州的这些举措大为赞赏,说:“劝农均赋,省事宽刑,岂独治一郡哉,虽以治天下可矣!”

寇准沉吟屈原“清向长光耀”

北宋宰相寇准少年时苦读春秋“三传”(左传、公羊、谷梁)深受教诲,养成明是非、守原则的品德。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19岁的寇准考中进士。当时宋太宗选用人才常看年龄,年纪轻的往往遣回不用。有人给寇准出主意,要他增报年龄,寇准拒之,说:“吾初进取,可欺君耶?”寇准不为当官而虚报年龄,虽然表现了诚实的品格,却被宋太宗在使用他时大打折扣。当时楚蜀交界的长江三峡岸边,有一个极为荒僻、贫穷的巴东县,皇帝派去的一届届县令,都不安心理事,往往干不多久就借故打了退堂鼓。宋太宗于是派少壮寇准去巴东,一来让他去尝尝当巴东县令的苦滋味,看他是否能在穷乡僻壤经得住磨砺;二来看他的品行是否为巴东百姓称道,将来能否成为大宋的栋梁。寇准义无反顾地赴巴东当县令了。他在审理纷繁的讼事中,了解到巴东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县份,腐官恶官昏官称霸一方,欺压庶民,坏事干尽。于是他整肃县衙,秉公断案,打掉了官中败类的威风霸气,并在县城建秋风亭,像秋风般清纯地在这儿议政;在县衙前栽上翠柏,以昭示寇县令以清(青)白(柏)为人。他还爬山涉水,亲临巴东的崇山峻岭,劝告山民改掉越穷越懒的恶习,勤于耕作,俭以持家,并从外地引进适合山区耕田的犁铧和一些良种。这种犁一直被巴东百姓叫做寇公犁传承到今。寇准任巴东县令扬清风,施善政,深得民心,他三年

任职期满要返回京都听令另作安排时,巴东百姓万众一心,向皇上请命,挽留寇准又当了三年巴东县令。寇准在任巴东县令期间,共写下诗词487首,其中不乏扬清激浊、拒腐倡廉的佳作,其中有一首《屈原庙感事》,读后发人深省。

寇准从小就崇拜行廉志洁的屈原,来巴东当县令后,知道屈原的故乡秭归与巴东接壤,便利用暇日,特地去秭归郡建阳坪屈原庙拜谒屈公。然而,当他来到庙里,只见“庙貌荒凉,惨怛耳目”,不由怒火冲心,写了这首诗。他在诗的前言里,斥责当时的秭归昏官当道,“郡无正人”,就连先贤屈公的遗迹都弄得“遗弃若是,感事伤俗”。他在诗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余基虽索寞,清向长光耀。

旌贤谁再兴?勿使过者谏。

崇敬屈原清廉高洁的寇县令,在破败的屈原庙前叹息着:屈原庙余下的基石虽显得索然寂寞,可是屈原的清风亮节与日月长光同耀。这位举旗先贤的美德谁人再来兴起?秭归郡的官员们啊,希望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要受到过路人的责备(谏)。

吴纳诗喻赃私抛三峡

明代仁宗洪熙初年,吴纳累官南京左副都监察御史,为人清廉,敢拒贿赂。一次他奉命去贵州巡察,巡察完毕返回京都时,贵州地方官员祈望他回朝廷后向圣上多言好事,多加包涵,派人从府库中取出黄金百两,沿着吴纳返京的路线辗转

数百里,追到三峡入口处的夔门,恭请吴御史无论如何将百两金子收下。

吴纳看了用红色封包包着的百两金元宝,毫不动心,他连封包也不开启,便挥笔在封包皮面上写了一首诗,连同百两金子一并请贵州来人退还原主。这首诗写道:

萧萧行李向东还,

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

任它沉在碧波间。

吴纳坐在东去的船上,因不沾赃私,心地坦然,还写了些顺利闯过三峡凶滩险礁的诗文。吴纳三峡拒金的美德被后世代代传诵,《寓浦杂记》中有他这一美事的记载;南京、贵州还有后人刻碑记传,颂扬他以不贪为宝,以清正为人。

龙脊沙洲遗诗扬清激浊

雄峻的三峡夔门上边,有一个云阳县,据该县留下的清代史料记载,光绪年间,当地一位书香人士,抄录了光绪年间之前刻在云阳三峡江段龙脊石上的一首诗。诗词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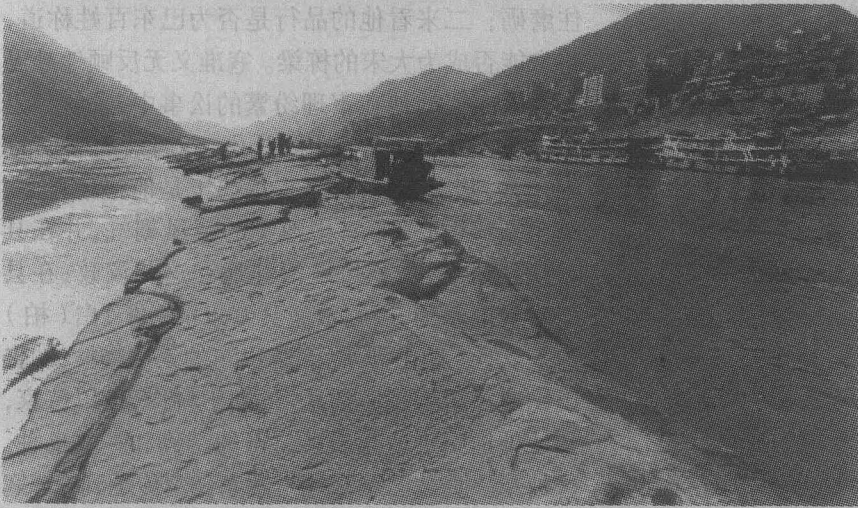
龙脊对沙洲,江水二面流。

污官几多载?清官不到头。

龙脊石位于云阳三峡江段的一边,此礁石巨大如屋,把三峡水分成两股,而与龙脊石隔江相望的另一边是一个沙洲。诗的头两句描写了礁石、沙洲和江水的态势。后两句则借此处的地形水势有感而发,道破那封建社会制度下,污官腐

吏虽然多如牛毛,但他们又能荣华富贵多少年?而那些廉政为民,拒腐不贪的清官,在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干到头呢?

这首诗以云阳两股江流的水势,隐喻旧社会中的贪官污吏尽管利令智昏,不可一世,但都得到没落破灭的下场。同时也无可奈何地道明旧制度下的清官廉吏,几乎都会被昏庸的皇上和地方恶吏豪绅扼杀,好官也得不到一个好



云阳龙脊石下碑林

结局。

这首刻在龙脊石上的诗,几百年来由于水冲沙打,早已剥蚀无痕,过往三峡的人们希望有关部门重刻于江边。

两副楹联呼唤良吏骂贪官

莽莽神农架东麓,秭归、兴山、巴东三县交界处,山大人稀,偏僻荒凉。清末民初,有一个姓谭的乡绅,依仗县、州的后台,当上了这一带的税官和乡长。他如狼似虎,极为贪婪,挖空心思地巧立名目,加重山民的钱粮税赋。百里之内的贫苦山民都得无偿地去他家打工种田、抬轿、推磨,千家万户秋收打下的粮食都得挑到他家交租。山民们在这个恶霸的压榨下,实难生存,不得不趁黑夜纷纷搬家逃到山外。有一天深夜,几户农民在搬家最后离开山沟沟时,你一句我一句凑了一副对联,悄悄地贴在了这个谭霸天的大门上,对联取“收刮民财”四个字,这样写道:

左联:收金收银收尽千家救命粮

右联:刮脂刮膏刮光五乡几层土

横联:民干财枯

三峡中的巴东县老城东边的山岩上,刻着一副出手不凡的对联,人们看对联落款及巴东史料,方知此联先后由三人写成,历时达146年。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70),专管治理三峡航道的荆南观察使李拔,从四川入三峡顺江而下,船过巫峡,月星隐曜,波涛汹涌,但过了蜀楚交界处,再往下行,山势低缓,波平浪静。李拔见巴东

县城已到,因仰慕北宋名相寇准为政清廉,刚正不阿,便舍舟登岸,步行到当年寇准为廉明议政而建的秋风亭,向寇公叩首拜谒。李拔回望巫峡,想到一路闯滩走险历经风浪的历程,而到了巴东楚城,不仅水势变缓,且巴东代代传扬着寇公的清明政声,于是他在江边这处岩壁上,挥毫题刻了四个大字:

楚峡云开

清末,巴东县江北有位秀才吴骏绩,看了李拔题刻的四个大字,认为巴东有过一位清廉正派的寇准,就把巴东描绘得“楚天云开”一般美,似乎以偏概全。吴秀才怀才不遇,因看不惯这里贪官昏吏的世风而怨世愤俗,于是将李拔写的四个字作为对联的横额,在横额下面的左边,亲笔题刻了一句上联:

历叹古今良吏少

吴骏绩有意不题下联,且看后来人如何应对。到了民国六年,江苏吴丰县的冯锦文奉调到巴东任知事,见这副对联只有上联,便想到人们叹息“古今良吏少”,根本问题是大小官人们不顾普天下苦人多,为受苦人想得太少。于是他在右边挥毫题刻了下联:

须知天下苦人多

这副对联就这样历经一个半世纪,完美无缺地写成了。它像岁月老人,向过往三峡的人们呼唤着:“良吏多些多些再多些”;也警示着官吏们须知天下还有很多很多的劳苦大众,为官要深知百姓疾苦,为劳苦人多做些好事。

(责任编辑 程 度)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2002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无;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无;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通告

本刊编辑部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现已全部售完,特此告知,请勿再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电话:(010)68532048 邮编:100045

读 者 来 信

(摘编)

多刊发有助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文章

今年第2期刊登的《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和《“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我认为好稿。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两篇文章对读者深刻认识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大有帮助。

《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一文，也是好稿。文中提到陈独秀，本世纪将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这是件大事，我希望《炎黄春秋》及早组稿，多多刊发有关纪念“五四”的文章。100年，漫长的岁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建设，在当今仍然如孙中山先生教导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陈独秀这样的历史风云人物，应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还其历史的真面目。贵刊可否邀请一些作者介绍周扬。据闻周扬从监狱出来后又遭遇不幸。当今的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是否可从中得到一些历史借鉴。

《炎黄春秋》是本好刊物，内容充实，既面向当今现实，又紧扣历史，作为明镜，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感悟。

王 珏

希望每期都有高质量文章

2003年《炎黄春秋》头三期刊登的《李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和《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非常好，非常及时。

这三篇文章很有分量，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和干部思想存在的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提出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现在干部们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有很多疑问，对当前国家一些现象也有不少看法，但不敢讲，老干部不敢问，新干部不敢想。而贵刊能发表这些文章，让人们去想，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希望每期都有一、两篇高质量的文章。

钱学鑫

致作者李普同志的信

我非常冒昧地给您写信。因为我读了《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您的文章《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羨林〈牛棚杂忆〉书后》，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坦率地说，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也许是还没有读到）这么好的东西——对您所论及的那些问题多少人在思索、在试图靠近啊。但由于各种原因，至少目前还没有谁能达到您这样的清醒、明白、把握分寸，而又切中要害、发人深思的程度。您选取了这样的角度，切入这么重大的主题，非常佩服您的功力。

多年来，被我看“绝”了的世相，被您“残酷”地揭示，干净利落，一语中的。很是痛快，吁出长气。常常，我读着那些所谓史料，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无论这类书的题目起得多么“涵盖”、多么“大”，它们令我反感。有时绝望地觉得：历史的迷雾是这样容易升起。我怀疑人类根本不会走出太远，因为其本性令他无法记取到历史的教训，而且，历史本身还要遭遇到那么多人为的篡改。

孙 元

赞赏“谁也无权淡化‘文革’”

贵刊曾以季羨林和马识途先生《沧桑十年》一书的序言，冠以《谁也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的醒目标题加以发表。在“文革”中，我们的国家、民族曾经遭受空前浩劫。炎黄子孙的名声和形象，在国际上和世界人群中，被糟蹋得丑恶不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反思，由衷忏悔，才能保证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然而某些人士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私心，不愿意人们忆述“文革”，力求淡化，使人忘却。更有甚者，极力扭曲、掩盖、粉饰，以过为功，颠倒黑白，蒙骗后世，这是非常愚蠢和危险的。愚以为，只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担起以史

为鉴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告诉后代。贵刊提出“谁也无权淡化‘文革’”,深谋远虑,确属富有远见卓识的言论,是发聋振聩的攘臂呼唤!我至为赞赏、钦佩,衷心拥护!

当前,应从实际着手,尽力组织编排一些反映那个年代史实的忆述文章,以摆脱“淡化”的谬举,为后代史家撰写现代史提供素材和参考、佐证,从而使即将湮没的史料得以钩沉,抢救历史。

倪艮山

历史不能回避和淡化

读了几期《炎黄春秋》,感觉所选的文章都在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

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能遵从那些想淡化某一段历史的人的主观意志。

2003年第3期刊登的《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虽然只是一事一地,但呼吁多写一些关于那个时期的文章,终有这种声音了。特别是作者坦承“我也整过人”!实属不易,但就这种坦承,在有些所谓“名人”是做不到的。他们总在回避,自然就在想方设法“淡化”那一段历史,其实,说白了,他们是在极力想掩埋自己那一段不太光采的行为。

关于封建思想的话题,我认为确实如此,从上至下,甚至像我这样的自认为思想还跟得上世界的人,思想上总还有一些封建社会的残留物,这不奇怪,毕竟我们生活在有着上千年封建史的“古老文明”的国度。

我在很多年前,写了一些杂文,也谈及这些事,但我从不曾想在哪儿发表,只是觉得中国太缺少这种杂文了。

吹 风

许德佑等遇害地不是广西而是云南

笔者是贵州黔西南州一名离休干部,也是贵刊一名长期读者。贵刊2002年第6期《民国最有科学成就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民》文),其中一处与史实有误,特去信并将有关资料复印寄上,期以查实更正。

《民》文中写到:著名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技正(研究员)许德佑及青年地质学家陈康(地质调查所技佐)、马以思(女,地质调查所练习员)在广西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

《民》文这段话有误,许先生等3人是在贵州

黔西南州晴隆县遇害的。《黔西南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刊有我州现任州政协副主席鲍吉锐和邓海升两先生写的《许德佑、陈康先生和马以思女士遇害始末》一文,文中详细记录了许先生等3人遇害的详细经过。笔者现将此文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1944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侯学煜先生、技正兼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许德佑先生、技佐陈康先生暨练习员马以思女士,奉派出席在贵阳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会议于4月初闭幕后,四人于4月11日由筑搭车西行,往黔西进行地质调查、采集。17日抵盘县。人员分为两组,研究员侯学煜专事土壤调查;许德佑、陈康、马以思进行地质考察。许德佑等三人由盘县、普安、晴隆、郎岱一带进行考察,在盘县境内东北部考察三日后,三人即循乡间小道向普安县兴中乡(现在的兴中区)进发,4月21日到达兴中乡,22日休息一天,23日又至普安县五里坪。沿途考察,采集标本,收获甚多。24日赴郎岱途中,行经晴隆境内黄厂附近猝遇土匪结伙持械抢劫,许德佑左胸中弹当即身亡,匪众将陈康先生和马以思女士劫持至马路河箐林内杀害。

贵刊在我州老同志中影响极大,笔者坚持订阅贵刊多年,在笔者介绍下,仅笔者单位就有好几位同志订阅。每期到后,贵刊都被一些同志争相传阅,笔者所订刊物有时传阅几个月后才被送回,可见影响之大。

彭述纲

“勇夺虎黑威”应为“勇夺虎黑威”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已连续十年订阅《炎黄春秋》。贵刊所刊载的历史人物、事件真实可信,尤其是人物传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客观公允,在同类刊物中出类拔萃。但有时贵刊也有校对不严的问题,如2002年第9期《忆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一文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英勇殉国的戴安澜将军所题的挽诗中,“勇夺虎黑威”一句误为“勇夺虎黑威”。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典》的解释:黑是一种熊,也叫马熊。用在诗句中当凶猛的野兽讲,以此来形容戴安澜将军的英勇无比,敢于同一切凶猛的敌人搏斗,而不应当是“虎黑威”。

刘拥军

“精神保姆”

精神现象零拾之二

陈四益 文 丁聪 画

现在是独生子女时代，一个个宝贝顶在头上怕歪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婴儿的衣帽鞋袜不算，吃的、护肤的、沐浴的、大小便的，一切种种都有专用的产品。“月嫂”成了专门的职业，而且行俏得很。我们这些知道上一辈怎么带我们、我们又怎样带下一辈的人，对于今日的育儿，真有点看不懂了。但是再怎么变，当父母的总还知道，什么时候要教他爬，什么时候要叫他说，什么时候要引他走，不会一辈子把他抱在手里。孩子自己走、自己说，哪怕跌跌歪歪，哪怕咿咿呀呀，也从没有一个父母因此将孩子抱在手里过一辈子的。

但是，在精神领域，却往往出现另一幅情景。似乎人打出生以后，就绝对要处于“精神保姆”的监护之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话不能听，什么观点是正确的，什么思想是错误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病态的……凡是“精神保姆”认为不好的东西，就要在所有的传媒中消失，想看也看不到，想听也听不着。如果偷偷地寻觅，就是不轨之举，就要受到批评教育，甚至较重的惩罚。总之，人们无需有自己的思考，只要虔心诚意接受“保姆”的教诲，思想就会纯正而又纯正，健康而又健康，不受一丝一毫的“污染”。

真能这样，阿弥陀佛！

但是，为了达此目的，我们首先要确保“精神保姆”的精神完全正确、永远正确。若是“精神保姆”的“精神”出了问题，绝对听从的人岂不一齐遭殃？可惜，我们无法确保能有这样的存在，除非心造一个幻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圣贤，过也不少，只不过被有意地掩盖起来罢了。既然我们无法拥有永远正确的“精神保姆”，那么消除所有人的独立判断能力而一切听命于并非永远正确的“精神保姆”，就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



情了：它可能因为“精神保姆”的疯狂而变得举世若狂。

即便“精神保姆”们恪尽职守，也确实只传授纯正的思想，但在无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虽避免了与病菌的接触，却也失去了常人所有的免疫力，形成精神软骨症，一旦脱离了监护的“玻璃罩”，就会更加容易受到感染，而且一旦感染就难以收拾。绝对服从的反叛，会成为绝对放任，而绝对放任则正好导致是非不分，甚至以非为是。

人的精神的正常发育，应该是在亲师教导的同时，也养成其自由之研究精神和独立之判断能力。这种精神与能力的养成，当是在种种思想的碰撞、比较、鉴别当中。只有经过自己思考与咀嚼的思想材料，才能真正被吸收、被消化，成为一种精神的滋养。单一的精神灌输，绝对的精神服从，必然导致可怕的精神控制与可悲的精神依赖。诗曰：

“精神保姆”一枝花，
玉洁冰清岂有瑕？
引领群氓朝天去，
人人都变软骨娃。

本期： 终审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庄建平

审校 赵友慈

《炎黄汇典》 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八卷本《炎黄汇典》，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并于4月10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出版座谈会。

《炎黄汇典》是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倡议和组织下，由十余名专家学者经过近8年努力，共同完成的。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就首先叙述了黄帝的历史，并涉及炎帝的事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从黄帝算起的。在中国历史上，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国家的大一统，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时期，研究与宣传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文化，有助于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学者说，《炎黄汇典》从浩瀚的史乘中，精心摘编了有关炎黄二帝事迹的资料，收录了全国地方志中各种记载，选辑了有关学术论文、历代吟诵炎黄二帝的诗歌和流传在民间



的口头传说，彩印全国各主要纪念建筑如黄帝陵、炎帝陵的照片等，称得上是一部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图文并茂的有关炎黄二帝的知识宝库，不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有：任继愈、金冲及、冯其庸、李学勤、张岂之、贾芝、吴汝祚、罗琨、王贵民、郑杰祥、曲英杰、徐育民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文彬及其他负责同志冯征、杜端正、曲润海、吴塘、鲁淳，吉林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潜等，也出席了座谈会。

炎帝黄帝再现人文初祖辉煌

《炎黄汇典》——有关炎帝、黄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全书分八卷，共500余万字，500余幅图片。

总主编：李学勤 张岂之

《史籍卷》

《方志卷》

《祭祀卷》

《文论卷》

《考古卷》

《诗歌卷》

《民间传说卷》

《图像卷》

联系人：习静 曹祺

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

邮编：100034 电话：010-66126313 传真：010-66174547



名人名家倾力打造八卷宏文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3/5 总第134期

- **陈毅元帅的诗人风范**
-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 **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
- **成吉思汗陵西迁记**
- **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